

主編的話

這一期的台灣東南亞學刊，共刊登了四篇研究論文與一篇研究紀要。

第一篇研究論文是許文堂撰寫的「越南華人在戰爭期間的損失（1941-1947）」，運用外交部檔案及中國國民黨黨史館檔案資料，探討越南華人在戰爭期間的物質損失，希望透過此一研究可以更加理解二次世界大戰（1941-1945）和越南獨立戰爭（1945-1954）前期對越南華人社會的衝擊。本文發現，在此段戰爭期間的華人不僅是移民者，也是在越南當地社會中經濟、文化領域的「殖民者」，同時也是法國政府管轄下的臣民和日本軍事當局的人質。但是，相較於法越衝突期間，在二次世界大戰日軍軍事管制經濟下的華人社會其所遭受的物質損失則相對較少。這樣的情況反映華人相當特殊而無奈的處境。

第二篇研究論文，是曹淑瑤所寫的「民族認同與母語教育：戰後砂拉越地區華文中學之研究」，文章針對二次大戰後，砂拉越華人如何在強調單一語文教育的環境下，為維護母語教育所做的種種努力所進行的研究。本文指出，二次大戰之後，東南亞各殖民地的「土著民族主義」蓬勃發展之際，砂拉越的統治者，不論是英殖民地政權或馬來西亞的主政者，皆視教育為一種統治的手段，企圖建立一個以統治族群的文化為核心價值的國家。在這種政策下，砂拉越華人母語教育的發展空間，必然遭受嚴重的擠壓。但是，當前砂拉越境內仍擁有 233 所華文小學及 14 所華文中學，以傳承華人文化為其辦學使命。部份乃歸因於華文學校被視為一種華人民族文化認同的核心，也成為馬來西亞華人社會對統治當局的馬來化政策的一種抗衡手段。

第三篇研究論文是戴萬平的「泰國對中國外交政策的演變：建構主義的觀點分析」，是根據建構主義的論證，辯論泰國對中國的政策並非新現實主義或新自由主義所強調的「實體理性或是權力均衡」作用下的結果，反而是「在兩國社會共有的觀念下定義國際政治結構」建構的相互關係；也就是說，近 30 年來，泰國對中國的政策除受國際政治結構所影響外，更包括了透過國內社會實踐互動的結果。泰國隨著國際形勢和周邊環境的變化，結合自身社會經濟發展需要，調整其對中國的外交政策。冷戰時期，中國從安全威脅者變成保障者，冷戰後，中國

成爲東南亞地區主導地位的戰略力量，泰國乃採取調適外交政策，不主動挑戰中國，但也不與美國及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交惡。本文結論指出，在現有的國際政經發展架構上，泰、中兩國「由敵人到朋友」這樣的關係恐不易改變。

第四篇研究論文則是施馬可撰寫的「伊斯蘭教對馬來西亞民主化之困境」，本文也是以建構主義爲途徑，試圖理解伊斯蘭教對馬來西亞民主化之影響。作者以現有伊斯蘭教與民主之間的共存模式作爲基礎，以司法獨立、媒體自由和人權等議題爲例，探討伊斯蘭教對馬來西亞實踐民主價值時所扮演的角色和產生的困境。本文顯示，政治的保守立場與宗教價值之間有著強烈的關聯性，但是否應將伊斯蘭教視爲馬來西亞民主化過程的障礙，恐仍然一時無法斷定。

研究紀要是廖文輝所撰寫的「早期新馬地區東南亞研究英文文獻概述（1800-1876）」，描述英國自 1786 年占領檳榔嶼開始，有關英國在馬來半島的文字記載和研究。在皇家亞洲學會海峽分會成立之前，英人的關注焦點主要側重在對馬來半島進行廣角鏡式的全盤和廣泛的瞭解，其書寫方式主要是以記錄、編輯和整理爲主，深入和細緻的研究較少。至於從事於這方面工作的，則被稱之爲「觀察家」。這時期的書寫方式可以歸納整理成五種，包括報章雜誌和期刊的出版、西人的遊歷文字、英殖民人員百科全書式的書寫、英殖民政府的檔案，以及英國倫敦佈道會的印刷出版事業。這時期的研究方式和書寫形式被後來者繼承並發揚光大，且逐漸成爲英文東南亞研究的傳統。

希望本期所登載的五篇文章，能對東南亞華人研究和建構主義取向之東南亞區域研究提供若干啓發和貢獻。



2011年04月30日

越南華人在戰爭期間的損失（1941-1947）

許文堂*

中文摘要

本文以外交部檔案及中國國民黨黨史館檔案資料為基礎，探討越南華人社會在戰爭期間的物質損失，希望透過此一研究可以更加理解二次世界大戰（1941-1945）和越南獨立戰爭（1945-1954）前期對越南華人社會的衝擊。

從檔案中我們發現一些特殊的現象，日本當局在中國政局分裂為抗日的重慶（蔣介石）政府與親日的南京（汪精衛）政府的情況下，操縱華僑的認同分裂，讓親日的華人取得在商業的利益。

在此段戰爭期間的華人不僅是移民者，也是在越南當地社會中經濟、文化領域的殖民者，同時也是法國政府管轄下的臣民、日本軍事當局的人質。但是，相較於法越衝突期間，在二次世界大戰日軍軍事管制經濟下的華人社會其所遭受的物質損失相對較少，而這樣的情況似乎反映華人無奈的地位；此際，精神方面承受的痛苦也許難以估計，但由檔案中若干經濟損害和創傷的紀錄，至少反映出戰爭的面貌之一。

關鍵字：法屬印度支那、越南、華僑、華人、戰爭損失

*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E-mail: shiu@gate.sinica.edu.tw
本文收件日期為 2010 年 01 月 05 日，接受刊登日期為 2010 年 03 月 24 日

Inquiry Into the Material Losses of Chinese in Vietnam During the War Time, 1941-1947

Wen-Tang SHIU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we intend to clarify the life of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damage brought to it by the wars.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diplomatic archiv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were stocked in Taiwan. We can understand better how and what were the impacts of wars, as WWII (1941-1945) and independent war (1945-1954), brought to Chinese society in Vietnam.

In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aiwan, we found some materials shedding light on other aspects of overseas Chinese society. As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in Vietnam showed Japanese authorities played the game of their split recognition of and loyalty to either the Chungking (Chiang Kai-Shek) anti-Japan Government or the Nanking (Wang Jing-Wei) pro-Japan Government, so to manipulate and to get profits from their commerce.

We knew in this period a Chinese was not only an immigrant and a colonist in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domains, but also a French subject, as well as a Japanese hostage in Vietnamese society. This raises the following queries: What were the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vis-à-vis to the Vietnamese, the Japanese, and the French? During the independent war, the Chinese was once again confined in the conflict. What was their damage during the conflict period?

Keywords: French Indochina, Vietnam, overseas Chinese, war damage

一、前言

越南華人研究大部分侷限於華人經濟的成就及其正面形象的描述，以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為例，論者皆以華人踴躍捐輸，甚至組織義勇隊返回中國作戰，或是在日軍占領區進行英勇的游擊戰為主題，¹少有研究觸及越南華人社會在戰爭時期的遭遇與蒙受的物質損失。

事實上，在國史館儲藏的外交部檔案中可以看到另外的面向。以越南華人而言，日軍利用華僑對重慶與南京兩個政府的認同分裂，達到操縱商業活動為其服務的目的。雖然日軍在 1945 年 3 月才全面占領越南，但自從 1940 年 9 月日軍進駐北圻，1941 年 7 月進一步駐軍南圻以來，法國殖民當局即已受制於日本軍方。對於此一時期的華人而言，如何在雙重殖民管制之下的戰爭統制經濟下求生存？在戰爭期間華人社會遭受多少損失？他們的認同抉擇又有何意涵？這一部分的史料迄今仍有待史學工作者的進一步爬梳。

戰後越南抗法獨立戰爭期間，華人社會再度被捲入法國與越盟之間的衝突，華人再次承受創痛。此時，精神的痛苦也許難以估計，但在一些記錄經濟損害的檔案中，則至少反映出戰爭的另一面，本文也只能企圖探討此一時期越南華人的物質損失。

二、大戰前後的越南華人人口

據法國當局 1931 年的統計，越南華人在北圻有 52,000 人、在中圻有 10,000 人、在南圻有 205,000 人，合計 267,000 人（*Annuaire Statistique de l'Indochine* 1931: 53）。陳達的《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一書引據國際勞工局（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1933 年的統計，在法屬印度支那（French Indochina）有 171,000 人（Robequain 1939: 42）。其間之差距可能是前一數

¹ 對「華僑」與「華人」的定義不同，已經是現今學界十分清楚的共識；然而，鑑於當時文件混為一談，本文凡引述檔案文件者一律沿用「華僑」（李盈慧 2003：319-352）。

據 (1933 年) 尚包含法屬寮國 (Laos) 與柬埔寨 (Cambodia) 之華人, 若予以扣除, 則為實際的越南華人人口數。另一方面, 在 1931 至 1933 年間, 受到世界經濟不景氣的影響, 回鄉的華人比入境越南的還多。此外, 法越政府當局採取強制同化政策, 規定自 1933 年 8 月 1 日以後在越南當地出生者一律視為越南人 (陳鴻瑜 2004: 155), 因此實際上有一些華裔並不在統計數字之內。據 1943 年的統計, 全越南有華人 495,900 人, 分布於南圻 (Cochinchina) 者有 397,000 人, 分布於高原區 (Plateau) 的有 30,900 人, 分布於中部 (Annam) 者有 15,000 人, 分布於北越 (Tonkin) 的則有 53,000 人。²以此觀之, 10 年間越南華人人口暴增 278,900 人, 1937 至 1939 年間, 南部華人即增加 10 萬人, 且多半是為逃離戰爭而導致大量華人遷徙至此。以西貢港口進出紀錄來看, 華人人口增長受太平洋戰爭的影響, 進出人數均大幅減少 (Tsai 1968: 40)。(請參考表一)

1946 年底, 胡志明 (Ho Chi Minh) 在其「告華僑同胞書」中稱「在越南有華僑 50 萬人」, 此雖為政治演說不一定準確, 但此一數字大致符合實況 (黃國安等 1988: 1019-1020)。

根據 1948 年在西貢—堤岸 (Saigon-Cholon) 的調查, 華人以來自廣東者最多, 閩南其次。其中, 廣東占 41.3%, 潮州占 36.9%, 福建閩南占 7.3%, 客家占 10.6%, 海南占 3.4% (Tsai 1968: 85)。這樣的語言族群比率和當時在全越南的華人分布情況大致相同。(請參考表二)

三、日本監視下的越南華人社會

自 1937 年 7 月中日開戰以來, 國民政府即加緊進軍火物資的採購, 尤其在海岸港口逐一失陷之後, 香港及越南便成為中國物資進入的重要轉運地。越南海防港為滇越鐵路起點, 軍火物資可以由海防直運昆明或南寧,

² According to Thomas Engelbert's "Vietnamese-Chinese Relations in Southern Vietnam during the First Indochina Conflict," a trustworthy French population census before the First Indochina War (1943) made by French authorities, there were 396,000 Chinese and 119,000 Minh-huong in Vietnam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Vietnam 1959: 17).

表一 西貢海關華人出入統計

| 年份 | 入境 | 離境 | 增減 |
|------|--------|--------|----------|
| 1937 | 51,400 | 17,800 | 33,600 |
| 1938 | 63,400 | 15,400 | 48,000 |
| 1939 | 40,200 | 13,400 | 26,800 |
| 1940 | 11,800 | 12,300 | -- 500 |
| 1941 | 5,400 | 9,700 | -- 4,300 |
| 1942 | 1,900 | 2,900 | --1,000 |
| 1943 | 3,096 | 4,578 | --1,482 |
| 1944 | 1,838 | 2,942 | --1,104 |
| 1945 | 859 | 837 | 32 |
| 1946 | 2,251 | 11,512 | --9,261 |
| 1947 | 32,489 | - | - |
| 1948 | 47,100 | - | - |

資料來源：Tsai (1968: 40). (此處僅取相近年度之統計)

表二 1948年西貢—堤岸區華人方言群分布

| 群體 | 方言 | 人數 | 百分比 |
|----|-----|---------|-------|
| 廣東 | 廣東話 | 128,030 | 41.3% |
| 潮州 | 潮州話 | 114,390 | 36.9% |
| 福建 | 閩南話 | 24,180 | 7.8% |
| 客家 | 客家話 | 32,860 | 10.6% |
| 海南 | 海南話 | 10,540 | 3.4% |

資料來源：Tsai (1968: 85).

因此也造就了一時商貿的畸形繁榮。不僅許多政府單位派出人員往來於此，越北的華人社會也因此生意興隆。日本軍方亦著力於對法國殖民當局施壓，屢屢警告法方勿允予以軍事物資經過越南援華，並汲汲於切斷「援蔣道路」。此一時期的越南華人社會雖面臨戰爭威脅，但活絡的經濟卻使他們對於戰爭的殘酷事實並未能有深刻的體認。

1938年12月18日，中華民國國防最高會議主席、國民參政會會長汪

精衛祕密離開重慶，20日抵達河內，29日發表「豔電」，³主張對日談判，依日本總理大臣近衛文麿之聲明，達成「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等目的。汪精衛此舉在華人世界投下震撼彈，造成很大的迴響，華人社會分裂成贊成汪與擁護蔣的兩大陣營。尤其，次年3月20日，重慶軍統局策動在河內暗殺汪精衛事件使其祕書曾仲鳴夫婦李代桃僵，⁴讓僑界部分人士更對國民政府的恐怖手段感到不能認同，轉而同情汪精衛之立場。

1940年6月25日，日軍派出監視團到河內，並下令海防對華商的囤貨倉庫進行檢查，凡屬認定軍用物資者即予以扣留。雖然法國印支總督 Georges Catroux 表示會保護華商利益，但仍造成僑界極大恐慌。儘管日軍不斷施壓，法國殖民當局尚能依約，讓中方採購的軍事、民生物資經過越南通往中國。直到1940年9月22日，日方與法國印度支那總督簽訂「法日軍事協定」細目，日軍達成進駐越北的目的終於切斷此一「援蔣」道路。因滇越停運，中國官商物資被扣留在海防港，損失極鉅；僅昆明市商會呈報的部分損失總數就高達 18,628,743 美元。⁵至於越南華人的損失，則未見有完整統計資料。茲以海防創立七十餘年的源泰琳號為例，其放存海防公私倉庫大量物資，總值計 30,511,395 美元全被日軍沒收，店東潘慶泰一家經營所得損失殆盡。⁶

日方更進一步在次年，即1941年7月29日，與法方簽訂「共同防衛軍事協定」，派軍進駐南圻，達成控制整個法屬印支的局面（許文堂 2004：63-101）。

汪精衛政府派駐在印支的商務代表林伽珉乘機活動，以其可以代為向日軍交涉不受損失為由，收攬僑商，並曾收一時之效；僑領張永福亦奉汪精衛政府之派任，擔任僑務特派員積極活動；南圻中華總商會會長張振帆

³ 依電報代日期韻目表「豔」字即廿九日，表示廿九日所發之電文。

⁴ 軍統局派員陳恭澍、王魯翹等遠赴河內刺殺汪精衛，王魯翹誤殺曾仲鳴（陳恭澍 1983）。

⁵ 中華民國外交部檔案，檔號：030.8，檔名：〈我國在越損失物資價值一覽表〉。（國史館藏，以下皆同）

⁶ 外交部檔案，檔號：063.1，檔名：〈越南老街華僑財產損失〉。

亦因此轉向汪政府。⁷此外，僑領關熾亨、朱繼興、何羅等人也都公開表示與日本合作。⁸張振帆是西貢堤岸七府十幫的幫長、堤岸福建幫長、米穀公會會長、南圻中華總商會會長，曾任重慶國民參政會參議員，其在越南僑界的影響自是非同小可；關熾亨是河內廣東幫長；朱繼興為潮州人，為堤岸潮州幫長、曾任南圻總商會會長；何羅是中華總商會會長；劉增也曾任堤岸廣東幫幫長；以上都是越南僑界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們的親日傾向自然有很大影響；加以自 1942 年以後，南洋各地相繼落入日軍之手，以致僑界人心不安，只能尋求自保之道。

而且，親日僑社得到日軍支持可以公開活動，甚至可以得到利益，因而顯得比反日的地下活動更容易得到支持。尤有甚者，法國殖民當局對華人嚴厲施壓防止反法，限制華人進行具有任何政治性質的活動，對華人藉詞拘捕、勒索、妨害營業等手段較以往更甚，但對於加入日方組織，由日本人出面保護之華人則不敢過問。⁹事實上，1944 年日皇曾訓令駐越憲兵司令部要官商各界不可欺侮越南民眾，對華人尤應極力聯絡親善，足見日本對華人之拉攏手段無微不至。¹⁰由於資料所限，日皇詔書是否形成對東南亞華人政策無從考察，但相較於日軍在英屬、荷屬等地所採取之措施，越南日軍則顯得較為溫和。

相較於東南亞各地華人情況，星馬地區因為原屬英國殖民地，華人社會一向鼓吹抵制日貨、捐款抗戰，迨日本統治之後，華人陷入戰爭狀態，日軍採取「大檢證」、取締反日行動、沒收財產等強硬鎮壓手段自屬可能想像之舉。同為日本「友邦」的泰國相較於法屬印度支那，因為泰國實行親日排華政策，導致境內華人社會也難有作為。法國維琪（Vichy）政府或法屬印度支那當局，受制於納粹德國，又欲保持印度支那屬地主權，防止中國或日本之入侵，因而是消極親日，故華人社會相對處於和平狀態。日本與法國政府不僅訂定有軍事協定，也有經濟協定，在 1941 年之後，越

⁷ 國民黨黨史館，特種檔，越南，檔號：30.257，檔名：〈張逆永福擬遊說僑領朱繼興張振帆案〉。

⁸ 國民黨黨史館，特種檔，越南，檔號：11.7，檔名：〈邢森洲報告越南現勢〉。

⁹ 國民黨黨史館，特種檔，越南，檔號：11.7，檔名：〈邢森洲報告越南現勢〉。

¹⁰ 國民黨黨史館，特種檔，越南，檔號：11.11.8，檔名：〈越南時事日誌〉（1944 年 9 月份）。

南稻米等戰略物資就只能出口供給日本和其占領區所需，不得輸出到第三國，因此，掌握越南經濟的華人爲求生存，在經濟、物質上資助日本的情形比泰國多（李盈慧 2003：276）。南京汪精衛政府的成立，使越南華人認同分裂，因而附日的情形較多，似乎僑居地是否捲入戰爭也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總之，廣東、福建爲主的僑鄉已淪入日軍之手，對於華人而言，或因僑居地受戰事影響而無法謀生，故想回轉原籍；或因生意貨物流通等問題，轉而親汪政權，甚或不反日，乃是一種出於自保的選擇。

至於外交領事人員在敵我之間，則毫無模糊的空間。1941年9月25日，日軍強行入侵中華民國駐河內之總領事館搜捕館員；同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同日，駐西貢領事館亦被日軍入內搜索文件，並逮捕留守的兩名館員郭強及王文澤。雖然總領事尹鳳藻及19名館員眷屬早已避居中部大叻（Dalat）新開設之領事館，其後於12月10日再度被迫逃亡到崑嵩（Kon Tum）山城，後來被法方軟禁達三年九個月之久（洪根松 1981）。

1941年1月，日本自法越南當局取得米穀統治權，將印度支那所生產的米穀全部置於控制之下，規定越南出產的米只供應在日本國內、滿洲國、中國的日本人及軍隊，不准出口至第三國（陳碧純 2002：84）。由於原本米穀生意操在華人之手，只有轉而與日商合作一途，導致許多僑商在遭逢變局之下轉而成爲日軍「御用達」，即官方特許商店，專門爲日軍採購軍需品，不僅得以保存身家性命，甚且可以發戰爭財。堤岸華人人數最多，原本是抵制日貨運動的大本營，當地華商在日本進駐後的態度丕變，反藉戰爭而發財。再者，堤岸華人米商受日本憲兵部的管制，不得不接受日方的要求，華商若不將米穀交由日本的三井物產出口，則大米將無法輸出。換言之，受到日本和法國雙重威逼下，華人顯然無法自由操控米穀的出口，而華商重視的是商業利益，既然僑居地受制於日本，不得不接受日本的監視和對物資的要求。不僅米穀如此，其他各式各樣的物資凡是日軍認定與軍用相關，即可任意管制，乃至沒收徵用。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根據國民黨的統計，1942年1月至6月半年期間，

表三 越南的物資損失（1942年1月至6月）

| 物資 | 數量 | 價值（越幣） | 備考 |
|------|---------------------|------------|--|
| 現金 | | 40,400,000 | 2月間，敵封存西貢之上海渣打銀行（Standard & Chartered）資金 |
| 現款貨物 | | 2,750,000 | 2月間，敵占封河內海防三達公司之現金及貨物共值上數 |
| 產業 | | 18,000,000 | 2月間，沒收英美僑民及猶太人在越產業 |
| 白米 | 5785,000 噸 | 66,060,000 | |
| 穀米 | 902,000 包 | 2,930,000 | |
| 雜糧 | 300,000 噸 | 7,500,000 | |
| 雜貨 | 6,700,000 噸 | 49,000,000 | 2月間，沒收英美僑民猶太人在西貢貨物 |
| 麵麥 | 1,300,000 噸 | 10,000,000 | |
| 金屬物 | 4,000,000 噸 | 49,000,000 | |
| 勒索現金 | | 150,000 | 勒索各地華僑捐軍餉 |
| 煤 | 10,000 噸 | | |
| 附註 | 日本在全越收買各物資付有代價者不計在內 | | |

資料來源：國民黨黨史館，特種檔，越南，檔號：11.7，檔名：〈邢森洲報告越南現勢〉。

越南被日本掠奪的經濟損失高達 245,690,000 越幣（piastres）以上，約合等值之美元，且還未包括一萬噸的煤。¹¹（請參考表三）

戰後，根據外交部檔案顯示，在日軍占領越南期間，海防及諒山部分華人所受損失之統計金額為 4,601,423 美元（US. Dollars）、95,710 英鎊（Sterling）、4,427,601 越幣（piastres）、79,100 中國幣（即法幣）、985 港幣（H.K. Yen）。¹²戰時的貨幣匯率很難估算，如關金以一比一兌換越幣通

¹¹ 國民黨黨史館，特種檔，越南，檔號：011.7，檔名：〈邢森洲報告越南現勢〉。

¹² 1929年世界銀價下滑，受到國際銀價大幅波動影響，中國白銀大量外流造成嚴重的通貨緊縮。國民政府於1930年起改以黃金本位，以0.601866克純金為一單位，稱為「海關金單位」，價值為0.40美元。1931年5月起，中央銀行發行關金兌換券，供繳納關稅。自1935年11月4日宣布，發行「法幣」，放棄「銀本位制」，並收回市面的銀元及紙幣，藉此統一貨幣，將鈔幣發行權收歸中央銀行。1937年以後，因對日戰爭及國共內戰，造成鉅額的財政支出，使法幣發行量大增，價值劇貶，造成惡性的通貨膨脹。1942年4月1日，財政部公布發行「美金節約建國儲蓄券」及流通「關金券」。5月8日，中央銀行發行關金券。1942年2月，關金提高含金量至0.88861克純金，即1關金等於1美元。1942年4月，定關金為1元折合法幣20

行(朱僂 1946:5),1 英鎊約等 4 美元計(*The Times* 1944, 1945, 1946, 1947, 1948),海防及諒山華人所受損失之金額高達 1,000 萬美元之譜。

法屬印度支那在中日戰爭爆發之後,即已由國民黨組織抗日救國運動,各救國團體組成「越南華僑救團總會」下轄之分會達 35 處,成員號稱達 10 萬人(李白茵 1990:153-154;華僑志編纂委員會 1958:200-201)。1939 年底,法國印支總督 Catroux 迫於日方壓力,下令「越南救總」停止活動。但是,國民黨仍加強駐越工作,以邢森洲特派員為駐越辦事處主任,積極策動華人青年返國參加抗日,或參加「華僑義勇服務隊」在越南進行游擊戰。據有限的資料顯示,至 1944 年底共組成三支隊伍。第一支隊伍的成員「越北華僑青年組」,基本成員 90 人,外圍人員 215 人,由王清率領,對日軍進行游擊戰。第二支隊伍的基本成員 150 人,外圍 125 人,由蘇民率領。第三支隊伍的基本成員 70 人,外圍 140 人,由潘漢波率領。¹³但是,這些抗日隊伍的成效顯然很有限。

日軍對於國民黨的地下反日工作除大力搜捕之外,並成立親日機關以達到控制華人社會的目的。其中,除汪精衛政府之「駐越通商代表辦事處」(林伽珉、簡道鏞)、親汪精衛之國民黨駐河內支部(關熾亨等三百多名黨員)外,另有西貢的「袁均特務機關」成員約 1,300 人、「越南華僑反共救國大同盟」(陳鐵冷、連東平)約 600 人、「南僑俱樂部」(張振帆、何羅、陳清江)等大商家 80 餘人、「佛印共榮會」(馮綽餘)約有成員 60 人、「越南華僑親日會」(林健)、「越南華僑聯合會」(黃廷興、陳使飛、劉華)、海防的「華僑保安團」(李成球)等。¹⁴此外,還有海防的「華僑參戰後援會」(梁成有、鄧友亞、蘇清哲)。¹⁵

元,與法幣自由兌換,並且同時在市面流通。外交部檔案,檔號:030.8,檔名:〈我國在越損失物資價值一覽表〉。

¹³ 國民黨黨史館,特種檔,越南,檔號:11.21.4,檔名:〈邢森洲致吳鐵城秘書長〉(1945年4月5日)。

¹⁴ 國民黨黨史館,特種檔,越南,檔號:11.7,檔名:〈邢森洲報告有關越南情報〉。

¹⁵ 國民黨黨史館,特種檔,越南,檔號:11.11.8,檔名:〈越南時事日誌〉(1944年9月份)。

據 1943 年 11 月，中國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外事處所作之「對越策動工作實施概況報告書」指出，在越南的親日華人團體眾多，足見參與人數亦復不少，茲列如表四。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國民黨聯合黨政僑團公葬抗日殉難人士，並立碑留記。在越北區計揀得 72 烈士之遺骸，於 1946 年 3 月 29 日舉行盛大公祭。¹⁶其中，33 位屬敵後工作「殉難烈士」，其餘則是「被害僑胞」（盧漢 1949：6）；南圻則是由西貢堤岸僑界立「南圻十七烈士公墓碑記」（尹鳳藻 1949：11）。當然，華人的犧牲人數並不能說明忠貞與否的民族主義或國家認同問題，對於身處殖民地的越南華人而言，既有法越殖民當局的統治，又有日軍實際的控管，僑鄉狀況不明，而中國又分裂為重慶及南京兩個政府，如何安全度過日復一日的戰時生活才是他們最大的挑戰與抉擇；指控他們是戰時叛逆（war treason），未免過於沉重。¹⁷

四、二次世界大戰後至法、越衝突期間的華人

戰爭結束後，中國戰區統帥蔣介石負責接收北緯 16 度以北的越南地區，以南則由東南亞戰區英軍負責接收（Shiu 2009: 153-203）。蔣介石派盧漢率第一方面軍前往北越接收受降，華人儼然又成為戰勝國之一員，但實際上卻為法國及「越盟」（Viet Minh）雙方所厭惡。原因是，中國企圖操縱越南的政治，將其納入勢力範圍，此舉妨害法軍及「越盟」各自想獨占統治權，理由自然是 18 萬駐軍的維持費用驚人，舉凡薪餉、食米皆取之於越南，再加上軍紀敗壞所致。另一方面，華人趁機販運物資、操縱匯兌，仍然掌控大部分的商業利益，致使越南百姓心理不滿。北緯 16 度以南的地區，因為有「越盟」的武裝獨立運動，加上高台教、和好教各擁教軍（militias）割據地方，負責接收的英軍以印度部隊為主力，和接續登陸

¹⁶ 越南華僑文化事業公司編（1949）《越南敵後工作殉國烈士暨義僑史略》。河內：越南華僑文化事業公司。

¹⁷ 國民黨中央秘書處對於「敵對」僑民輒以叛逆稱呼，如「張逆永福」，戰後亦有懲辦「敵僑」、「漢奸」，查封「逆產」之舉，因非關本文主題，茲不細究。

表四 越南親日華人團體統計

| 地區 | 名稱 | 機關所在地 | 負責人 | | 備註 |
|-------|--|-------|-----|------------|--------------------------------------|
| | | | 職別 | 姓名 | |
| 南圻 | 袁均機關部 | 堤岸 | 機關長 | 袁均 | 1941年9月由袁逆創辦內分組秘書特 工事務宣傳文化事業等六處 |
| | 新東亞日報社 | 堤岸 | 社長 | 袁均 | 1942年元旦成立 |
| | 中國日報社 | 堤岸 | 社長 | 梁康榮 | |
| | 駐越通商代表總辦事處 | 堤岸 | 代表 | 張永福 | 前偽代表林加民(珈珉)於1942年6 月免職由張逆接任 |
| | 駐越通商代表西貢辦事分處 | 堤岸 | 主任 | 黃錦輝 | 1942年11月1日成立 |
| | 佛印共榮會 | 堤岸 | 主事 | 三島文 平 | 1941年秋成立該會遂於1938年由日 本政府策動初設廈門,今移此 |
| | 南僑俱樂部 | 堤岸 | 理事長 | 陳清江 | 1942年3月6日受張逆永福策動成立 |
| | 華僑救國反共大同盟會 | 堤岸 | 主席 | 陳鐵冷 | 1939年8月21日成立受堤岸憲兵部 及袁均機關部門所用 |
| | 華僑參戰後援會 | 堤岸 | 理事長 | 張振帆 | 1943年1月17日以鈴木及張永福為 最高顧問 |
| | 南圻華僑教育協進會 | 堤岸 | 理事長 | 邱聲華 | 1943年1月5日成立受制於佛印共榮 會及袁均機關部 |
| | 瓊崖華僑協會難圻支會 | 堤岸 | 理事長 | 鄧煥芳 | 1943年1月7日成立以日領事小黑為 顧問 |
| 高砂俱樂部 | 堤岸 | 主持人 | 王慶福 | | |
| 北圻 | 駐越南商代表河內辦事分處 | 河內 | 主任 | 簡道庸 | 1941年5月成立 |
| | 駐越通商代表海防辦事分處 | 海防 | 主任 | 李立 | |
| | 國民黨越南通訊處 | 河內 | 常委 | 潘鳳山 鄧友亞 | |
| | 華僑保安團 | 海防 | 團長 | 鄧友亞 | 1941年春成立 |
| | 瓊崖華僑協會海防支會 | 海防 | 理事長 | 林清濂 | |
| | 北圻華僑參戰後援會 | 海防 | 理事長 | 陳順和 | |
| 中圻 | 華僑事務所 | 芽莊 | 主任 | 連平東 | 1942年冬季為袁均機關部所指揮 |
| | 中圻華僑參戰後援會 | 順化 | 理事長 | 羅懷 | 1943年2月成立以敵領河內及張逆永 福為最高顧問 |
| | 瓊崖華僑協會順化支會 | 順化 | 理事長 | 潘先銓 | |
| 南圻 | 高棉僑務辦公室 | 金邊 | 處長 | 徐紹倫 | 1942年8月1日成立受袁均機關部之 指揮 |
| | 高棉華僑參戰後援會 | | 理事長 | 陳順和 | 1943年1月28日成立以敵領高島及 張逆永福為最高顧問 |
| | 高棉華僑教育協進會 | | 理事長 | 陳敦楨 | 1943年3月7日成立受徐逆紹倫指揮 |
| | 瓊崖華僑協會高棉支會 | | 理事長 | 梁蓋南 | |
| 附記 | 一、本表係根據各機關駐越工作人員通報與調查 二、表列各偽組織之組織內容另表存查本表不列 | | | | |

資料來源：外交部檔案，檔號：011.1/0001，檔名：〈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外事處對越策動工作實施概況報告書〉。

表五 南圻西貢堤岸區華僑遭受法軍損害調查統計表（1945.9-11）

| 月份 | 死亡 | 受傷 | 失蹤 | 被捕 | 被劫案數 | 房屋被焚間數 | 貨物被燬案數 | 財產損失 (越幣) |
|----|----|----|----|----|------|--------|--------|--------------|
| 9 | 1 | -- | -- | -- | 8 | 40 | 12 | 877,616 |
| 10 | 10 | 11 | 1 | 4 | 24 | 92 | 14 | 1,176,654 |
| 11 | 12 | 9 | 18 | 35 | 113 | 93 | 2 | 1,447,228.70 |
| 總計 | 23 | 20 | 19 | 39 | 145 | 225 | 28 | 3,510,498.70 |

資料來源：外交部檔案，檔號：063.1，檔名：〈越南僑損〉，〈南圻西貢堤岸區華僑遭受法軍損害調查統計表〉。

的法軍聯合掃蕩「越盟」游擊隊，尤其在華人密集的地區造成很大傷害。夾處雙方衝突之間，華人不僅遭受財產損失，甚至於強暴、傷害、死亡、失蹤等案件多有所聞，中國駐越各單位時常報回中央請示處理。¹⁸

光是戰後前三個月，南圻西貢堤岸區華僑遭受英印軍、法軍的損害已經為數不少。死亡達 23 名，失蹤計 19 人，傷者有 20 人，房屋被焚燬達 225 間之多，財產損失計三百五十多萬越幣。¹⁹（請參考表五）

此外，盧漢將軍自河內報告外交部，1945 年 9 月 3 日至 1946 年 1 月 11 日止，西貢堤岸市區華人死亡 22 人、受傷 312 人、被拘禁 9 人、失蹤 8 人，物資損失達 10,693,351 越幣，現金損失達 167,197 越幣；至於郊外及南圻各地則尚在調查當中。²⁰ 兩項調查數字雖然有出入，但均足以反映問題的嚴重性。

根據南圻中華總商會 1945 年 11 月編印之《法越衝突之下越南華僑遇難損害報告書》，自 9 月 23 日起至 11 月 4 日止，越南華人遇難損害統計：

¹⁸ 國民黨黨史館，特種檔，越南，檔號：11.5.16，檔名：〈越盟非法濫捕僑民轉請設法解救〉；檔號：11.7.2，檔名：〈西貢華僑遭受法軍慘害事件〉；檔號：11.48，檔名：〈法軍搶劫案並應報總部及顧問團商決〉。

¹⁹ 外交部檔案，檔號：063.1，檔名：〈越南僑損〉，〈南圻西貢堤岸區華僑遭受法軍損害調查統計表〉。

²⁰ 外交部檔案，檔號：063.1，檔名：〈越南僑損〉。

一、遇難案件：351 宗，其中死亡 81 人、受傷 205 人；二、被英印軍姦污者（根據報載）：18 人，財產損失 13,069,573 元。據駐越中國國民黨黨部第一次呈報存案者，財產損失為 4,000,000 越幣，第二次呈報存案者，財產損失為 1,590,000 越幣，總計財產損失達 13,069,573 越幣。²¹

經中國外交部向法國政府交涉，為維護華人人身財產之安全，事關法國聲譽與利益，當以妥善辦法解決清鄉時傷及華人的問題。法國駐越最高專員發布關於維護華人安全之措施，以免在軍事行動杜絕「越盟」的活動時，對華人造成損害。法國當局認為，每次發生事件係由「越盟」惡意或因戰爭偶然性致之，惟仍應負責地方治安及維護平民安全，盡力設法維護外僑，避免再有發生誤會，故在法軍駐紮各省會可能將華人集中時，則應派華人代表人申請駐西貢總領事批准，與該地各幫幫長商洽將華人集居一處。若因時間關係無法將華人集居時，則應迅速電告南圻專員，俾立即照會駐西貢總領事，另採取辦法。茲為運輸問題、居住困難及因在地華人不欲拋棄其住戶與業產疏散別處者，法政府與西貢總領事採取下列辦法：²²

- （一）由總領事頒令各幫幫長在每省設救濟會，以省會僑領選出三人為救濟委員。
- （二）省救濟會經該省行政及軍事當局同意，選出村鄉代表一人，將每村鄉之華人人口調查登記，在最短期間內，將調查所得報告當局備案。
- （三）村鄉代表將其所屬華人人口登記，及各住戶貼住戶標誌（中國國旗下方以法、越文書明「華僑住戶」等字，在必要時加書高棉文）。

雖說此種措施係防杜誤會華人為「越盟」份子，以求在清鄉工作時能減少不幸事件之發生，但華人住戶門前貼標誌或有可能反使華人成為標靶。

1945 年 12 月，西貢華人遭受法軍慘害事件更引起河內及各地華人的

²¹ 外交部檔案，檔號：063.2，檔名：〈南越華僑被越盟殺害及損失〉。

²² 外交部檔案，檔號：063.1，檔名：〈越南中南圻華僑損失〉，〈關於維護華僑安全之措施〉。

聲援，²³河內黨部及華人各同業公會共同組織「南圻華僑後援會」，內分組織、宣傳、總務及行動四組，通電中央與盟國當局及各地華人，並遊行示威追悼慘死僑胞，此一行動刺激華人與法國之間的關係。在 1946 年 2 月 28 日「中法協定」簽署之後，越南社會對華人的看法更加惡劣。越南人對「中法協定」之觀感，等同於中國人對於蘇聯的「雅爾達密約」與「中蘇同盟友好條約」的觀感，他們認為中國將越南出賣給法國，因此更加仇恨積極準備對法國抗戰。總之，越南人民要接受並未徵詢其意見而與其國家極有關係之協約，除在報章評論之外，並決定以焦土抗戰。甚至於河內市區出現黃包車不肯拉中國人，以及發生綁架殺害落單的徒手中國官兵事件。²⁴

1946 年 3 月 6 日，發生中國占領軍與法軍衝突的「海防事件」之後，局勢更趨緊張。海防僑胞生命財產損失慘重，各地僑胞人心惶惶，紛紛呼籲中央採取有效護僑措施，²⁵甚至有武裝保僑之議，²⁶但仍由外交部循正常外交途徑為之。²⁷依據中國政府的看法，「本年 3 月 6 日有『法越初步協定』之成立，最近 9 月 15 日又有『法越臨時辦法』之簽訂，越南民族運動距獨立之目標似已接近」，似乎認為只要越南獨立之後即無華人問題。顯示中國政府的過度樂觀，對於越南華人的處境認識不清。

同年 11 月 20 日，法軍與越盟雙方在海防發生軍事衝突，越南軍隊占據華人商業區為戰場，與海防法軍激戰八天，華人生命財產慘遭蹂躪。據戰後調查所得，華人死傷五百餘人、失蹤三千餘人，被「越盟」軍逮捕者亦在 600 人以上，華人區已成爲焦土，財產損失爲約值 2 億餘越幣。²⁸海

²³ 外交部檔案，檔號：063.1，檔名：〈越南華僑財產損失〉。1945 年 12 月，南部英印軍開始撤離，由法軍接防。12 月 26 日晚，法軍在西貢中國領事館附近之街坊，挨家挨戶搶劫傷人。因爲西堤施行戒嚴令，晚間不准出門，被害華僑坐以待斃，彼此不能相互援助，待到天明向法軍司令部報告，則又以缺少證明爲口實推拖。

²⁴ 外交部檔案，檔號：012.8，檔名：〈「三六」海防事件我官民損失〉。

²⁵ 國民黨黨史館，特種檔，越南，檔號：11.2.101，檔名：〈海防法越發生衝突乞迅予有效護僑措施〉。

²⁶ 國民黨黨史館，特種檔，越南，檔號：11.7.11，檔名：〈商討保護越南華僑案〉。

²⁷ 國民黨黨史館，特種檔，越南，檔號：6.2./7.5，檔名：〈會議記錄〉（法越衝突當地華僑生命財產損失請予賠償一案）。

²⁸ 國民黨黨史館，特種檔，越南，檔號：11.2.105，檔名：〈爲法越衝突殃及華僑請即機請救濟

表六 海防市及安陽區華僑遭受損害調查統計表

| | | | | | |
|------|-------------------------------|----------------|--------|------|------|
| 海防 | 調查表自 1 號至 656 號計 656 份 | | | | |
| 財產損失 | 源於法方 | 18,540,624 越幣 | | | |
| | 源於越方 | 3,565,085 越幣 | | | |
| | 不詳 | 23,312,478 越幣 | | | |
| | 合計 | 45,418,187 越幣 | | | |
| 生命損失 | 死亡 | 源於越方 | 共 9 人 | 合計 | 16 人 |
| | | 源於法方 | 共 7 人 | | |
| | 受傷 | 源於越方 | 共 3 人 | 合計 | 12 人 |
| | | 源於法方 | 共 9 人 | | |
| | 被捕 | 源於越方 | 共 47 人 | 合計 | 47 人 |
| | | 源於法方 | 無 | | |
| 失蹤 | | 共 61 人 | 合計 | 61 人 | |
| 安陽 | 調查表自 1 號至 38 號計 38 份 | | | | |
| 財產損害 | 源於法方 | 共 7,765,820 越幣 | | | |
| | 源於越方 | 共 23,000 越幣 | | | |
| | 合計 | 共 7,788,820 越幣 | | | |
| 生命損害 | 死亡 | 源於法方 | 11 人 | 源於越方 | 3 人 |
| | 受傷 | 源於法方 | 3 人 | | |
| 備註 | 安陽華僑遭受生命損害要求撫卹金額 2,120,000 越幣 | | | | |

資料來源：外交部檔案，檔號：063.1，檔名：〈越南華僑因法軍不法行為所受損失統計〉。

防、河內各界並先後成立「海防華僑善後委員會」及「河內華僑互助會」，辦理緊急救濟事宜。

根據「海防善後委員會」發表海防華人損失第七次調查，華人住宅完全被毀者 81 間，部分被毀者 176 間，除損壞及部分被毀各 10 間，未予估計外，損失共 13,763,225 越幣，計財物損失為 58,671,398 越幣、港幣 1500 元、國幣 61,861,506 元、海關金 62,550,000 元，僑民失蹤 625 人，被捕人數 236 人，死亡 76 人，共計 937 人。²⁹至於該委員會調查的確實數字因為資料所限，總額已不可知。1947 年 10 月間，海防中華會館提報總領事館的統計，顯示華人遭受損害的情形仍持續發生。³⁰（請參考表六）

並進行護僑〉。

²⁹ 外交部檔案，檔號：063.1，檔名：〈越南海防華僑損失〉。

³⁰ 外交部檔案，檔號：063.1，檔名：〈越南華僑因法軍不法行為所受損失統計〉。

表七 越北華人損失統計

| 越北華僑遭受損害調查統計表 (由 1946 年 12 月 19 日至 1947 年 11 月底止) | | | | | |
|--|-------------|----|----|-----|---|
| 地名 | 財產損失 | 死亡 | 受傷 | 失蹤 | 附註 |
| 河內 Ha Noi | 130,261,467 | 37 | 16 | 196 | 共 696 份 (由河字第 1 號至河字第 696 號) |
| 順化 Hue | 7,610,120 | -- | -- | -- | 共 107 份 (由順字第 1 號至順字第 107 號) |
| 府里 Phu Ly | 2,056,750 | -- | -- | -- | 共 16 份 (由府字第 1 號至府字第 16 號) |
| 諒山 Lang Son | 109,200 | 1 | -- | -- | 共 3 份 (由諒字第 1 號至諒字第 3 號) |
| 南定 Nam Dinh | 12,932,226 | 21 | 7 | 1 | 共 139 份 (內缺第 126 實共 138 份) (由南字第 1 號至南字第 139 號) |
| 海陽 Hai Duong | 571,470 | -- | -- | -- | 共 6 份 (由海字第 1 號至海字第 6 號) |
| 河東 Ha Dong | 1,184,450 | -- | -- | 2 | 共 10 份 (由東字第 1 號至東字第 10 號) |
| 北寧 Bac Ninh | 2,049,526 | -- | -- | -- | 共 13 份 (由北字第 1 號至北字第 13 號) |
| 峴港 Da Nang | 5,469,850 | 5 | 2 | 3 | 共 114 份 (由峴字第 1 號至峴字第 114 號) |
| 和平 Hoa Binh | 883,000 | -- | -- | -- | 共 2 份 (由和字第 1 號至和字第 2 號) |
| 總計： | 163,128,060 | 64 | 25 | 202 | |

資料來源：外交部檔案，檔號：063.1，檔名：〈越南北圻華僑損失〉。

一份越南北圻華人損失的報告顯示，自 1946 年 12 月法軍與越盟衝突以來，華人遭受的生命和財產損失非常嚴重，有 266 人死亡或失蹤，25 人受傷，損失財物高達 163,128,060 越幣。³¹（請參考表七）

第二批越北華人遭受財產損害的分類表沒有傷亡統計，但是對於加害者則給予區別，這可能是為日後求償方便而做，總計財物損失達 287,368,250 越幣。³²（請參考表八）

至於南部華人的損失，據駐西貢總領事尹鳳藻報告，自 1946 年 11 月

³¹ 外交部檔案，檔號：063.1，檔名：〈越南北圻華僑損失〉。

³² 外交部檔案，檔號：063.1，檔名：〈越南老街華僑損失〉，〈越北華僑遭受財產損害第二批分類表〉。

表八 越北華人損失第二次統計

| 地點 | 受法方損害 | 受越方損害 | 侵犯者不明 | 合計 |
|----------------------|------------|---------------|-------------|---------------|
| 河內 Ha Noi | 25,936,000 | 3,549,000 | 355,813,000 | 385,298,000 |
| 北江 Bac Giang | 7,031,000 | 1,145,393,000 | 16,270,000 | 1,168,694,000 |
| 北寧 Bac Ninh | 9,580,000 | 155,300,000 | 295,595,000 | 460,475,000 |
| 北泮 Bac Kan | 19,480,000 | | | 19,480,000 |
| 海陽 HaiDuong | 16,150,000 | 27,030,000 | 57,100,000 | 100,280,000 |
| 河東 Ha Dong | 4,050,000 | 11,685,000 | | 15,735,000 |
| 那岑 Na Sam | | 64,053,000 | | 64,053,000 |
| 宣光 Tuyen Quang | 663,750 | 53,800,000 | 18,889,500 | 37,753,250 |
| 總計 | 82,890,750 | 1,460,810,000 | 743,667,500 | 2,287,368,250 |

資料來源：外交部檔案，檔號：063.1，檔名：〈越南老街華僑損失〉，〈越北華僑遭受財產損害第二批分類表〉。

27 日至 1947 年 1 月 14 日，南圻檳榔 (Ben-Tre) 發生法越軍隊焚劫慘殺華人案 5 件，7 人死亡，財產損失 925,916 越幣；朱篤 (Chau-Doc) 發生法棉 (franco-khmer) 軍隊焚劫及被鄉公所官吏率領高棉人慘殺華人共五案，13 人死亡、被捕 1 人，財產損失據報 903,200 越幣；茶榮 (Tra-Vinh) 發生法棉軍隊慘殺華人案 1 件 2 人死亡；瀆臻 (Soc-Trang) 附近遭受焚劫難僑五百餘人，永隆 (Vinh-Long) 發生法軍焚劫案 4 件，死亡 2 人、難僑三百餘人，財產損失據報者 843,080 越幣，葩地 (Ba Ria) 發生法軍焚劫案三件，財產損失達 615,400 越幣。³³總領事館續呈 1947 年 2 月南圻華人損失表 385 份，計輕傷 426 人、重傷 295，失蹤未成年 19 人、成年 98 人，死亡未成年 156 人、成年 512 人，被姦 8 人，被捕 963 人，財產損失計 47,680,099,668 越幣。之後的 3 月份，南圻中圻南部及高棉華人損失表 516

³³ 外交部檔案，檔號：063.1，檔名：〈越南中南圻華僑損失〉。

表九 南越華人損失統計（1946.11-1947.2）

| 時期 | 財產損失 (越幣) | 死亡 | 失蹤 | 重傷 | 輕傷 | 被姦 | 被捕 | 備註 |
|---------------------------|----------------|----------------------|-----------------|-----|-----|----|-----|-----------------------|
| 1946.11.27- 1947.01.14 | 3,287,596 | 22 | 不明 | 不明 | 不明 | 不明 | 不明 | 難僑 8-9 百人 |
| 1947.02 | 47,680,099,668 | 成人 512 未成年 156 | 成人 98 未成年 19 | 295 | 426 | 8 | 963 | 385 份統 計表 |
| 1947.03 | 48,720,283,768 | 成人 516 未成年 156 | 成人 98 未成年 19 | 296 | 430 | 8 | 963 | 516 份統 計表含高 棉地區 |

資料來源：外交部檔案，檔號：063.1，檔名：〈越南中南圻華僑損失〉。

份統計表顯示，輕傷 430 人、重傷 296，失蹤未成年 19 人、成年 98 人，死亡未成年 156 人、成年 516 人，被姦 8 人，被捕 963 人，財產損失計 48,720,283,768 越幣。³⁴（請參考表九）

駐西貢總領事尹鳳藻於 7 月 31 日報告，該館 6 月底收到材料截止時之統計，計（一）整理完竣之調查表經呈送有案者：死亡成年 134 人，未成年 31 人；失蹤成年 44 人，未成年 17 人；重傷 118 人，輕傷 121 人，被捕 621 人；被姦 7 人；應賠款額 26,842,000 越幣；財產損失達 88,295,761 越幣。（二）整理中之調查表：死亡成年 140 人，未成年 26 人；失蹤成年 27 人，未成年 2 人；重傷 41 人；輕傷 204 人；被捕 251 人；被姦 1 人；應賠款額 22,948,000 越幣；財產損失達 130,699,236 越幣。（三）莪貢、蓄臻、新香、富壽、嘉定、涇共等專案：全部死亡成年 135 人，未成年 63 人；失蹤成年 2 人；重傷 38 人；輕傷 34 人；被捕 1 人；應賠款額 21,048,000 越幣；財產損失（泳濂案已具報）達 12,933,837 越幣；總計死亡成年 409 人，未成年 120 人；失蹤成年 73 人，未成年 19 人；重傷 197 人，輕傷 359 人；被捕 873 人；被姦 8 人；應賠款額 70,838,000 越幣；財產損失達

³⁴ 同前引。由於無法判斷檔案中有關 1947 年 2 月的 385 份統計及 3 月份的 516 份統計是否為累計資料，故不予加總。然而，對照西貢總領事館 7 月之報告，二者似為分別之每月統計資料。

表十 越南中南圻華僑遭受損失調查統計

| 項 目 調 查 表 | 死亡 | | 失蹤 | | 重傷 | 輕傷 | 被捕 | 被姦 | 應賠款額 (越幣) | 財產損失 (越幣) |
|-----------------------|-----|-----|----|-----|-----|-----|-----|----|--------------|--------------|
| | 成年 | 未成年 | 成年 | 未成年 | | | | | | |
| (一) | 134 | 31 | 44 | 17 | 118 | 121 | 621 | 7 | 26,842,000 | 88,295,761 |
| (二) | 140 | 26 | 27 | 2 | 41 | 204 | 251 | 1 | 22,948,000 | 130,699,236 |
| (三) | 135 | 63 | 2 | -- | 38 | 34 | 1 | -- | 21,048,000 | 12,933,837 |
| 總計 | 409 | 120 | 73 | 19 | 197 | 359 | 873 | 8 | 70,838,000 | 231,928,835 |

資料來源：外交部檔案，檔號：063.1，檔名：〈越南中南圻華僑遭受損失調查統計〉。

231,928,835 越幣。這些統計由外交部彙整後向法國提出交涉，要求賠償。³⁵
(請參考表十)

法國外交部也對中國提出賠償要求，1947年5月，通知中國駐巴黎大使錢泰，華軍占領越北期間，法方所受公私損失共202,000,000越幣，分別為奪去工具、貨物、原料、家具，欠付房租、薪工，強迫兌換華幣，徵收攫奪現款，兌換廢幣，毀壞工具、不動產、貨物、橋路等，1946年3月6日的海防衝突事件，4月21日之河內衝突事件，造成法軍死傷撫卹等，前列損失中國方面將如何處理，請速答覆。³⁶

中國國民黨海外部曾經在1947年6月通知越南華人已向法方要求賠償，法方擬組中法委員會從事審查，行政院僑務委員會也在8月電知越北華人，法越衝突時遭受之損失決定依法律解決。³⁷然而，國共內戰使政局急轉直下，1949年以後中國易幟，更屬無望；所謂擬組中法審查委員會及法律解決全無結果。時隔六年，1951年時猶有越南華人提出建議辦法，呼籲解決賠償的懸案，但希望終究落空。³⁸

³⁵ 外交部檔案，檔號：063.1，檔名：〈越南中南圻華僑遭受損失調查統計〉。

³⁶ 外交部檔案，登記號：020000000732A，檔名：〈越北受降期間法方損失〉，pp.18-19〈外交部收電第6277號〉。

³⁷ 外交部檔案，檔號：063.1，檔名：〈越南華僑財產損失〉。

³⁸ 同前引。

五、結論

從前述資料來看，在日軍進駐法屬印度支那期間，華人所遭受的損失似乎較隨後的法軍越盟衝突來得輕微。這並非日軍獨厚於華人，而是日本當局對於華人在印度支那的經濟角色有過研究，故而採取懷柔政策。³⁹

以東南亞各地華人情況比較，同為日本「友邦」的泰國與法屬印度支那相較，在越南華人協助日本的情況比泰國華人來得嚴重。因為日本與法國維琪（Vichy）政府不僅有軍事協定也有經濟協定，越南稻米等戰略物資在 1941 年之後就只能出口供給日本和其占領區之所需，不得輸出到第三國，因此在經濟、物質上，越南華人資助日本的情形也比泰國多。除了南京汪精衛政府的成立使越南華人親日、附日的情形較多之外，僑居地是否捲入戰爭也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至法國重返殖民地與越盟發生衝突期間，夾處其間的華人就無所逃避，身處戰場，遭受嚴重的損失。中國政府也因國內局勢急遽變化，無法顧及華人切身利益。原先中華民國政府的行政院賠償委員會蒐集各地損失資料，提供遠東委員會商討日本賠償問題，終因無法參加 1951 年 9 月舊金山對日本和會而無法求償。同樣地，負責審查越南僑損的中法審查委員會也因中華民國政府流亡台北而無法實行。

在戰爭期間居住越南的華人社會遭受多少損失實際難以估算，精神痛苦不論，只求苟全身家性命於亂世，物資的損失只是供作參照，本文僅能以有限的資料提供一個面向。

³⁹ 中島宗一（1939）《佛領印度支那に於ける華僑》是此類研究代表作。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 中島宗一 (1939)《佛領印度支那に於ける華僑》。東京：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
- 尹鳳藻 (1949)〈南圻十七烈士公墓碑記〉。見越南華僑文化事業公司出版部彙編《越南敵後工作殉國烈士暨義僑史略》。河內：太平洋印務局。頁 11。
- 外交部檔案，檔號：011.1/0001，檔名：〈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外事處對越策動工作實施概況報告書〉。
- 外交部檔案，檔號：012.8，檔名：〈「三六」海防事件我官民損失〉。
- 外交部檔案，檔號：030.8，檔名：〈我國在越損失物資價值一覽表〉。
- 外交部檔案，檔號：063.1，檔名：〈越南中南圻華僑損失〉。
- 外交部檔案，檔號：063.1，檔名：〈越南中南圻華僑遭受損失調查統計〉。
- 外交部檔案，檔號：063.1，檔名：〈越南北圻華僑損失〉。
- 外交部檔案，檔號：063.1，檔名：〈越南老街華僑損失〉，〈越北華僑遭受財產損害第二批分類表〉。
- 外交部檔案，檔號：063.1，檔名：〈越南海防華僑損失〉。
- 外交部檔案，檔號：063.1，檔名：〈越南僑損〉。
- 外交部檔案，檔號：063.1，檔名：〈越南華僑因法軍不法行爲所受損失統計〉。
- 外交部檔案，檔號：063.1，檔名：〈越南華僑財產損失〉。
- 外交部檔案，檔號：063.2，檔名：〈南越華僑被越盟殺害及損失〉。
- 外交部檔案，登記號：020000000732A，檔名：〈越北受降期間法方損失〉，pp.18-19〈外交部收電第 6277 號〉。
- 朱楔 (1946)《越南受降日記》。上海：商務印書館。
- 李白茵 (1990)《越南華僑與華人》。桂林：廣西師範大學。
- 李盈慧 (2003)《抗日與附日——華僑、國民政府、汪政權》。台北：水牛。
- 洪根松 (1981)《外交官歷難記》。台北：作者。
- 國民黨黨史館，特種檔，越南，檔號：6.2./7.5，檔名：〈會議記錄〉(法越衝突當

- 地華僑生命財產損失請予賠償一案)。
- 國民黨黨史館，特種檔，越南，檔號：11.2.101，檔名：〈海防法越發生衝突乞迅予有效護僑措施〉。
- 國民黨黨史館，特種檔，越南，檔號：11.2.105，檔名：〈爲法越衝突殃及華僑請即機請救濟並進行護僑〉。
- 國民黨黨史館，特種檔，越南，檔號：11.5.16，檔名：〈越盟非法濫捕僑民轉請設法解救〉。
- 國民黨黨史館，特種檔，越南，檔號：11.7，檔名：〈邢森洲報告越南現勢〉。
- 國民黨黨史館，特種檔，越南，檔號：11.7.2，檔名：〈西貢華僑遭受法軍慘害事件〉。
- 國民黨黨史館，特種檔，越南，檔號：11.7.11，檔名：〈商討保護越南華僑案〉。
- 國民黨黨史館，特種檔，越南，檔號：11.11.8，檔名：〈越南時事日誌〉(1944年9月份)。
- 國民黨黨史館，特種檔，越南，檔號：11.21.4，檔名：〈邢森洲致吳鐵城秘書長〉，1945.4.5。
- 國民黨黨史館，特種黨，越南，檔號：11.48，檔名：〈法軍搶劫案並應報總部及顧問團商決〉。
- 國民黨黨史館，特種黨，越南，檔號：30.257，檔名：〈張逆永福擬遊說僑領朱繼興張振帆案〉。
- 許文堂(2004)〈第二次大戰時期中、日、法在越南的衝突與交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4：63-101。
- 陳恭澍(1983)《河內汪案始末》。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
- 陳達(1938)《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上海：商務印書館。
- 陳碧純(2002)〈日本對越南米穀控制之研究，1940-1945〉。埔里：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鴻瑜(2004)《中華民國與東南亞各國外交關係史》。台北：鼎文書局。
- 華僑志編纂委員會(1958)《越南華僑志》。台北：華僑志編纂委員會。
- 越南華僑文化事業公司編(1949)《越南敵後工作殉國烈士暨義僑史略》。河內：越南華僑文化事業公司。
- 黃國安等編(1988)《近代中越關係史資料選編》(下冊)。南寧：人民出版社。

盧漢 (1949) 〈敵後工作殉難烈士暨被害僑胞公墓碑記〉。見南華僑文化事業公司出版部彙編《越南敵後工作殉國烈士暨義僑史略》。河內：太平洋印務局。頁 6。

西文部分：

Annuaire Statistique de l'Indochine (1930-1931) tome. 3. Hanoi: Imprimerie d'Extrême-Orient.

Robequain, Charles (1939) *L'évolution économique de l'Indochine française*. Paris: Centre d'études de politique étrangère.

Shiu, Wen-Tang (2009) "The Chinese Military occupation of French Indochina post World War II." in 亞太研究論壇 (Asia-Pacific Forum), 45, Taipei: Academia Sinica, Capas. pp.153-203.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1960)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Vietnam* (1959), vol. VII. Saigon: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The Times (London), 1944.2.10, 1945.1.9, 1946.1.9, 1947.1.9, 1948.1.9.

Tsai, Maw-Kue (1968) *Les Chinois au Sud-Vietnam*.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民族認同與母語教育：戰後砂拉越地區華文中學之研究*

曹淑瑤**

中文摘要

二次大戰之後，東南亞各殖民地的土著民族主義蓬勃發展，激起人民爭取獨立以建立國家。處在這樣的政治局勢中，砂拉越的統治者，不論是英殖民地政權或馬來西亞的主政者，皆視教育為一種統治的手段，企圖建立一個以統治族群的文化為核心價值的國家。在這種政策下，砂拉越華族母語教育的發展空間，自然遭受嚴重的擠壓，然而，今日砂拉越境內仍擁有 233 所華文小學及 14 所華文中學，以傳承華族的文化為其辦學使命。本文擬就二次大戰後，砂拉越華族如何在強調單一語文教育的環境下，在中等教育階段為維護母語教育所做的種種努力加以探討，期盼提供吾人對砂拉越華族的文化傳承有進一步的瞭解。

關鍵字：馬來西亞、砂拉越華族、民族認同、文化認同、華族母語教育

* 本文初稿宣讀於 2009 年 4 月 25 日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舉行的「2009 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本文之撰寫承馬來西亞董教總、古晉中華第一、三、四中學、詩巫公教中學、美里廉律中學和泗里奎私立中學提供資料和協助，對淡江大學陳鴻瑜教授、林若雱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李盈慧教授、林開忠教授的鼓勵，及匿名審查人之寶貴意見，東海大學古鴻廷教授及馬來西亞拉曼大學張曉威教授的指正，特此致謝。

** 本文作者為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E-mail: shuyao@thu.edu.tw
本文收件日期為 2010 年 07 月 06 日，接受刊登日期為 2010 年 11 月 16 日

National Identity and Chinese Education: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High Schools in Post-war Sarawak

Shu-yao TSAO

Abstract

After the WWII, the native nationalism was prosperous in the Southeast Asia. The Sarawak government employed education to build a common identity, the Chinese education was excluded from the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Nonetheless, there are still 233 elementary schools and 14 high schools taught in Mandarin Chinese in Sarawak. In this paper, I try to make an inquiry into the emergence, development and impact of the Chinese high schools in Sarawak.

Keywords: Malaysia, Sarawak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cultural identity, Chinese vernacular education

一、前言

近代歐洲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興起，促成民族國家的建立，國家教育被視為民族建構的重要策略之一，因為教育之重要性即灌輸國民「一個民族／國家的形式」，而語言則被視為民族認同的基礎，因此，各種宣傳或教育媒介皆須採用單一且共同的語言來進行，導致這些民族國家境內弱勢的方言被系統化地摧毀（Hayes 1953: 26, 63, 64）。近代歐洲民族主義也間接造成這些歐洲的民族國家在亞非地區掠奪殖民地的競爭，且隨著民族主義思潮的傳播，各殖民地的土著民族主義在一次大戰期間興起，在二次大戰後蓬勃發展。而這種發展，一方面激發殖民地人民先後爭取獨立成為新興國家，另一方面則促成各殖民地政府在新興土著民族主義的壓力下，企圖以當地多數族群為典範，去塑造一個共同文化、共同語文的虛擬群體。在婆羅洲砂拉越¹的英國統治者，不論是布洛克家族（The Brookes）²或英殖民地政府，³都把教育作為一種統治的手段（Ooi 1996: 1）。當原英屬馬來亞及婆羅洲地區合組為馬來西亞聯邦（Federation of Malaysia）⁴時，主導當地政治的馬來族群菁英，⁵在其建國過程中，卻忽略了本地區多元種族、多元文化的現實，仿歐洲殖民母國民族主義的模式，致力於建立以馬來文化為核心價值的國家。⁶馬來族群領袖企圖以政治力量去塑造單一

¹ Sarawak 一詞有「砂勞越」、「砂勝越」、「沙羅越」與「砂拉越」等譯名。馬來西亞華語規範理事會於 2004 年 4 月宣布統一譯為「砂拉越」，見星洲日報（2004）、南洋商報（2005）。

² 1841 年英國人詹姆士·布洛克（James Brooke）因協助汶萊蘇丹平亂而受封為白人拉惹（White Raja）。詹姆士·布洛克原本受封的領地只有拿督海角（Cape of Dato）迄砂隆河（Sadong River）間，大約 3,000 平方英里的土地，經過他與第二任拉惹查爾斯·布洛克（Charles Brooke）兩代的經營，疆域逐漸擴展至美里（Mari）、老越（Lawas）、林夢（Limbang）一帶，總面積達 47,500 平方英里，也就是今日砂拉越的地理範圍，見黃建淳（1999: 159-165）、林宜慧（1999: 17-18）、Andaya（1982: 125）。

³ 砂拉越在布洛克家族統治期間，先後於 1850 年及 1864 年時被美國及英國承認為主權獨立的國家。經歷二次大戰期間日本短暫的占領後，重獲政權的布洛克家族於 1946 年 7 月將主權讓渡給英國政府，砂拉越從此成為英國的殖民地，直至 1963 年 9 月加入馬來西亞為止；見 Ooi（1996: 11-12）。

⁴ Federation of Malaysia 的中文譯名，參閱許雲樵（1963: 250-252），在今日的馬來西亞亦常有人稱其為「馬來西亞聯邦」。

⁵ 1948 年馬來亞聯邦（Federation of Malaya）協議時，英國政府承認馬來亞基本上是「馬來人的國家」，從而確立了馬來主權在馬來亞國族建構過程中的定位，見 Cheah（2002: 3）。

⁶ 有關馬來土著民族主義的出現與英殖民者間的討論，見 Roff（1967: 1-31）；至於英殖民地政府

文化為主體的現代國家，這種馬來化的政治決策自然對當地華族的母語教育造成衝擊。近來研究發現，近代馬來亞地區的華族民族認同之興起，固與族群所受的教育有密切關係，但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畢竟有相當的差異（古鴻廷 2003：4），當地華族認為母語⁷教育的維護與發揚並不至於會影響其對移居地國家的效忠，⁸然而，主導馬來西亞聯合邦政局的馬來族群菁英卻在其國家建構過程中，阻礙其發展。⁹

砂拉越的華文教育約至二十世紀初才在華族社群的努力下穩定地發展，¹⁰但當地白人拉惹政府卻自 1920 年代起陸續頒布有關學校津貼、註冊、教學媒介語、教科書的法令，¹¹企圖將華文學校置於其監督與控制之下（黃招發 2004：3；Ooi 1996: 21-23）。二次大戰以後，白人拉惹將政權讓渡予英國，新成立的砂拉越英殖民地政府為「保護他們既得的政治和經濟利益」，¹²亦制定許多不利華文教育發展的教育政策（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991b：188）。在馬來亞聯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境內，依 1960 年《達立報告書》擬定的《1961 年教育法令》實施後，出現了許多的華文獨立中學，¹³雖然此時馬來亞聯合邦的教育法令之效力尚未到達

對馬來族群的偏袒，見 Roff（1967: 113-125）。

- ⁷ 早在 1951 年時，吳德耀即指出，當時馬來亞地區不同方言群的華族之母語為華語（Mandarin，原鄉中國的國語），見 Federation of Malaya（1951: 33）。
- ⁸ 例如二次大戰結束後，砂拉越華族所創立的古晉中華中學和中華小學第一、二、三、四、五校歌，雖以中文撰寫，但校歌內容強調當地華族為砂拉越的兒女，砂拉越是他們的母親，同時也明言學校希望培育出當地的「好公民」，見統籌統辦五十週年特刊編委會（1998：5）。2009 年時，《星洲日報》副總編輯林瑞源就公開表示：「不管別人怎樣看，不管是貶低，還是讚揚，『華教工作』者都必須堅持，不斷革新，為國家和民族發光發熱。」顯然，林瑞源（2009）認為，馬來西亞華族的母語教育及其對華族的「民族」認同，並不影響其對馬來西亞的國家認同與效忠。
- ⁹ 古鴻廷（2003：3-5）在其《教育與認同》一書中認為，馬來亞地區華族重視華文教育的思想與行動，被新興的馬來土著民族主義運動者視為「大漢沙文主義」而須加以壓制。古氏進一步指出，母語教育所滋生對中華文化的認同，不影響華族對當地政府的政治認同。
- ¹⁰ 有關砂拉越地區早期的華文教育，見黃建淳（1999：379-393）。
- ¹¹ 1924 年 1 月公布的《學校津貼款章十條》，規定所有接受政府津貼的學校須將英文或馬來文列入課程，同年 9 月公布的《禁止華僑教授國語條例》，嚴禁任何學校講授國語（華語），10 月公布的《學校註冊法令》，規定所有學校都須註冊才能開課。相關法規全文，請參見黃招發（2004：196-198）、林之光與朱化雨（1936：132-135）。
- ¹² 砂拉越州第一副首席部長暨基本設施發展及旅遊部長丹斯里拿督阿瑪黃順開醫生的〈獻詞〉，見 1995 年校刊暨卅五周年校刊編委會（1995：5）。
- ¹³ 有關馬來亞地區華文獨立中學的討論，見古鴻廷（2001：23-40）。

砂拉越，但是，砂拉越英殖民地政府為推動其針對境內已實施的教育所擬定的「改制計畫」(The Conversion Plan)時，先後頒布了《國家中等教育白皮書》、《新教育法令》，與馬來亞聯合邦的《達立報告書》及《1961年教育法令》相當類似，規定中學教育必須以英語文為教學媒介語，否則將自1962年4月起撤銷津貼金(沈玉池 1984: 25-28)，對砂拉越的華族母語教育發展造成嚴重的影響(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991b: 188)。今日砂拉越的華人僅占全馬華人人口的10%，但卻擁有233所華文小學、14所華文中學，¹⁴為何有此現象？《國家中等教育白皮書》與《新教育法令》實施後，這些所謂的華文「獨立」中學如何能繼續經營？近年來因原鄉中國的經濟崛起所帶動的華語文熱潮，是否對砂拉越的華文教育發展帶來新的契機？針對這些特殊現象，至今仍少有人做全盤性的研究，¹⁵因此，本文擬就二次大戰後，砂拉越華族如何在強調單一語文教育以便形塑單一文化的政治認同環境下，在中等教育階段維護母語教育的努力做一探討，期盼提供吾人對砂拉越華文教育這一重要課題有進一步的瞭解。

二、戰後砂拉越的教育政策與華文中學之發展

砂拉越地區的華文學校原由當地華族社會所創立，由華社提供主要經費來源。二次大戰前，絕大多數的華文學校都是華文小學，提供中等教育

¹⁴ 截至2007年，馬來西亞有華文小學1,289所，華文國民型中學78所，華文獨立中學60所(沈天奇 2008: 89-92)。

¹⁵ 目前學界對於砂拉越華文教育的研究，有黃招發(2004)的《砂勞越華教百年坎坷路》，主要依據歷史脈絡，呈現華文教育在砂拉越受到執政當局壓制的過程；Ooi Keat Gin(1994)的“Chinese Vernacular Education in Sarawak during Brooke Rule, 1841-1946”，探討在白人拉惹時期自由放任的教育政策下，華文學校的發展情形，Ooi認為該階段的華校教育是原鄉中國教育的延伸，因此造就了華校畢業生的「中國傾向」及缺乏對砂拉越的歸屬感，該文後收錄於*World Beyond the Rivers: Education in Sarawak from Brook Rule to Colonial Office Administration, 1841-1963*(1996)，而Ooi在該書又進一步探討了戰後砂拉越英殖民地政府的教育政策，認為1960年代華校反對改制的活動是由共產主義份子所主導的。古鴻廷、張曉威與曹淑瑤(2001)曾共撰〈東馬來西亞地區華文獨立中學之研究〉，對於戰後砂拉越的華文教育有概論性的探討。楊佳佳(2010)的〈政府的教育政策對砂拉越華文教育發展的影響(1841-1989)〉著重在布洛克時期、英殖民地時期與馬來西亞成立後，砂拉越教育政策之制訂與演變。此外，莫順生(2000)的《馬來西亞教育史》以及鄭良樹的《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1998, 1999, 2001, 2003)，則是在砂拉越作為馬來西亞一部分的前提下，對砂拉越教育稍作介紹；而黃建淳(1999)的《砂拉越華人史研究》，是一部對砂拉越華族做系統性敘述的通史，有關華文教育的部分也有通論性的介紹。上述這些研究在時間與主題上，均有需要再做更進一步的探討。

的學校則以「初中」為主（Ooi 1996: 24）。在 1937 年時，全砂拉越有 141 間華文學校，僅有古晉的民德學校、越光學校，詩巫的中正學校、中華學校、中興學校、光華學校、敦化學校、衛理學校，泗里奎的華僑中學及民丹莪的開中學校等 10 間學校提供初級中學課程（黃招發 2004: 2）。戰後，英殖民地政府接掌砂拉越，為凝聚境內多元族群間的團結以及使人民對砂拉越效忠，英殖民地政府決定建立一個以英語文為教學媒介的國家教育系統，並自 1948 年起，透過地方政府以津貼的方式逐步介入小學的經營。1955 年 6 月，英殖民地政府又頒布《教育津貼白皮書》（*On Financing of Education in Sarawak*），規定自 1956 年 1 月起，學校的主要經費由政府與學校董事會平均分攤（Ooi 1996: 13, 113, 120-121）。然而，一旦學校的經營開始仰賴政府對其經費的補助，也就意味著政府對學校的經營與教育能產生相對的影響力，例如：砂拉越政府就規定接受津貼的學校，其校長與教師的聘任必須獲得教育部長的批准，董事會必須呈交學校收支報告（楊佳佳 2010: 36），1957 年又規定受津貼的學校只能招收小學會考及格的 30% 適齡學生（沈玉池 1984: 56；黃招發 2004: 5）。

1960 年初，砂拉越英殖民地政府發表《砂拉越中等教育報告書》（*Report on Secondary Education*），又稱為《麥里倫報告書》（*McLellan Report*），明文指出學校應是砂拉越人民的學校，華文學校以母語為教學媒介語，可能引發其他民族敵視華人的情緒，並進一步指責華校以華語文教學會造成砂拉越地區族群間的分裂，也會使畢業生不易就業（McLellan 1959:3-5, 50）。為塑造一個符合砂拉越利益的社會，該報告書認為砂拉越英殖民地政府應使各族學生在同一個教育制度下受教育，建議政府將華文中學改制為英文中學（McLellan 1959:5-6）。1961 年 1 月 27 日，砂拉越教育部長狄遜（Murray Graeme Dickson）發函給所有中等學校，要求各校除土族科目與華語課外，自 1963 年起逐年將教學媒介語由華語改為英語。¹⁶教育部長解釋這項改制

¹⁶ 由於華校的數量與學生人數眾多，這項改制計畫的推動，首當其衝的就是華校，因此華教人士稱此計畫為「華文中學十年改制計畫」（黃招發 2004: 6），或「華文中學以英語文教學媒介十年改制計畫」（劉伯奎 1985: 169）。依此計畫，教學媒介語的改變將從初中一年級開始，逐年由華文改為英文，大部分華文中學將自 1963 年開始實施，「華校初中轉變後，到 1966 年

計畫的目的在於促使境內各族群學生能用共同語言一起學習，有助於民族團結，也可協助解決華校畢業生的失業問題（黃招發 2004：6-7），其於 1961 年 3 月 9 日回覆古晉中華學校董事會的信函中，也強調砂拉越英殖民地政府計畫建立的教育制度在於「養成所有砂拉越人民，都有一致的及親如兄弟的觀念……因之在中學的教學媒介語必須統一」。¹⁷

1961 年 6 月，砂拉越立法議會通過《國家中等教育白皮書》，強調中等教育是「基於以英語為教學媒介之學校制度」，不遵從此一規定的學校，砂拉越政府將自 1962 年 4 月 1 日起不再發給津貼金（沈玉池 1984：27-28）。緊接著在 9 月 1 日，砂拉越政府便正式頒布《新教育法令》，規定董事會成員須超過 12 人，且教育部長有權吊銷學校的登記，拒絕校董、教師之註冊，例如：若教育部長認為「此人之品格並不能使教育部長滿意；或他認為此人之註冊對砂勞越的利益或一間學校或擬開辦學校所在區的居民或一間學校學生或擬開辦學校學生將不利者」，可拒絕其教師資格的註冊；同時，《新教育法令》也規定學生組織社團與活動必須獲得教育部長的許可（黃招發 2004：206-212）。自此，砂拉越的中學分為津貼學校和非津貼學校，如果接受政府津貼，學校主導權歸教育部，董事會的權力也相對地被削減，學校不再以華語為教學媒介語，也只能錄取 30% 適齡的小學畢業生。

自 1950 年代中期至 1960 年代初期，在砂拉越英殖民地政府逐步建立國家教育系統的過程中，學校與學生人數最多的華文教育自然也就受到最大的衝擊。為了解決高達 70% 的小學會考不及格學生及超齡生的升學問題，位於古晉、詩巫與美里的華社乃創辦了古晉中華第四中學、詩巫公民中學及美里培民中學，而地處偏遠的晉連路十七哩華社則成立民眾中學方便子弟就讀，也有熱心華文教育的天主教會於詩巫成立公教中學（黃招發 2004：54，66，134，146）。基於這樣的創辦背景，這幾所華文中學成立

會有第一批以英文為教學媒介語的畢業生可參加初中會考，1967 年 1 月，高中一年級才開始以英文授課。」砂拉越教育部關於改制計畫的通知信函，請參見沈玉池（1984：21-22）。

¹⁷ 砂拉越教育部長狄遜的信函，全文請參見沈玉池（1984：23）。

時就沒有接受政府的津貼，日後也沒有響應英殖民地政府的改制政策，成為華文「獨立」中學。也有一些自 1956 年起接受政府津貼的學校，在堅持維護與辦理華文教育的理念之下拒絕改制，例如：詩巫光明中學董事會於 1961 年通過不接受改制（黃招發 2004：91-94），古晉中華中學在 1961 年 2 月 8 日召開的董事會議上通過反對改制的決議，並向政府提出備忘錄，發表反對改制計畫的聲明（劉伯奎 1985：170），且於 1962 年 4 月成為華文「獨立」中學。此外，位於詩巫的建興中學與開智中學¹⁸則因地處鄉間，加上學生人數不符改制條件而沒有改制，保留了華文學校的面貌，成為獨立中學（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991b：84）。然而，也有一部分的華文中學為能繼續獲得政府的補助而宣布改制，例如：詩巫的基督教衛理中學就率先宣布自 1961 年 1 月起實施改制，計畫在三年內逐年以英語取代華語授課；衛理中學的改制則引發學生罷課，不少學生被開除或轉學他校，導致「全校學生不及原來的三分之一」；另一間天主教創辦的詩巫聖心中學亦宣布接受政府津貼而改制；位於詩巫的中華中學、敦化中學、中興中學、光華中學、中正中學，位於民丹莪的開中中學、東華中學，位於泗里奎的華僑中學及美里的中華中學等 9 間華文中學也在各校董事會主導下改制（黃招發 2004：7，164-180，188-189）。

1963 年 9 月 16 日馬來西亞聯合邦成立後，砂拉越脫離英國的殖民統治，成為馬來西亞聯合邦的一州，原馬來亞聯合邦的教育法令乃逐步適用於砂拉越地區。¹⁹由於馬來西亞的成立，觸發其與印尼、汶萊、菲律賓等

¹⁸ 詩巫開智中學於 2001 年遷至民都魯省，現稱為民都魯開智中學，請參見黃招發（2004：114-115）。

¹⁹ 馬來亞聯合邦首相東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為了避免使新加坡成為共產黨和左派勢力的基地，認為有必要把馬來亞聯合邦與新加坡合併為一個新的國家，見李光耀（1998：504-514，528-536）。同時，為了抵銷合併後新國家的華族人口比例超越馬來人，也提議此一新國家的成立應該含括馬來亞、新加坡、砂拉越、北婆羅洲（沙巴）和汶萊。1960 年時，砂拉越共有 744,529 人，其中華族人口為 229,154 人，約占全州人口 30%；1991 年時，砂拉越總人口之 1,718,380 人中，伊班族人口為 506,528 人，約占全州人口 29.5%，華族人口為 475,752 人，約占全州人口 27.7%，馬來族人口為 360,415 人，約占全州人口 20.9%；見饒尚東（1999：237）。由於種種因素，沙巴及砂拉越在與新加坡及馬來亞聯合邦共組馬來西亞聯合邦時，憲法保障其對移民管制、教育文化等有相當程度之自治權利，請參見《馬來西亞聯合邦憲法》第 12A 篇「有關沙巴州及砂拉越州之額外保護」之第 161 條、第 161A 條、第 161B 條、第 161E 條等相關條文。

鄰國間的對立，使得砂拉越的政治局勢並不穩定，而執政當局反共的政策，也讓華文教育受到相當程度的波及（劉子政 1992：136-178，188-214）；晉連路十七哩民眾中學即因學校的領導層被指涉入政治事件入獄，以及馬印邊界衝突造成之人口流失等問題，於 1966 年停辦（黃招發 2004：67-68）。但由於砂拉越仍舊實施小學會考制度的緣故，砂拉越華社乃於 1967 至 1968 年間陸續設立石角私立中學、泗里奎私立中學、美里廉律中學、詩巫黃乃裳中學及西連民眾公立中學等 5 所學校，致使砂拉越的華文「獨立」中學數量增至 14 所。²⁰

小學會考制度的延續，使得砂拉越這 14 間華文中學的學生來源相當穩定，1964 年時，全砂拉越華文中學的學生僅 3,116 人，1967 年時增為 3,820 人，至 1970 年時更達 4,061 人（教總三十三年編輯室 1987：893）。隨著 1970 年代初期砂拉越局勢動盪，²¹砂拉越政府宣布自 1972 年起逐步廢除小學會考，²²1973 年起吸收 50% 的小學畢業生進入中學（中華日報 1972）。1975 年開始實施延長義務教育後，那些原來以收容會考落第生為主的華文中學因學生來源自然減少，而面臨招生不足的危機；²³加上自 1976 年起，砂拉越與西馬地區一致採用相同的教育法令，實施相同的教育措施，每位小學畢業生都可經由教育局分配到國民中學或國民型中學就讀，讓不少家長因此誤以為若不接受教育局的安排是犯法的，所以就直接讓子女到國民中學或國民型中學升學，而未考慮讓其子女進入華文中學，²⁴造

²⁰ 由於古晉中華第二中學的校地被古晉潮州公會收回，學校註冊乃於 1962 年 12 月被教育部吊銷，學校因而關閉（沈玉池 1984：61-71；劉伯奎 1985：177-199）。

²¹ 例如：詩巫光民中學自「1969 年至 1973 年間，尤其 1970 年前後，整個校園因政治動盪而籠罩在白色恐怖中」（黃招發 2004：97）。

²² 1964 年馬來西亞聯邦政府宣布廢除小學升中學的考試，次年實行九年免費教育，小學畢業生可自動升入政府中學，見董總出版小組（1985：17）；但砂拉越地區此時仍只有 30% 的小學畢業生經過考試後才可升入政府所設立或所津貼的中學，而這些中學仍以英語為教學媒介語，見 Federation of Malaysia（1968：333，339-340）。砂拉越州政府於 1971 年才宣布在 1972 年廢除小學會考，並自 1972 年起，以 30%、50%、75% 的比例錄取小學畢業生進入中學就讀，至 1975 年達成 100% 的升學率（中華日報 1974；沈玉池 1984：287）。

²³ 由於政府本著普及教育的政策，「採取一百巴仙升入津貼政府中學就讀，遂影響華文學生來源」（美里廉律中學 1988：2；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991b：52）。

²⁴ 1975 年時，古晉中華第三中學校董會財政田紹熙（1984）就指出，砂拉越實施九年免費教育政策，影響了華文中學的學生來源，加上一些華文小學將其畢業生分配到「指定的政府中學去，使到學生本身及其家長們沒有選擇的餘地」。田因此提醒華族學生家長，「就是你們的子

成砂拉越華文中學的學生人數大幅下降。1976年時，全砂拉越華文中學的學生總數從1970年的4,061人降為3,013人，而1977年時僅剩2,715人而已（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991b：209）。古晉華中第一中學的校史中便指出，1972至1978年是華文獨立中學黯淡的日子，一中的學生在七年之內由1,024人減少至663人，所開設的班數也從24班降至18班（古晉中華第一中學 1998：67）。1961年開辦的詩巫公教中學，在1974年時有760位學生，至1979年時只剩下398名學生（1995年校刊暨卅五周年特刊編委會 1995：17-18；黃招發 2004：135；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991b：106）。1960年為會考落第生及超齡生而設立的古晉中華第四中學，學生人數從創校時的58人增至1969年的628人，但在1975年小學畢業生全數直升中學的政策實施後，1977年時僅剩250名學生（古晉中華第四中學 2000）；美里培民中學和泗里奎民立中學在1977年時，則分別只剩27名和33名學生而瀕臨停辦。²⁵

為了挽救日漸衰微的華文中學，各校紛紛尋求對策，有的學校發起下鄉招生運動，在各個鄉區召開座談會，有的學校派員拜訪小學六年級學生家長，向家長解釋教育規定與母語教育的重要性，²⁶也有的學校以初中一年級免繳學費來吸引學生入學（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991b：72）。在各校董事會、教師們以及華教人士的多方努力，以及配合自1970年代中期的馬來西亞華文獨中復興運動下，²⁷砂拉越地區華文中學的學生人數不再下降，1978年時，這14間華文中學學生人數稍有增加，²⁸到1981年時回升至3,270人（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991b：209）。1980年，砂拉越州政府正式宣布馬來文（巫文）為唯一的官方語言；至1982年時，更將州內所有國民型中學的教學媒介語由英文改為馬來文

女已受分配到經指定的學校的話，你們還是有權利依照本身意願，將子女送進任何獨立的華文中學受教育」。

²⁵ 石角民立中學在1973年第一學期結束時，因全校僅剩三位學生，被迫宣告停辦；後在多方努力之下，終於在1976年復校（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991b：42，134，158）。

²⁶ 因許多華族學生家長們誤以為若不讓孩子到國民中學或國民型中學升學是犯法的，因此需挨家挨戶地拜訪與講解（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991b：15，52，92，146，158）。

²⁷ 有關1970年代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復興運動，請參見沈亭（1985：16-25）。

²⁸ 1978年時，學生總數升至2,909名（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991b：72，146）。

表一 砂拉越華文中學學生人數 (1976-1990)

| | | | | | |
|------|-------|------|-------|------|-------|
| 年代 | 學生人數 | 年代 | 學生人數 | 年代 | 學生人數 |
| 1976 | 3,013 | 1981 | 3,270 | 1986 | 5,036 |
| 1977 | 2,715 | 1982 | 3,789 | 1987 | 5,323 |
| 1978 | 2,909 | 1983 | 4,061 | 1988 | 5,511 |
| 1979 | 2,929 | 1984 | 4,544 | 1989 | 5,807 |
| 1980 | 3,070 | 1985 | 4,845 | 1990 | 5,776 |

資料來源：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991b：209)。

(畢業特刊編輯委員會 1998b：12)。²⁹這項以馬來文取代英文作為國民型中學之教學媒介語的政策，對砂拉越地區許多重視英語的華族學生家長，產生相當大的衝擊，華族學生家長可能因此而將子弟改送華文中學就讀，造成華文中學人數逐年回流 (見表一)。例如：古晉中華第一中學的學生在 1985 年時為 1,165 人，1987 年為 1,580 人，1989 年時升至 1,756 人，1991 年達 1,864 人，1993 年更增至 1,868 名。³⁰1991 年時，砂拉越地區華文中學學生總數已增加到 5,651 名。³¹到 2007 年時，學生總數亦有 5,149 名 (沈天奇 2008：91)。但砂拉越之各華文中學，在學生人數上差異很大，1991 年時，除古晉中華第一中學及詩巫公教中學兩間中學分別有 1,864 名及 1,410 名學生外，³²其餘華文中學大多是小型學校，甚至是「微型」(迷你型)學校。³³

三、國族建構下的砂拉越華文中學之經營

²⁹ 馬來語雖在 1967 年成為馬來西亞聯邦之國語，且為唯一的官方語文，但 1967 年之《國語法案》於 2 月 24 日經最高元首核准為法令時，明白宣示其效力不適用於婆羅洲 (砂拉越及沙巴) (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教育研究中心 1985：68, 71-72)，直到 1980 年以後，馬來語文才在砂拉越地區正式成為唯一的官方語文，1982 年時砂拉越的國民型英文中學才完成以馬來文取代英文為教學媒介的措施 (莫順生 2000：130)。

³⁰ 以上數據得自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991b：207)；董總出版小組 (1985：99)；古晉中華第一中學 (1998：67)。

³¹ 1991 年砂拉越 14 間華文獨立中學學生數目，請參見教育研究中心 (1992：41)。

³² 以上數據是 1991 年的統計數字，請參見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991b：207)。

³³ 1991 年時，美里培民中學、古晉中華第三中學、美里廉律中學、詩巫黃乃裳中學、古晉中華第四中學、詩巫光民中學及石角民立中學，分別有 583 名、361 名、309 名、297 名、272 名、155 名及 112 名學生，另五間學校則各有數十名學生而已 (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991b：14, 26, 36, 48, 57, 69, 78, 91, 106, 115, 126, 140, 152, 163)。詩巫開智中學即因地處鄉間，交通不便而學生少，2001 年 1 月遷至民都魯省，成為民都魯省唯一的華文獨立中學，校名改為民都魯開智中學 (黃招發 2004：113-116)。

戰後，砂拉越英殖民地政府為建立一國家教育系統，以津貼為手段，誘使華校改制為英校。當砂拉越加入馬來西亞後，原馬來亞聯合邦教育政策的效力逐漸擴及砂拉越的華文中學，在以馬來文化為核心價值的國族建構過程中，華文教育仍被排除在國家教育體系之外。由於政府可以不補助這些不願接受改制的華文學校，學校經營者必須自籌經費，1975年古晉中華第三中學校董會主席楊國斯就坦言，古晉中華第三中學成立18年來，「經費短缺，師資困難，學生不足」，在全校董教及華社支持下，才能克服種種困難（古晉中華第三中學 1975），反映了華校經營上的艱苦。

為了結合當地華族社會的力量，古晉中華中學校董會曾於1968年時，計畫推動全砂拉越華校董事聯合會的成立，但因1969年發生之「513種族衝突事件」而停頓。³⁴1977年9月，古晉中華總商會成立「發展華小支持獨中工作委員會」，以便協助該地區華文中小學的發展（國際時報 1977）。砂拉越州詩巫省³⁵於1979年籌組該省的董事聯合會，推行統籌統辦原則，為砂拉越華文中學籌措永久辦學基金。³⁶1981年詩巫省的建興中學、開智中學、黃乃裳中學、光民中學、公教中學和公民中學等6間華文中學董事會，簽訂「砂拉越詩巫省華文獨立中學統籌統辦協議書」，³⁷規定由詩巫省董事聯合會依據這6所華文中學各校學生人數的多寡，按比率分配所籌得的款項；至於各校經費不敷者，則由各校董事會自籌補足（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991b:68,80,93,107,116,130,190-193,200-205）。詩巫省董事聯合會除分配所籌得的款項外，亦訂立華文獨立中學統一辦學的規定，對6所華文中學的教職員實施統一的薪資津貼、聘任等制度，並對6校的學雜費、授課時數、招生等事項做統一的規劃。³⁸在這種互助的

³⁴ 1976年時任古晉中華中學董事會秘書長的沈玉池在答覆記者時，曾提及1968年時曾計劃成立全砂拉越華校董事聯合會，後因「513種族衝突事件」而未能成立，見砂拉越晚報（1976）。

³⁵ 1985年以前詩巫省稱為第三省。

³⁶ 有關詩巫省6間華文獨立中學董事會的合作與董事聯合會的成立、教育基金的籌募，以及統籌統辦協議書的簽署，請參見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1991b:190-193）。

³⁷ 依協議書B項之規定，該董事聯合會每年按實際需要與經費能力，決定給予各校經費津貼，同時也由董事聯合會擬定統一籌款計畫。《砂拉越詩巫省華文獨立中學統籌統辦協議書》全文請參見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1991b:194-197）。

³⁸ 《詩巫省華文獨立中學統一辦學規定》，全文請參見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1991b:

原則下，使詩巫省一些位處偏遠或學生人數較少的學校可獲得較安穩的發展，於是，詩巫省董事聯合會在 1987 年 1 月推動全砂拉越華文中學董事會代表會議的召開（黃招發 2004：221），於翌年正式成立「砂拉越華文獨立中學董事會聯合總會」，負責「聯絡與團結全砂拉越州華文獨立中學董事會，以促進各華文獨立中學之發展」，並代表全砂拉越州華文中學「與政府及其他合法機構商討一切有關獨中事宜」。同時，該董事會聯合總會將「追隨馬來西亞董事聯合會總會的領導」，並配合馬來西亞董事聯合會總會之政策，振興和發展華文中學（砂拉越州華文獨立中學董事會聯合總會 1987）。³⁹

1990 年時，砂拉越地區的 14 間華文中學，除美里培民中學和美里廉律中學外，經費都不足。⁴⁰各華文中學除靠學生所繳之學雜費及董事會之支持外，還以義賣、義走、義演、募捐等活動籌措經費，⁴¹例如：1994 年泗里奎民立中學配合啓德行 25 週年慶，舉行慈善洗車活動，共籌得馬幣 4 萬元（特刊編輯委員會 1994：70）。也有學校靠房地產租金作為學校經費（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991b：16，27，49，59，68，80，93，107，116，130，142，154，164）；有的學校向華社勸認月捐（董總出版小組 1985：154）；有的學校設立榮譽贊助人制度募款，例如：美里廉律中學董事會為籌募經費，自 1979 年起，對該校永久贊助人本人或其父母親喜喪事，都登報慶賀或致輓詞，並派董事出席致意，對喜喪事捐款登報鳴謝（1988：2）；僅 1997 年，美里廉律中學共收到喪家的喪事捐獻馬幣 67,650 元（畢業特刊編輯委員會 1998a：76-77）。事實上，美里廉律中學自 1980 年起就擴大爭取贊助人（黃招發 2004：159-160），到 1998

198-206)。

³⁹ 砂拉越華文獨中董事會聯合總會會長劉利民披露，為「讓砂州華教團體，能更有權威性來爭取本身的權益」，砂拉越華文獨中董事會聯合總會已於 2009 年退出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了，但雙方「依然保持密切聯繫」（中國報 2010b）。

⁴⁰ 例如：古晉中華第一中學不足馬幣 29 萬元，詩巫光民中學不足馬幣 2 萬元，其餘各校不敷之數目大體上都在馬幣 2 萬元至 6 萬元之間，請參見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1991b：16，27，49，59，68，80，93，107，116，130，164）。

⁴¹ 美里廉律中學就以新春舞獅籌款為重要經濟來源，請參見美里廉律中學（1988：2）；畢業特刊編委會（1998a：65）。

年時已有多達 500 名的永久榮譽贊助人（畢業特刊編輯委員會 1998a：16-18）。砂拉越各華文中學在經費上也常爭取當地各華團的資助，例如：砂拉越南大校友會古晉分會於 2003 年 11 月為古晉地區華文學校募到價值馬幣 2 萬 3,289 元的書籍，古晉第一、第三、第四、石角民立以及西連民眾公立等 5 所華文中學分到價值馬幣 1 萬 3,332 元的書籍（砂拉越華人社團聯合總會 2003）。2008 年 6 月，砂拉越中華工商聯合會通過決議，撥款馬幣 15 萬元資助砂拉越州的 14 間華文中學（砂拉越中華工商聯合會 2009）。

砂拉越華族為其華文中學的生存與發展，也常尋求政府的資助。1990 年代，不少支持華教的人士，一再地呼籲砂拉越州政府撥款資助華文中、小學。古晉中華第三中學、泗里奎民立中學等，即曾透過砂拉越州華族內閣部長向州政府申請撥款支援，⁴²例如：泗里奎民立中學在經費困難下，曾因聯合邦政府部長及州政府官員的協助而獲得州政府的撥款；⁴³1990 年代初期，古晉中華第一中學也宣稱「近兩年來通過部長向州政府申請撥款都獲得批准」（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991b：27）。1996 年 7 月，古晉中華第一中學邀請砂拉越社會發展部部長阿迪南沙登（Adenan Satem）主持運動場看台落成，獲得砂拉越州政府撥款馬幣 5 萬元的建設費用（畢業特刊編委會 1999：22）。沙巴崇正中學校長曾桂安在 1999 年訪問砂拉越古晉時，就公開建議「砂州獨中應向沙巴獨中看齊，爭取州政府常年撥款」。砂拉越華基反對黨的民主行動黨聯委會主席黃和聯更公開要求州政府每年撥款資助華文中學及華文小學，砂拉越獨中董聯會也呼籲州政府撥款資助 14 間華文中學（畢業特刊編委會 1999：207，218）。華族社會的呼籲似逐漸獲得砂拉越州政府的注意，2003 年 8 月，由西連民眾公立中學協辦、砂拉越河婆同鄉會主辦之搗茶會，邀請了州政府房屋部部長

⁴² 馬來亞聯合邦政府在推動《1961 年教育法令》時，對於不願改制的華文中學不再給予經費上的津貼，但將中學的經費來源分為三類：學生所繳之學雜費；聯合邦政府的撥款；地方社會人士、團體的捐款以及地方政府的撥款（Federation of Malaya 1962: 352），因而馬來西亞聯合邦的各華文獨立中學可透過種種關係請求地方政府的補助。

⁴³ 泗里奎民立中學之所以能獲得撥款，可能因有內閣部長和州政府官員擔任該校顧問有關，請參見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1991b：164）。

拿督麥哥瑪因 (Micheal Manyin anak Jawong) 主持開幕典禮，拿督麥哥瑪因在典禮上將 2002 年孔誕時答應撥款的馬幣 1 萬 5,000 元支票交給西連民眾公立中學，他也承諾以後會給予西連民眾公立中學更多的協助，在同一場合，砂拉越州議員菲特立巴瑤 (Frederick Bayoi Manggie) 也宣布撥款馬幣 5,000 元，以便播茶會為該校籌募的基金能突破原定馬幣 10 萬元的目標(砂拉越河婆同鄉會 2003)。2007 年起，砂拉越州政府每年撥款馬幣 50 萬元給該州的 14 間華文中學。⁴⁴2010 年 5 月詩巫舉行國會議員補選，首相納吉 (Najib bin Tun Haji Abdul Razak) 至砂拉越為國陣候選人助選時，更親自撥款馬幣 500 萬元給詩巫獨中董聯會 (星洲日報 2010d)。

為了吸引學生就讀，砂拉越地區各華文中學，基本上大多採取「雙軌制」的課程規劃，以便讓畢業生能同時參加獨中統一考試(統考)及政府考試；但在實際操作上，則有不同的措施。例如：古晉中華第一、第三、第四中學，以及詩巫黃乃裳中學、詩巫光民中學、詩巫公教中學、詩巫公民中學等 7 間華文中學在教學上，正課以準備獨中統考，再以補習的方式加強課業輔導以準備政府考試，古晉中華第一中學就明言，「兼授華、國、英三種語文，並維持數理化之優越程度，採用雙軌制，上午為正課，以參加馬來西亞華文獨中高初中統一考試為目標，下午為輔導課，以參加 PMR 和 SPM 全科文憑考試為目標」(畢業特刊編委會 1999: 23)。詩巫建興中學是以華文獨立中學與國民中學課程並重的辦學方式，推動雙軌制，把初中部分為傳統班和 SRP⁴⁵班兩種，傳統班除教導獨中統考課程，以協助初中畢業生參加獨中統考，也以馬來文為教學媒介，講授科學、數學、地理科等課程，為學生升讀 SRP 班做準備；SRP 班是專為該校初中畢業生而設的一年課程，純以馬來文為教學媒介講授國民中學的課程，幫助學生預備 SRP 考試，學生取得該文憑後，可繼續升入其他獨中高中部或政府中學就讀(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991b: 65)。美里廉律中學「為了配合

⁴⁴ 2006 年砂拉越華文獨中董事會聯合總會會長林鵬輝呼籲馬來西亞聯邦政府及砂拉越州政府對砂拉越 14 間華文獨中給予更大的經濟資助，林鵬輝表示，砂州自 2007 年起每年撥款馬幣 50 萬給 14 間獨中，為「砂拉越人聯黨支持華教與獨中更進一步的實際行動」(華聲報 2006)。

⁴⁵ SRP 即初級教育文憑 (Sijil Rendah Pelajaran) 的簡稱，係教育部舉辦的政府會考；不過，自 1993 年起，此項考試被初中評估考試 (PMR) 所取代。

家長的意願，社會現況的需求，」自 1984 年起將學生分成兩類，初中部甲類學生除以華文上統考課程外，同時加強英文課程以預備 LCE⁴⁶全科文憑考試，並參加統考及 SRP 考試，乙類學生則只以華文授課；1988 年起，則實施上午班讀獨中課程，下午班讀 SRP 課程的方式（美里廉律中學 1988：3-4）；高中部在高二結束後分流，一部分學生繼續念高中三年級，另一部分學生則屬 SPM 班，增上八節以馬來文講授的課程（美里廉律中學教務處 1998）。西連民眾公立中學及詩巫開智中學兩間學生人數較少的學校，其課程上的內容以安排學生參加獨中統考為主，對於一些素質較好的學生則鼓勵其同時參加政府考試（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991b：54，75）。此外，爲了畢業生的就業問題，砂拉越地區的華文中學高中部課程多以商業科目爲主。⁴⁷

砂拉越地區的各華文中學，在原則上大多強調以華、巫、英三語教學，但華語文仍是主要的教學媒介語，古晉中華第一中學的初中部除英、巫等語文科外，一律以華語教學並採用華文的課本；高中部的數理科目和商業科目則是採用英文課本，以華語爲教學媒介語（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991b：12）。1988 年時，美里廉律中學在上午以華文媒介語教導獨中統一課本，方便學生準備獨中統一考試，而下午則以馬來文教學，同時加強英語教學，以輔導學生參加政府會考或出國深造（美里廉律中學 1988：4）。1998 年，美里廉律中學董事長劉久健在考察沙巴亞庇崇正中學的教學模式後，提出「課程改革」意見書，計劃自 1999 年推動「落實」華、巫、英三語並重的教學，依此計畫，初中部以華語授課的課程（包括音樂、美術等）共 11 節，以馬來文授課的課程共 16 節，以英語授課的課程（包括科學與數學）共 22 節；高中部的課程的華、巫、英語之授課節數分別爲 10 節、14 節及 25 節（詩華日報 1998）。劉久健在其改革遭到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強烈指責後，發表「民族情意結使獨中生受

⁴⁶ LCE 即「初級教育文憑」（Lower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的簡稱，是一種以英文爲主要應試媒介語的考試，後爲 SRP 所取代。

⁴⁷ 例如：古晉中華第三中學、古晉中華第四中學和詩巫公民中學的高中部即只開設文商班或商職班（畢業特刊編輯委員會 1998b：13；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991b：23，113）。

罪，勿把下一代當砲灰」的談話，繼續堅持其「英語為主」的課程改革（美里日報 2000）。但在學生人數少的「微型」學校，則強調華語的重要。⁴⁸不過到 2006 年時，連只有 43 位學生的西連民眾公立中學也做了課程改革，並增設高中部，除語文科用各自語文教學外，初中部所有科目採用華文課本、華語教學，兼採雙軌制，上午為正課，以參加馬來西亞華文獨中統考為目標，下午為補習課，以參加 PMR 文憑考試為目標，每週上課 5 天，共 45 節，星期六進行課外活動或勞作（西連民眾公立中學 2009）。

砂拉越各華文中學在行政組織上，除設有校長負責全校的行政工作外，也設有教務主任負責與教學相關各項事務。由於砂拉越的華文中學大多標榜肩負維護民族文化的使命，師生常自誇中華文化源遠流長，以身為華族子弟為榮。⁴⁹此外，學校除重視知識的傳授外，對學生的操行也非常注意。砂拉越 14 家華文中學，不論其規模大小，皆與其原鄉的中學相似，設有訓導人員，對學生操行實施記功、嘉獎、記過、警告等獎懲措施。⁵⁰依詩巫 6 間華文中學所簽訂的統籌統辦協議書而制定的「砂拉越詩巫省華文獨中統一辦學規定」，僅有初中部之學校可由一位教師兼任教務主任，設有高、初中部的學校，需有三名教師兼任教務主任、訓導主任及體育主任，學生超過 1,000 人的學校，則可能聘專責的教務主任一名及輔導主任一名，分別擔任教育、輔導、訓導、體育及其他由校長委派之工作（砂拉越詩巫省華文獨立中學董事聯合會 1987）。1991 年時，除西連民眾公立中學

⁴⁸ 1991 年只有學生 46 人，教師三人的西連民眾公立中學，從初一到初三的學生，除在巫、英文兩門課外，皆以華語文上課，學生亦以參加獨中統考為主（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991b：54）。自 1992 至 2004 年間，該校「每年學生人數都在起落不定，全校學生多到五、六十名，少到卅多名」（黃招發 2004：72）；2005 年時，全校也僅 45 名學生（新紀元 2005）。

⁴⁹ 砂拉越華文獨中董事會聯合總會會長林鵬輝（2004）就認為，華族先民能在婆羅州荒野開墾，造成今日之繁榮，「歸根到底，因為前輩（華人）接受中華文化薰陶，在固有民族道德維繫下，刻苦耐勞，勤儉持家」。詩巫光民中學在其辦學理念中就宣告：「如果華裔子弟沒有接受華文教育，不論思想、道德行為等方面，必定很容易走樣」（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991b：88-89）。

⁵⁰ 例如：泗里奎民立中學在其「民立中學學生懲戒辦法」中明定：「不假私出校門，蓄留長髮拒絕剪短者，在校抽煙、賭博者，偷拆他人信件者都會記小過一次；考試作弊者，在校外行為不檢有損校譽者，妨礙學者執行公務者記大過一次；未經許可擅自利用學校場所集會者，攻擊師長者將勒令退學。」「民立中學學生獎勵辦法」也對自動為公共服務，拾金不昧，代表學校參加對外比賽成績優異，擔任學長盡職等給予記優點、小功及大功等獎勵（特刊編輯委員會 1994：22-25）。

因教師及學生人數都甚少而無訓導人員外，其餘的 13 間華文中學中有古晉中學中華第三中學、石角私立中學、詩巫建興中學及詩巫開智中學設有訓育主任，而另外 9 間華文中學則設有訓導主任（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991b：9，21，32，45，51，63，73，86，100，111，122，135，144，160）。詩巫公教中學宣稱，「設立訓導處的目的是秉承及發揚中華文化優秀的品德」（1995 年校刊暨卅五周年特刊編委會 1995：68）。古晉中華第一中學校長許興梅亦表示，為「達致成人成才的教育目標」，華文中學的辦學方針，除須兼顧三語學習外，也應強調品德教育，他認為這種辦學理念，「完全符合國家利益，並具備時代的精神」（國際時報 1999a）。

為協助訓導人員維護學校的風紀，詩巫公教、泗里奎私立、美里廉律等中學都成立「學長團」，學長團的成員由教師從品學兼優的學生中選出，協助學校「維護良好的校風」（泗里奎私立中學 97 年高初中畢業紀念特刊委員會 1997：68）。詩巫公教中學的學長團的成立宗旨為：（一）維持學校秩序；（二）培養良好校風。訓導處在學長團的配合下，定期對學生的儀表作例行檢查，也在上課時間「進行儀表及違禁品的突擊檢查」（1995 年校刊暨卅五周年特刊編委會 1995：68，71）。⁵¹泗里奎私立中學的學長團也協助訓導處維持秩序，維護校園整潔（泗里奎私立中學 97 年高初中畢業紀念特刊委員會 1997：54）。⁵²美里廉律中學的學長團也負有糾正違規同學及清潔校園環境等任務（畢業特刊編委會 1998a：56）。

詩巫地區 6 間華文中學所簽訂的協議書中，要求學生人數超過 1,000 人始須設輔導人員，自 1980 年代以來，歷年學生人數已超過 1,000 人的詩巫公教中學就設有輔導主任，但當時，只有 150 多位學生的詩巫光民中學

⁵¹ 事實上，詩巫公教中學列舉的違禁品項目繁多，在違禁品的界定原則為：「1.非學校課程需用之物；2.會打擾及影響學生上課學習之任何物品」。違禁品之明細表中列有明星照片、明星圖樣之包書紙、項鍊、手鐲、胸針、耳環、領帶夾等（1995 年校刊暨卅五周年特刊編委會 1995：69）。

⁵² 古晉中華第四中學的學長團也是以協助校方推行各項活動及維持學校的紀律為宗旨，請參見畢業特刊編委會（1998b：94）。

也設有輔導主任（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991b：86，100）。學生人數多的古晉中華一中也設置輔導主任，古晉中華四中、美里廉律及泗里奎民立等 3 間華文中學亦於 1994 年增設輔導主任（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991b：9；畢業特刊編委會 1998a：23；特刊編輯委員會 1994：67；畢業特刊編委會 1998b：31）。泗里奎民立中學輔導處的輔導人員以激發學生的思考能力，使學生瞭解自己，協助發揮潛能，增進學習的效果，並培養正確的職業觀為其主要職責（泗里奎民立中學 97 年高初中畢業紀念特刊委員會 1997：55）。2006 年時，全校僅有 43 名學校的西連民眾公立中學除校長、教務主任外，也設有訓導主任及輔導主任各一人（西連民眾公立中學 2009）。

四、討論

今日砂拉越的華人僅占全馬華族人口的 10%，但全馬 60 間華文獨立中學中，卻有 14 間位於砂拉越境內。這樣的現象，部分是由於 1961 年「改制計畫」的實施，導致一些華文中學不再接受政府的津貼而成為所謂的獨立中學，另有一批新成立的華文中學，則是為了解決失學青少年的教育問題，為收容落第生和超齡生而先後創辦的。同時，也是因為砂拉越幅員廣大，全州面積達 4 萬 8 千多平方英里，除古晉、詩巫等少數大城市外，華族散居許多小市鎮，地處郊區或鄉間的華族子弟若要升學，只好離開家鄉到古晉、詩巫等大城市去，為了解決子弟的教育問題，一些華文中學遂在偏遠地區被設立。例如：古晉省的石角區地處偏僻，地形崎嶇，早年客家人移居此地種橡膠與胡椒為生，對外交通須乘坐小船渡石角河，不但往來不便，而且翻船意外頻傳，為了便利子弟就學，乃有石角民立中學的創辦（柳新 1986；黃招發 2004：58-59）。

砂拉越幅員廣大，造成境內的華文中學一部分集中在大城市裡，一部分則散落在偏僻鄉間的現象。在華族人數最多的古晉及詩巫兩省，共有 9 所華文中學，其中，華族人口最為密集的古晉及詩巫市區，就有中華第一、第三、第四、公教及黃乃裳等 5 間，另 4 間則分散於兩省的鄉間小鎮；美

里省則有培民及廉律兩中學；而相對偏僻的泗里奎、三瑪拉漢及民都魯三省，則各有一間華文中學。⁵³由於所在之處華族人口的多寡與交通便利與否，對學生來源產生相當程度上的影響，故除位於古晉市區的中華第一中學、詩巫公教中學及美里培民中學外，其餘各校學生人數都在 500 人以下，地處偏僻的西連民眾公立中學經常都只有數十位學生，更是全馬來西亞規模最小的華文中學（新紀元 2005）。

依照馬來西亞聯邦的教育法令，不願接受政府津貼而以華語文為教學媒介語的中學一律歸類為獨立中學。由於砂拉越現存的華文中學都不是由改制中學另設的獨中部，因此並無在校名上冠上「獨立」兩字的情形。依據今日砂拉越地區華文中學成立的背景，這些學校大體上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拒絕改制的學校，這類學校大多位於大城市裡，規模相對較大；第二類則為收容落第生或超齡生的學校，大多位處偏僻的鄉間，規模相對較小。隨著砂拉越成為馬來西亞的一州，獨尊馬來語文的國族建構理念也逐漸延伸至砂拉越。為因應現實環境的需要，第一類華文中學的作法通常是在華、巫、英三語並重的口號下，對執行雙軌制較為熱心，對母語的華語文固然重視，亦不願放棄政府的公共考試；第二類華文中學因為一些因應當地華社子弟無法進入政府中學而新創辦的華文中學，多半地處偏遠且規模小，學生程度亦不夠高，教學上還是偏重華語文，例如：1967 年創立的石角民立中學，其辦學方針雖宣稱兼重英、巫文的教學，鼓勵學生參加獨中的統考，以及初級教育文憑考試（SRP），但卻坦言其初中畢業生中，有 70% 返家務農或到城市當學徒，因此該校除開設農務科及相關技術課程外，基本上以華語為教學媒介，同時強調學生應為「在華文教育培養下的好子弟」。1968 年創建的「微型」學校——西連民眾公立中學，以「語文是民族的靈魂，尊重民族語文是人道，發揚民族語文、文化是基本人權」為其辦學理念，強調其著重華語文的教育方針（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991b：48，50，55）。

⁵³ 14 間華文中學的校址，請參見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1991b：3，19，29，41，51，61，83，97，109，119，133，145，157），以及黃招發（2004：38，49，54，58，70，76，84，89，108，126，134，139，145，156）。

隨著時間的變遷，尤其在那些改制的國民型中學以巫文取代英文為教學媒介語後，有些華文中學開始強調英語的重要性。⁵⁴由於砂拉越的華文中學，名義上都標榜「華、巫、英三語並重」的政策，為了裝備學生使其能因應不同需求，學生學習的負擔頗重，一般每週上課六天，每天上課六至七節，甚至到八節。⁵⁵這種現象的出現，似乎是砂拉越一些華文中學在馬來西亞聯邦推行馬來語文單元化教育政策及國際上重視英語教育情形下，為了維護母語教育而做出的一項策略。此外，為了學生畢業後的就業考量，砂拉越華文中學的高中部大多以教授「文商科」為重點，甚至有部分學校的高中部只設文商班而已。⁵⁶早年，一些華文中學在當地華族人口稀少、交通又極不方便的情形下，學生的來源短絀，限制了學校進一步的發展，因此有的學校只設立初中部，沒有高中部，但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可能隨著社會的發展與需求，連微型的華文中學也開始設立高中部。⁵⁷

砂拉越地區的 14 間華文中學，尤其是在 1970 年代末期，或因經費拮据，或由於學生來源不夠穩定，除少數學校外，各校實際負責校務推動與發展的校長，人事更動頻繁。例如：詩巫公民中學自 1960 年創校至 2004 年之間，共換了 17 位校長，詩巫建興中學、詩巫光民中學、詩巫黃乃裳中學、石角民立中學以及泗里奎民立中學自 1960 年代創校至 2004 年，也各有 14 位以上的校長。上述 6 間華文中學多半為地處鄉間或橡膠園坵偏

⁵⁴ 例如：1998 年美里廉律中學就由校長宣告：「本校董部經周全策劃，莘莘學子享有華、國、英三語平衡發展之機會，唯獨特別加強英語，拓廣求知求學之路線」（畢業特刊編委會 1998a：5）。1999 年美里廉律中學推行課本媒介語的改變，將初中的數學、科學改用英文本，地理改用巫文本，只保留華文語文及歷史為華文本，經調整後，華語媒介為 11 節（包括語文、歷史、美術、音樂等）；國語（巫語）媒介為 16 節，英語媒介為 22 節（黃招發 2004：27）。

⁵⁵ 例如：1999 年以後的美里廉律中學，每週上課 49 節；詩巫公教中學每週上課六天，共上課 40 節以上（1995 年校刊暨卅五周年特刊編委會 1995：64）。1991 年時，詩巫公民中學除初一學生每週上課 40 節外，初二、初三及高一學生都上課 44 節，高二及高三學生更上課高達 47 節（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991b：113）；古晉中華第一中學的學生，每週上正課六天，共 44 節，外加輔導課五節以及體育課（畢業特刊編委會 1999：23）。

⁵⁶ 砂拉越 14 間華文中學裡，設有高中部的 10 間華文中學，全都開設文商班，且其中有 4 間只設有文商班（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991b：208）。

⁵⁷ 1991 年時，砂拉越 14 間華文中學當中，僅有西連民眾公立中學、詩巫建興中學、詩巫開智中學及石角民立中學等 4 所學校僅設初中部而無高中部（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991b：207）。詩巫開智中學於 2001 年 1 月遷往民都魯，2004 年時已設有高中部（拿督斯里張慶信中文新聞室 2007）。西連民眾公立中學亦於 2006 年設立高中部（西連民眾公立中學 2009）。

僻之處的小型，甚至微型的中學。⁵⁸到 2004 年時，上述 6 間學校共有 89 位人士擔任過校長，其中有高達 51 位人士只做了一年或不到一年的校長。位於美里市區的廉律中學則在 1987 至 2001 年間更換了 9 名校長，董事會甚至還面臨到「家長要求更換校長」的壓力（星洲日報 2001）。只有古晉中華學校屬下的第一、第三、第四中學及屬於天主教會的詩巫公教中學，或因學生人數較多，或因經費較足，董事會成員的政商關係良好，或有教會的支持，校長職位人事較安定，在過去 40 多年裡，分別只更換了 8 位或以下的校長。⁵⁹砂拉越華文中學學生人數居首位的古晉中華第一中學，自 1963 至 2004 年只有過 5 位校長，除陳毓乾（1968-1977）擔任過 11 年校長外，許興梅更擔任校長長達 22 年（1978-2000）（黃招發 2004：41），其教師的聘約亦自 1984 年廢除一年一聘的模式，改為試用一年後可獲永久聘用的方式（董總出版小組 1985：98）。人事的穩定與否，自對學校的經營與發展有密切的關係。

近年來，砂拉越華文中學的學生總數有逐年增加的趨勢，一般認為這是華語文熱所促成的現象，一些學校也將華語文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與使用之現象，作為肯定華文中學價值的依據（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991b：17）。然而，華語文熱是否真正影響華族父母對子女就學的選擇，還是有待長時間的觀察。因為，相對於砂拉越華族人口成長的趨勢（見表二），就讀華小的學生人數卻是呈現下降的情形。由於華小畢業生的減少，華文中學學生人數的增加，相對就凸顯了獨中人數成長的現象（見表三）。但若以近 20 年的砂拉越華族人口數來對比，伴隨著砂拉越華族人口的增長，就讀華文中學的人數雖然相對增加，但其擴增的幅度有限，並無大量成長的現象。所謂華語文熱，似未掀起砂拉越華族父母讓子女選擇就讀華校的熱潮。雖然不少華族家長肯定母語教育的必需性，但也有許多

⁵⁸ 例如 1985 年時，詩巫建興中學及石角民立中學分別只有 45 位及 65 位學生（董總出版小組 1985：100，150）。

⁵⁹ 各校校長之人數及其任期的數據，得自黃招發（2004：41，51，56，61，71，80，87，102，117，128，135，141，151，160）。

表二 全馬暨砂拉越州華族人口數（1970-2002）

| 年代 | 1970 | 1980 | 1991 | 2000 | 2002 |
|---------|-----------|-----------|-----------|-----------|-----------|
| 全國華裔人口 | 3,564,400 | 4,424,588 | 4,944,954 | 5,691,908 | 5,920,200 |
| 砂拉越華族人口 | 293,900 | 385,161 | 475,752 | 537,230 | 556,900 |

資料來源：董總 50 年編委會（2004：1269）。

表三 砂拉越華文小、中學人數（2004-2009）

| 年代 | 2004 | 2005 | 2006 | 2007 | 2008 | 2009 |
|------|--------|--------|--------|--------|--------|--------|
| 華小人數 | 77,195 | 75,385 | 74,209 | 75,215 | 74,296 | 73,286 |
| 華中人數 | 4948 | 4551 | 5132 | 5149 | 5125 | 5367 |

資料來源：教總調查研究及資訊組（2009：159，235）；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編輯部（2004，2007，2008，2010）。

外，可能有些華族家長並未將子女送往華校，造成近五年砂拉越華小的人數不增反減的現象。一些位於華族人數眾多的大城鎮裡的華文中學，學生人數雖較多，其學校董事泰半經濟情況較一般華族好，甚至常有大富商擔任董事，但這些經濟狀況好的華族，卻常將子女送往國外或本地英文中學就讀。⁶⁰或許這就是砂拉越每年雖有約七萬多名的華小學生，有近萬人自華小畢業，卻只有一千人進入華文中學的原因。但華語文熱也絕非毫無影響，根據報導，近年來，全馬華文獨中巫、印族學生入學人數「肯定是有增無減」（星洲日報 2010b）。例如：就讀於古晉中華第一中學的嘉雅尼娜與其四名弟弟從小接受華文教育，因為他們的母親認為在今日的社會裡，華語文與英文同樣重要，「如果今日我也懂華語，那就絕對更占優勢」。此外，獨中重視學生紀律，也是嘉雅尼娜的母親選擇讓子女念華校的重要原因之一（星洲日報 2010c）。

在法理上，馬來西亞聯合邦政府對華文中學不需給予任何津貼，因此學校的經費必須自行設法籌措。砂拉越地區的 14 間華文中學需個別地或共同努力地尋求資助，除華社各團體外，砂拉越州政府就成為此地區華文

⁶⁰ 例如：砂拉越華文報章曾披露古晉中華中學董事會中，有 80% 的校董將子女送入英校就讀（中華日報 1970；砂拉越晚報 1975；詩華日報 1970）。2010 年 5 月詩巫國會議員補選，人聯黨候選人劉會耀也被披露其三名子女皆就讀於國際學校（中國報 2010c）。

中學的求助對象。砂拉越現有人口 250 萬之中，伊班人占 29.5%，華人占 28.5%，馬來人占 20.8%。⁶¹身為當地第二大族群，以華人為主要成員的砂拉越人民聯合黨（人聯黨）自 1970 年與砂拉越土著黨⁶²、砂拉越保守黨⁶³合組聯合政府後，⁶⁴其黨內領袖都能出任砂拉越州政府的第一副首席部長及其他州內閣閣員，而當地一些華文中學與砂拉越州政府，尤其人聯黨籍部長具有良好互動關係。砂拉越人民聯合黨雖有不少土著參加，但基本上仍是一個華基政黨，⁶⁵其重要領袖如曾任砂拉越州第一副首席部長的楊國斯，就曾擔任古晉中華中學董事長長達 20 年（1960-1979）。

雖然人聯黨政治人物如同其他土著部長／議員，對個別華文中學偶有支持或協助，且人聯黨自 1970 年與砂拉越土著黨共組聯合政府至今，已近 40 年，但該黨對砂拉越的華文教育一直到 2006 年都沒有明確的支持政策。其原因固然很多，對英語文的過度重視或為一個重要因素，人聯黨的競選對手砂華公會就曾在報章發表文告批判人聯黨對華文教育的態度，砂華公會指責「人民聯合黨想以華教為政治鬥爭的武器，其實人聯黨何曾重視華教？」。砂華公會甚至進一步質問，砂拉越人聯黨有多少黨員「以身作則，心口如一的把自己的子女送入華校？」（中華日報 1969a）。人聯黨黨籍曾任古晉中華中學董事 22 年的沈玉池，對該黨領袖不以實際行動送子女進華校就讀卻空喊維護華教的作法，也表示痛心與不滿；沈亦指責人聯黨一再反對獨大的創辦，反對民主行動黨在 1978 年為創立獨立大學而

⁶¹ 按照 2006 年非官方的數字，砂拉越州的人口為 250.4 萬，是全馬來西亞人口密度最低且多元種族共處的地區，包括有 27 個族群，主要的民族是伊班人（Iban，占 29.5%）、華人（占 28.5%）、馬來人（Malay，占 20.8%）、比達雅人（Bidayuh，占 8.4%）和馬蘭諾人（Melanau）等。華族人口占砂拉越總人口的比例與 1991 年時相似。

⁶² 砂拉越土著黨（Partai Bumiputera）是砂拉越州馬來人的代表性政黨，是由砂拉越第二及第三省沿海的馬來人所組的砂拉越土著陣線（Barisan Rakyat Jati Sarawak）與砂拉越第一省馬來人所組的砂拉越國家黨（Party Negara Sarawak）所合併成立的政黨（王國璋 1997：211，214）。

⁶³ 砂拉越保守黨（Party Pesaka Anak Sarawak），砂拉越第三省伊班人的政黨（王國璋 1997：213）。

⁶⁴ 有關砂拉越華人的政治活動，見田英成（1998）。

⁶⁵ 所謂的「華基政黨」，是指以華裔的支持者為主的政黨，這些政黨也歡迎非華人入黨，在西馬的華基政黨通常擁有一定數量的印度裔黨員（王國璋 1997：75）。有些華基政黨在政策上，常與自詡為「華人政黨」的馬華公會對立。馬來西亞主要的華基反對黨是民主行動黨，黨主席為林吉祥，其子林冠英為該黨秘書長。2008 年 3 月大選後，林冠英當選檳州議員兼首席部長。

要求修改馬來西亞聯邦設立大專法令的動議（沈玉池 1984：553）。古晉地區的華族也曾指責由人聯黨主控的古晉市議會承繼殖民地教育政策著重英文，而沒有積極支持華文教育（中華日報 1969b）。

2006年5月砂拉越州議會第九屆選舉中，執政的砂拉越國民陣線雖拿下72個議席中的62席，繼續執政（南洋商報 2006），砂拉越土著保守黨（土保黨）⁶⁶主席連任第六次首席部長（星洲日報 2006），但國陣中的華基政黨——砂拉越人聯黨，卻在所提名競選的19個選區中失去8個議席，「這8個議席中，其中7席是華人區」。而反對派的華基政黨——民主行動黨所競選的12席中贏得6席，另兩席以些微票數敗陣（中國報 2006）。民主行動黨這個強調華文教育的華基反對黨在砂拉越的迅速發展，自應對其他華基反對黨及身為執政團體的人聯黨產生相當的衝擊，2007年起，砂拉越州政府每年撥馬幣50萬元資助該州14間華文中學的政策，似乎是人聯黨為爭取華族選民支持而做出對華文中學制度化的經費支撥。2008年3月8日國會大選前，砂拉越人聯黨似乎為了爭取華裔選票，在大選前夕發布「十大承諾」，表示將推動政府承認華文中學統考的文憑。⁶⁷不過，這項臨時發放的「紅包」，似未能贏得砂拉越華族的歡心。人聯黨在這次國會大選中參與7個席位選舉，卻只當選6席，比起2004年的國會大選結果還少1個席次；且據人聯黨內部分析，「各區票箱開箱結果原本屬於人聯黨基本盤的華裔選票出現了一面倒向反對黨……此次保住六個席位，所依賴的是達雅人（伊班）的選票」（光明日報 2008a）。

2008年12月，民主行動黨籍的檳州首席部長林冠英就調侃人聯黨「沒有辦法為華校取得更大的突破」，他進一步指出，檳州在其執政後，每年制度化地從州政府預算撥出馬幣100萬元給該州的5所華文中學，因而建議人聯黨若不能為華文教育爭取更大經費的話，不如退出國陣。⁶⁸民主行

⁶⁶ 1974年「國陣」成立時，砂拉越土著黨與砂拉越保守黨合併而成「土保黨」（Partai Pesaka Bumiputera Bersatu），在砂拉越擁有相當大的政治勢力，是砂拉越州國陣的主導政黨（王國璋 1997：215）。

⁶⁷ RTM2 頻道華語新聞節目《八點前線》於2008年3月8日的報導。

⁶⁸ 林冠英的談話，見光明日報（2008b）。1970年砂拉越州議員選舉，由於砂拉越聯盟僅得23席，砂拉越國民黨及砂拉越人聯黨各得12席，砂拉越人聯黨乃被邀參加砂拉越聯盟，成為砂州的

動黨的呼籲雖未必動搖人聯黨繼續留在執政的國陣陣營的立場，但其維護華文教育的訴求，⁶⁹對砂拉越華族社會自會有相當的吸引力，尤其是 2010 年 5 月人聯黨與民主行動黨兩黨同時競爭詩巫國會議員席次的補選，人聯黨雖有首相納吉親自輔選，但選舉結果卻是民主行動黨獲勝，行動黨在詩巫華族人口密度最高的巴拉萬區還取得 90.61% 的票數（中國報 2010d）。為鞏固人聯黨在砂拉越州國陣政府中的地位，該黨除與一黨獨大的土保黨協調與溝通外，⁷⁰更需有華族選民的支持，為此，人聯黨就必須對華校做出實際的支持行動。2010 年初，人聯黨主席陳康南表示，該黨將「力促國陣中央政府，盡快局部承認獨中統考文憑」（中國報 2010a）。詩巫補選失利後，痛定思痛的人聯黨為即將到來的砂拉越州選舉開始布局，為避免華教課題再度成為反對陣營用來抨擊人聯黨的「具殺傷力武器」，人聯黨在 9 月初展開拜訪全砂境內所有華文小學與華文中學的行動，蒐集有關華校經費等相關問題，呈交副首相兼教育部長慕尤丁（Muhyiddin Haji Mohd Yassin）以採取解決對策（光明日報 2010）。

國陣內的華基政黨，不論是馬來西亞聯合邦中央政府裡的馬華公會及民政黨，或砂拉越州內的人聯黨，這些華基政黨為其生存與發展，勢必增加對華文中學的協助，以爭取華族的支持，身為國陣主導政黨的巫統，也會適時給予華文教育補助，以免華族票源一再流失，而給予反對黨在砂拉越華人社會有更大的擴展空間。種種跡象顯示，將來砂拉越華文中學在透過各種管道請求州政府、甚至中央政府補助時，華基政黨，不論是執政黨或反對黨，為獲得華族選民的擁護，勢將增加其對華文中學教育發展的協助。而長期主導馬來西亞聯合邦政府政治的馬來族群，在人民的民主意識

執政團隊之一。1974 年時，馬來西亞聯合邦首相阿都拉薩將巫統、馬華、印度國大黨等三大政黨所組成的「聯盟」改組擴大為「國民陣線」（國陣）時，砂拉越聯盟亦加入，砂拉越人聯黨也就成為國陣的一員（王國璋 1997：107-109）。

⁶⁹ 2009 年 12 月 19 日，以民主行動黨為首的跨政黨組織「民聯」首次召開代表大會，將鞏固各民族母語的使用、公平分配教育撥款及承認獨中統考列入其「四大政綱」（南洋商報 2009）。

⁷⁰ 2008 年 3 月馬來西亞聯合邦的大選，砂拉越由土保黨主導的國陣雖仍獲得砂州人民的支持，但為防範反對黨的壯大，國陣秘書長倫迪以西馬地區為鏡，強調砂州國陣必須更努力，以防 2011 年砂州議會選舉時，政權落入反對黨手中（星洲日報 2008）。

日愈提升下，似將逐步授予境內華族更平等的政治與社會地位，⁷¹砂拉越華文中學的發展將可得到更多的資助。

五、結論

自十九世紀中葉白人拉惹政權招募大批華工協助砂拉越的開墾後，華人就逐漸構成砂拉越多元文化社會的重要一個族群。戰後，白人拉惹將政權讓渡給英國，砂拉越成爲英國的殖民地。爲穩固其統治，英殖民地政府認爲必須灌輸境內各族群共同的砂拉越意識，而欲建立一個以英語文爲教學媒介的國家教育體系，遂頒訂多項教育措施，推動改制計畫，以津貼爲手段誘使華校轉變爲英校。當 1963 年砂拉越成爲馬來西亞一州後，在以馬來文化爲核心價值的國族建構過程中，華文教育仍是被統治當局排除在國家教育體系之外。當年，許多華校因受迫於財政上的艱難而改制爲國民型中學，但今日砂拉越仍能保有全馬來西亞近四分之一的華文中學。

對許多馬來西亞華人而言，華語是他們的母語(林開忠 2002: 11-12)。華文教育被許多當地華族視爲民族文化的根本，對他們而言，學習華語及對華族文化的認同並不會妨礙他們對馬來西亞聯合邦的效忠。例如：泗里奎民立中學的校長就鼓勵畢業生說：「身爲華裔同胞的我們，絕不能摒棄母語教育和文化遺產且應該做個有文化根莖的馬來西亞人」(特刊編輯委員會 1994: 4)。華文教育支持者認爲，馬來西亞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國家，華語文應是構成馬來西亞文化的重要成分，⁷²視華文中學負有延續和維護民族文化的使命，⁷³但對以馬來語文爲國語並爲唯一的官方語文、企圖建立類似近代歐洲民族主義國家那樣的單一民族國家的馬來人而言，華文學校的存在只是一項「必須之惡」，僅能容忍但難以妥協，因此即便將華文

⁷¹ 2009 年 4 月，馬來西亞新任首相納吉宣布取消運輸、旅遊、企業服務等 272 項商業活動必須由土著擁有 30% 股份的規定，詳細討論見中國時報 (2009)。

⁷² 例如：陳禎祿就認爲中華文化與馬來文化同是構成「馬來亞文化」的重要成分，見“Radio Debate on Proposed Chinese University between the Vice-Chancellor Sydney Caine and Dato Sir Cheng Lock Tan” (李業霖編 2002: 20)。

⁷³ 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 (董總) 就明白宣示，「華文獨中是我們民族教育的重要環節，她肩負著延續民族文化，發展母語教育，培育民族子弟，爲國儲才的神聖任務」(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 1991a: 1)。

小學納入初等教育的一環，以津貼誘使部分華文中學改制為國民型中學，但在國家教育資源的分配上，卻明顯忽略華小及改制中學的需求（星洲日報 2010a, 2010e），更遑論那些被排除在國家教育體制之外的華文獨立中學了。因此，華文學校作為一種民族認同的核心，成為馬來西亞華族社會對統治當局的馬來化政策的一種抗衡，不論是在西馬或東馬皆然。

砂拉越的華文中學是特殊時空環境下的產物，由於砂拉越幅員廣大，除了古晉與詩巫兩大城市之外，華族散居四境，地處偏遠的華校招生不易，因此這些華校裡，除了古晉中華第一中學及詩巫公教中學較具規模外，其餘學校的學生人數較少，甚至有 5 間學校是學生人數僅十幾人的微型中學。此外，由於當年遷徙海外的華族大多來自原鄉的閩粵兩省，他們為求生存而在民性上本就稍顯務實逐利，在現實環境的驅使下，大多數人理所當然會選擇接受政府推行的教育。⁷⁴不被政府所承認的獨中，在發展上就有先天上的限制。即使面臨招生與經營上的困難，但砂拉越華族社會仍為維護其母語與文化，也為不易升學的華裔子弟謀求出路，自 1960 年代起，竭力地保存與維持境內 14 間華文中學的發展。

由於華、英文應用價值遠較巫文重要，為抗衡馬來西亞聯邦政府獨尊巫語政策的推行，華教人士開始標榜「華、巫、英三語並重」，以及強調華語文的實用價值。近年來，華語文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與使用之現象，更被華教人士視為肯定華文中學價值的證據。砂拉越華文中學強調華文的實用價值以及重視英語的教學，似可吸引一些當地華族子弟及少數非華族子弟進入華文學校就讀；然而，這種過度強調華語文的實用價值，可能使近代以來著重商業活動的東南亞華族，⁷⁵尤其在馬來西亞地區的華族，視教育為商業行為而忽略中華文化的內涵，進而侷限其發展，甚至會誤誘馬來族群及其領導者只著重華語文的實用位階而未能理解華語文所蘊含的文化價值，仍舊忽略馬來西亞為一個多元文化國家的事實。而這種

⁷⁴ 1999 年古晉中華第一中學訓育主任許武琳就指出，由於獨中統考文憑尚未被馬來西亞聯邦政府承認，在此一現實考量下，造成高達 95% 的華小畢業生家長未送子女前往華文中學就讀，他呼籲家長讓子女再接受六年的母語教育，並預測「統考文憑將被承認」（國際時報 1999b）。

⁷⁵ 有關這方面的討論，見古鴻廷與曹淑瑤（2008）。

忽略，從長程的角度來看，可能會影響砂拉越地區華文中學未來的發展，也可能降低華族對母語教育堅持的信念，因而可能導致許多華族子弟在受完華小教育後，不再以華文中學為其升學目標。⁷⁶當文化底蘊無法進一步累積與深化，或將使砂拉越華族的母語教育更易因通俗化與商業化而失去其精緻性。

當然，砂拉越的華文教育也存在著另一個契機。由於位處東馬，遠離馬來西亞的政治權力中心，而華族與當地執政的主要土著族群關係良好，在民主觀念日盛而在選舉上獲勝成為執政的基礎下，砂拉越的華基政黨，不論是參與國陣執政團隊的馬華公會、民政黨、人聯黨，或是反對陣營的民主行動黨，勢必將協助華文中學的發展，給予更多的經濟支持，使砂拉越的華文中學在其所標榜之民族文化可能日趨通俗化的趨勢上，因辦學經費較充裕，在硬體設施、師資待遇上有所改善，而仍有繼續生存與發展乃至向上提升的空間。

⁷⁶ 2009年一份對1,100位華文獨立中學高三畢業生的問卷調查中發現，只有67%的受訪者表示將來會送其子女進入華文中學（陳美鳳 2009：17）。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1995 年校刊暨卅五周年特刊編委會（1995）《一九九五年詩巫公教中學校刊暨創校卅五週年紀念特刊》。砂拉越詩巫：詩巫公教中學。

《中國時報》（2009）〈馬經濟政策鬆綁〉。4 月 29 日。

《中國報》（2006）〈林冠英：民行在砂贏六席 疑經濟壓力增促成〉。5 月 23 日。

____（2010a）〈陳康南：速局部承認統考 讓獨中生報讀大學〉。2 月 26 日。

____（2010b）〈劉利民：首相肯定 副揆否決 仍須力爭承認統考〉。3 月 29 日。

____（2010c）〈劉會耀 3 孩子讀國際學校 林吉祥質問：沒信心？〉。5 月 9 日。

____（2010d）〈民行勝出關鍵因素 數華人區得票比 308 多〉。5 月 18 日。

《中華日報》（1969a）〈砂華公會文告指出沈玉池乃曲解砂華教育方針〉。4 月 15 日。

____（1969b）〈市議會應多辦華校 滿足華人社會需求〉。6 月 26 日。

____（1970）〈鼓勵學生入華校 董教須以身作則〉。10 月 21 日。

____（1972）〈面對於來越多的困難〉。10 月 6 日。

____（1974）〈古晉中華中學校董會聲明〉。2 月 27 日。

王國璋（1997）《馬來西亞的族群政黨政治》。台北：唐山出版社。

古晉中華第一中學（1998）《創校四十週年紀念特刊（1958-1998）》。砂拉越古晉：古晉中華第一中學。

古晉中華第三中學（1975）《古晉中華第三中學拿汀黃王秀英禮堂落成開幕暨校慶十八週年遊藝會紀念特刊》。砂拉越古晉：古晉中華第三中學。

古晉中華第四中學（2000）《古晉中華第四中學 1960 年-1998 年班數、學生與教師人數表》。古晉：中華第四中學手抄本。

古鴻廷（2001）〈西馬地區華文獨立中學之研究〉。《南洋問題研究》2001（1）：23-40。

____（2003）《教育與認同：馬來西亞華文中學教育之研究（1945-2000）》。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古鴻廷、張曉威、曹淑瑤 (2001)〈東馬來西亞地區華文獨立中學之研究〉。第四屆世界海外華人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 古鴻廷、曹淑瑤 (2008)〈近代東南亞華族移民重商原因之探討〉。 *Journal of Diaspora Studies* 2 (1) : 149-168。
- 田英成 (1998)〈砂勞越華人政治演變〉，見林水椽、何啓良、何國忠、賴觀福編《馬來西亞華人史新編》第二冊，頁 187-214。吉隆坡：馬來西亞中華大會堂總會。
- 田紹熙 (1984)〈信心百倍地發揚華教〉，見沈玉池《華教工作廿二年》，頁 398。砂拉越古晉：沈玉池。
- 《光明日報》(2008a)〈不能解決問題？人聯黨不退出國陣〉。9月15日。
- ____ (2008b)〈林冠英：爭取不到華小撥款？砂人聯黨應退出國陣〉。12月16日。
- ____ (2010)〈防反對黨打華教牌 人聯訪校收集問題〉。9月9日。
- 李光耀 (1998)《李光耀回憶錄，1923-1965》。台北：世界書局。
- 李業霖編 (2002)《南洋大學走過的歷史道路》。吉隆坡：馬來亞南洋大學校友會。
- 沈天奇 (2008)〈馬來西亞教育統計數據系列〉。《馬來西亞華文教育》8 : 89-92。
- 沈玉池 (1984)《華教工作廿二年 (1960-1981)》。砂拉越古晉：作者。
- 沈亭 (1985)〈霹靂州華文獨立中學復興史〉。見董總出版小組編《獨中今昔》。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頁 16-25。
- 林之光、朱化雨 (1936)《南洋華僑教育調查研究》。廣州：國立中山大學出版社。
- 林宜慧 (1999)〈砂勞越詩巫福州人領導層之研究〉。台北：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開忠 (2002)〈馬來西亞國家建構與華人族裔的關係——以華文教育運動為例〉。新馬印華人：族群關係與國家建構國際學術研討會。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協會。
- 林瑞源 (2009)〈如果這個國家沒有華教〉。《星洲日報》，12月15日。
- 林鵬輝 (2004)〈我們的前輩為何能如此「技藝高超」？〉。見黃招發編《砂拉越華教百年坎坷路》。砂拉越美里：Law Yew Muk。頁 viii。
- 泗里奎民立中學 97 年高初中畢業紀念特刊委員會 (1997)《創校三十周年兼高初中畢業特刊》。砂拉越泗里奎：泗里奎民立中學。
- 《南洋商報》(2005)〈規範譯名衝擊書商教科書一改再改 各造難適應〉。4月11

日。

____ (2006)〈砂選舉：國陣之勝 人聯之挫〉。5月22日。

____ (2009)〈民聯四大政綱摘要〉。12月20日。

《星洲日報》(2001)〈劉久健：與董事校方更大管理空間 村民校友勿干涉校政〉。
7月8日。

____ (2004)〈華語規範理事會決定沙巴首府統稱為「亞庇」〉。7月30日。

____ (2006)〈剛好70歲生日 泰益宣誓任砂首長〉。5月23日。

____ (2008)〈砂國陣：西馬反風為借鏡 力保砂主權不易主〉。3月12日。

____ (2010a)〈學校需撥款 見光怕遭對付 180校長「冒險」偷會首長〉。1月9日。

____ (2010b)〈擺脫種族單元形象 友族獨中生有增無減〉。4月1日。

____ (2010c)〈獨中全民人才的搖籃：學會包容欣賞他族文化 友族外籍生樂享新天地〉。4月4日。

____ (2010d)〈首相詩巫撥款 華小1000萬 獨中500萬 聖中及教會小學300萬〉。5月14日。

____ (2010e)〈孕育80%華小師資 國民型中學問題勿忽略〉。10月7日。

柳新(1986)〈石角今昔談〉。見編委會編《馬來西亞砂勝越第一省古晉石角中華公會成立紀念特刊》。砂拉越古晉：石角中華公會。頁45-48。

砂拉越州華文獨立中學董事會聯合總會(1987)《砂拉越州華文獨立中學董事會聯合總會章程》。砂拉越詩巫：砂拉越州華文獨立中學董事會聯合總會。

《砂拉越晚報》(1975)〈校董不將子女送進華校〉。2月19日。

____ (1976)〈古晉中中校董會昨開記者招待會〉。1月7日。

砂拉越詩巫省華文獨立中學董事聯合會(1987)〈砂拉越詩巫省華文獨中統一辦學規定〉。砂拉越詩巫：砂拉越詩巫省華文獨立中學董事聯合會。

《美里日報》(2000)〈廉中董事長劉久健：民族情意結使獨中生受罪 勿把下一代當砲灰〉。3月3日。

美里廉律中學(1988)《本校簡史》。砂拉越美里：美里廉律中學。

美里廉律中學教務處(1998)《1998年廉中全校各班科目節數分配表》。砂拉越美里：美里廉律中學。

- 特刊編輯委員會（1994）《泗立中學一九九四年畢業特刊》。砂拉越泗里奎：立立中學。
-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編輯部（2004）〈2004 年全國 60 所獨中各州各年級學生人數統計〉。《馬來西亞華文教育》1：74。
- ____（2007）〈2005-2006 年各州華文獨立中學學生和教師人數〉。《馬來西亞華文教育》6：63。
- ____（2008）〈2007 年各州華文獨立中學各年級學生人數〉，《馬來西亞華文教育》8：90。
- ____（2010）〈2008-2009 年全國各州華文獨立中學學生總數與初中一學生人數和教師人數〉。《馬來西亞華文教育》10：108。
- 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教育研究中心（1985）《教總成立卅三年華文教育史料》中冊。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教育研究中心。
- 《國際時報》（1977）〈古晉中華總商會昨決定成立發展華小支持獨中工作委會〉。9 月 14 日。
- ____（1999a）〈許興梅：並重三語文 獨中強調品德教育〉。8 月 1 日。
- ____（1999b）〈許武琳：大馬教育中心語文開放 統考文憑將受承認〉。10 月 22 日。
- 教育研究中心（1992）《回顧與省思：1991 年教育課題及教育統計資料》。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
- 教總三十三年編輯室（1987）《教總 33 年》。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
- 教總調查研究及資訊組（2009）《華小建校、遷校和微型華小資料集》。雪蘭莪：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
- 畢業特刊編委會（1998a）《一九九八年度美里廉律中學^{高中}第³⁰屆畢業特刊》。砂拉越美里：美里廉律中學。
- ____（1998b）《古晉中華第四中學一九九八年度畢業特刊》。砂拉越古晉：古晉中華第四中學。
- ____（1999）《古晉中華第一中學高初中第^五屆 1999 年畢業特刊》。砂拉越古晉：古晉中華第一中學。
- 統籌統辦五十週年特刊編委會（1998）《古晉中華中小學校董會慶祝五十週年特刊》。砂拉越古晉：古晉中華中小學校董會。
- 莫順生（2000）《馬來西亞教育史》。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

- 許雲樵（1963）《馬來亞近代史》。新加坡：世界書局。
- 陳美鳳（2009）〈新世代馬來西亞華人與華文教育：以獨中生為例〉。《2009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頁 1-20。
- 《華聲報》（2006）〈大馬華教界人士呼籲政府給華文獨中更大經濟援助〉。8月22日。
- 黃招發（2004）《砂拉越華教百年坎坷路》。砂拉越美里：Law Yew Muk。
- 黃建淳（1999）《砂拉越華人史研究》。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新紀元》（2005）〈服務與學習一體 凝聚虹彩繪西連〉。4月。
- 楊佳佳（2010）〈政府的教育政策對砂拉越華文教育發展的影響（1841-1989）〉。雪蘭莪：拉曼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 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1991a）《今日獨中之一》。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
- （1991b）《今日獨中之三》。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
- 董總 50 年編委會（2004）《董總 50 年特刊（1954-2004）》。雪蘭莪：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
- 董總出版小組（1985）《獨中今昔》。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
- 《詩華日報》（1970）〈校董會屬下三間中學歷年學生人數及成績概況〉。11月5日。
- （1998）〈廉中略調整 3 語節數 配合新學年課程改革〉。10月30日。
- 劉子政（1992）《砂羅越五十年代史事探微》。詩巫：砂羅越華族文化協會。
- 劉伯奎（1985）《杏壇二十年》。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學會。
- 鄭良樹（1998）《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第一分冊。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
- （1999）《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第二分冊。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
- （2001）《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第三分冊。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
- （2003）《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第四分冊。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

饒尙東 (1999)〈東馬華人人口變遷〉。見林水椽、何啓良、何國忠、賴觀福編《馬來西亞華人史新編》第一冊。吉隆坡：馬來西亞中華大會堂總會。頁 235-285。

西文部分：

Andaya, Barbara Watson And Leonard Y. Andaya (1982) *A History of Malaysia*.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Cheah, Boon Kheng (2002) *Malaysia: The Making of a Nati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Federation of Malaya (1951) *Chinese Schools and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Malaysians: The Report of a Mission Invited by the Federation Government to study the Problem of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in Malaya, 1951*. Kuala Lumpur: The Government Press.

____ (1962) *Malaya Official Year Book, 1962*. Kuala Lumpur: The Government Press.

Federation of Malaysia (1968) *Malaysia Official Year Book, 1966*. Kuala Lumpur: The Government Press.

Hayes, Carlton J. H. (1953)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Modern Nationalism*. New York: Russell and Russell.

McLellan, D. (1959) *Report on Secondary Education*. Kuching: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Ooi, Keat Gin (1994) "Chinese Vernacular Education in Sarawak during Brooke Rule, 1841-1946." *Modern Asian Studies*, 28(3): 503-531

____ (1996) *World Beyond the Rivers: Education in Sarawak from Brooke Rule to Colonial Office Administration, 1841-1963*. England: Department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ull.

Roff, William R. (1967) *The Origins of Malay Nationalism*.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網頁資料：

西連民眾公立中學 (2009)〈西連民眾中學簡介〉。《西連民眾公立中學》。網址：<http://huawen.info/thread-1517-1-1.html>。(2009/2/6)

砂拉越中華工商聯合會 (2009)〈砂商聯會撥款〉。《砂拉越中華工商聯合會》。6月20日。網址：<http://www.ccm.com.my/Meeting2.html>。(2009/10/20)

砂拉越河婆同鄉會 (2003)〈砂拉越河婆同鄉會主辦主辦「西連縣河婆播茶會」為西連民中籌辦學經費〉。《砂拉越河婆同鄉會》。網址：

<http://www.hepo.org/hopoh/fp/230803.htm>。(2009/01/20)

砂拉越華人社團聯合總會(2003)〈2003年活動報導〉。《砂拉越華人社團聯合總會》。網址：<http://www.huazong.org/jinhauhuazong/Nd140903/151103.htm>。(2009/01/20)

拿督斯里張慶信中文新聞室(2007)〈張慶信出席2007年慶開智中學高中三畢業晚會暨謝師宴〉。《拿督斯里張慶信中文新聞室》。11月15日。網址：<http://p216bintulu.com/b5-Tiong-News-2007/November-15-2007-Kaidee.html>。(2009/03/20)

附錄：今日砂拉越地區華文中學基本資料

| 序 | 校名 | 創校年份 | 創校人 | 備註 |
|----|----------|------|------------------|------------------|
| 1 | 古晉中華第一中學 | 1946 | 古晉 13 個華團 | |
| 2 | 古晉中華第三中學 | 1958 | 原古晉中華中學分設 | |
| 3 | 古晉中華第四中學 | 1960 | 古晉中華中學董事會 | |
| 4 | 石角民立中學 | 1967 | 張君光及石角 10 所華小董事會 | |
| 5 | 西連民眾公立中學 | 1968 | 鄭和仁、蔡高固等 | |
| 6 | 泗里奎民立中學 | 1967 | 泗里奎華社 | |
| 7 | 美里培民中學 | 1962 | 中華僑會、客屬公會等華團 | |
| 8 | 美里廉律中學 | 1967 | 蔡通寶、張竹琴、李文吟等 | |
| 9 | 民都魯開智中學 | 1952 | 黃廷應、潘清華等 | 原詩巫開智，2001 年遷民都魯 |
| 10 | 詩巫建興中學 | 1946 | 林開臻等 | |
| 11 | 詩巫光明中學 | 1952 | 詩巫雙溪美祿華社 | |
| 12 | 詩巫公教中學 | 1961 | 天主教聖母會 | |
| 13 | 詩巫公民中學 | 1960 | 江仲宵、潘岳生、劉禮庭等 | |
| 14 | 詩巫黃乃裳中學 | 1967 | 劉賢任、陳立訓等 | |

資料來源：整理自黃招發（2004：38，45，49，54，58，70，76，84，89，109，115，126，134，139，145，156）；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1991b：6，20，30，42，52，72，84，98，110，120，134，146，158）。

泰國對中國外交政策的演變：建構主義的觀點 分析*

戴萬平 **

中文摘要

國際關係理論中，建構主義一方面將制定外交政策視為是行動者的選擇，另一方面也強調國際體系結構的重要性，兩者具有同樣的重要性。本文根據建構主義的論證：泰國對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並非新現實主義或新自由主義所強調的「實體理性或是權力均衡」作用下的結果，反而是「在兩國社會共有的觀念下定義國際政治結構」建構的相互關係；也就是說：近 30 年來，泰國對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除受國際政治結構所影響外，更包括透過國內社會實踐互動的結果。泰國對中國的政策不僅靠物質權力，更有社會力量作為兩國雙邊關係的支撐基礎。這種現象也是建構主義的觀點所鋪陳，建構主義為 30 年來泰中關係演進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分析模式。

關鍵字：建構主義、泰国外交、泰國政治、泰中關係、中國威脅論

* 本文為作者參與 98 學年度教育部科技顧問室委託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新世紀東亞政經教學研究計畫」以及正修科技大學 98 學年度「泰國東亞大學海外教授交換計畫」的部分研究成果。作者感謝兩位匿名評審者的審查意見，以及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研究所博士生何展傑、碩士生陳林兩位泰籍同學協助整理與翻譯泰文資料。

** 作者為正修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副教授。E-mail: wptai@csu.edu.tw

本文收件日期為 2009 年 11 月 24 日，接受刊登日期為 2010 年 03 月 24 日

The Change of Thai-Sino Relation: A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vism

Wan-Ping TAI

Abstract

Among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Theories, Constructivism sees the enact of foreign policy as the choice of actor and also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This essay analyzes the Thailand foreign policies with China by adopting Constructivism. It finds the Thailand foreign policies with China is not the ‘power balance of Egocentrism’ from new liberalism and new realism, rather, it is the result from ‘the defini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ructure under the common views in society’. Recent 30 years, the Thailand foreign policies toward China are affected by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 interaction within society—The Thailand policy toward China is supported by the physical power and society power as well. This situation is explained by Constructivism and therefore, constructivism is the suitable analysis model for the Thailand foreign policy toward China.

Keywords: Constructivism, Thailand foreign policy, Thailand-China relationship, China treat

一、前言

在國際關係研究中，建構主義（Constructionism）是近年來逐漸受到重視的學派。建構主義的觀點挑戰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與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強調國際社會除「物質」之外，還有「觀念」的存在；國際社會行動者（actor）是國家；國際關係環境存有秩序、規範、結構、制度、價值等共同文化與知識，而國家的動機與作為會因為彼此利益、衝突、期待、互信、互賴、制衡、對立和結盟等「互為主體性」的關係而有所影響。

就外交政策而言，現實主義透過無政府狀態下，國家間的實力分配理解國家的對外行爲；自由主義則是以國內政治爲中心，利用相對利得與絕對利得的利益關係來分析國家的對外政策。這些分析框架，主要以個體主義與經濟分析的方法，透過理性主義的視角，進行成本與收益的計算，達到國家對外政策效用最大化的結果。建構主義則是將國家和國際體系的互動相結合，從國際與國內的集體身分和規範的角度去審視國家的對外政策。

在地理位置上，泰國與中國（1949 年前的中華民國與 1949 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鄰近國家，泰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從 1975 年 7 月 1 日正式建交，其後在正常外交關係的架構下創造共同利益。例如：在 1990 年，中國透過泰國協助順利建立與東協（Associations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國家的關係；1997 年，金融風暴讓泰國經濟深受重創，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用泰國向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求援之際伸出援手，給予低利貸款作爲援助。

兩國之互動已有上千年歷史，但近代泰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是以 1975 年爲起點，而非 1949 年。形成這種「由朋友到敵人，又由敵人到朋友」現象，有幾個因素。首先是在國際因素上，自從共產黨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欲將共黨勢力延伸至印支半島（Indo-China），

就令泰國政府感到不安，認為被共產黨統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會影響到泰國的安全。其次，由於中國的分裂，在泰國的華人也開始分裂成兩大派系：一派支持中國共產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另一派支持中國國民黨的中華民國（Skinner 1957: 326）。由於這兩派對於當時的泰國政壇都有相當的影響力，致使泰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的時程也受到影響（Chinnawanno 2005: 1-12）。然而，1975 年後，為何泰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從不穩定迅速發展成為友好合作？兩國外交政策的轉變可以何種國際關係理論來加以解釋？

新現實主義分析外交政策主要是以「權力」為分析基礎，聚焦於「國家在國際體系中所處的權力位置」，尋求「權力」與「行為」的因果關係（Waltz 1979）。新自由主義認為，國家的外交政策主要是「國家行為的利益計算共同結果」，國家會透過利益計算決定對外政策。¹這兩個學派對於外交政策的分析，忽略了國內政治在結構上的作用，例如：國內利益團體、民意的走向、國內政治系統的本質，是構成國家對外決策的考量因素（Milner 1992: 466-496）。²相對而言，建構主義一方面強調「國際體系結構」（structure）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將外交政策制定視為是「社會行動者（也就是國家）的選擇」，兩者具有同樣的重要性（Kubálková 2001: 19; Singer 1961: 85-90）。相對於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強調國內因素結構決定外交因素則是建構主義分析的重要特徵。³

本文根據建構主義「外交政策為國家所造就」的概念，分析泰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is what state make of it）。本文試圖論證：泰

¹ 國家內部行動者通常可以分為兩類：「政治行政系統」（political-administrative system actor）與「有組織的行為體」（organized private actor，如經濟利益團體），行動者的基本利益就是增加經濟力量、拓展決策權力。

² 建構主義的相關理論探討，參見鄭端耀（2001）〈國際關係「社會建構主義理論」評析〉。《美歐季刊》15（12）：199-229。秦亞青（2001）〈國際政治的社會建構——溫特及其建構主義國際政治理論〉。《美歐季刊》15（12）：231-264。袁易（2001）〈對於 Alexander Wendt 有關國家身份與利益分析之批判：以國際防擴散建制為例〉。《美歐季刊》15（12）：265-291。

³ 舉例而言，袁易認為，不論是新現實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在分析美、中（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時，往往會忽略到美國國會的歧見其實對兩國的關係是有很大的影響。參見袁易（1996）〈多邊主義安全困境下之合作：國際關係理論與美中關係〉。《問題與研究》35（6）：1-17。

國對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並非新現實主義或新自由主義所強調的「實體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是權力均衡」作用下的結果，反而是「在兩國社會共有的觀念下定義國際政治結構」建構的相互關係。也就是說，近 30 年來，泰國對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除了受到國際政治結構的影響外，更是國內社會實踐互動的結果；泰國對中國的政策不僅靠物質權力，更有社會力量作為兩國雙邊關係的支撐基礎。

二、文獻探討：建構主義與建構主義架構下的外交政策

（一）建構主義的內涵

1970 年代以前，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兩大派別主導西方國際關係研究，兩學派的內容成為國際關係理論爭論的焦點。自 1970 年代中期以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出現了百家爭鳴的態勢。1980 年代中期至 1990 年代，主流理論範疇下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爭論（*inter-paradigm debate*），成為國際關係理論的研究焦點（*Banks 1985: 9-11*）。非主流國際關係理論，例如：批判理論、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規範理論、新馬克斯主義，也向主流理論發起挑戰（*Keohane 1989: 158-179; Wendt 1995: 71-81*）。「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正是在這種多元國際關係理論辯證的環境中產生和發展，試圖找出在這些爭辯的中間道路。

根據新現實主義的觀點，國際關係只有兩個簡約的變數，那就是國際體系結構與國家行為，兩者是「國際體系結構影響國家行為」（*Gilpin 1981*）。在同樣的理性主義背景下，新自由主義也承認國家的理性與單一性，把國家定義為國際體系中的主體，基本變數也是兩個：國際制度和國家行為，而其之間的關係是「國際制度影響國家行為」。

有別於上述兩個理論，建構主義則提出第三種看法，強調兩個重要原

則 (Wendt 1999)：

1. 國際政治結構不僅影響個體行爲，也建構社會行爲者（國家）的認同和利益；
2. 國際政治結構不僅是物質結構與權力關係，更是社會行爲者（國家）的建構結果。

在這兩個原則下，建構主義的研究者強調運社會學中「規範」(norms)、「身分」(identity)及「文化」(culture)三個觀點 (ideas) 對於國際關係的重要性。根據這三個觀點，建構主義主張國家與國際體系的互為主體關係，而非如新現實主義或新自由主義所提倡的「國際體系結構(或國際制度)影響國家行爲」。簡而言之，國際關係結構是建立在體系成員互為主體性 (inter-subjectivity) 產生的結果，國際關係是相互構成，並非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者所言的線性因果關係；行動者的身分與利益會隨時間而改變，而非一成不變 (Katzenstein 1996: 2; Kratochwil and Ruggie 1986: 753-775)。

建構主義學者 Wendt 以德國與丹麥爲例，說明了這樣的關係。在 1940 年與 2000 年兩個時間點，丹麥與德國的權力差距並無多大的差異，但德國於 1940 年與 2000 年有不同的國家利益，因而對與丹麥間的關係有不同的理解：1940 年德國將丹麥視爲敵人，2000 年則把丹麥視爲朋友。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僅以權力和利益的計算很難解釋國家之間的關係，必須透過「觀念」才能「建構」具有解釋能力的國際關係分析 (亞歷山大·溫特 2000：39-40)。

(二) 建構主義對外交政策的分析框架

除基本內涵與其他國際關係理論有所差異外，部分建構主義學者也嘗試從事實證研究，把建構主義的視角和概念運用到國家外交政策框架中，以彌補主流理論解釋的不足 (Bozdaghoglu 2003; Katzenstien 1996)。建構主義者使用前述的三個觀點：「規範」、「身分」、「文化」爲核心，作爲國

家外交政策分析的起點 (Walt 1998: 29-46)。

1. 「規範」概念與外交政策

建構主義者所指稱的「規範」是指社會約定，包括規則、標準、法律、習慣及習俗等；建構主義把規範概念定義為「行動者共同持有適當行為的共同預期，是一種集體持有的共同觀念」(Finnemore 1996: 22-23)。由於建構主義者主張，行動者並非如理性主義的經濟人，其行為是鑲嵌在社會結構之中，也就是行為會受到社會規範所導引。建構主義者認為，建構而產生出來之社會規範，不僅影響和規定著國際政治中國家行動者的具體行為、利益、優先選擇，以及實現對外政策目標的工具，還可以幫助行動者理解什麼是重要的或有價值的，以及在既定的規範下，如何運用合法手段去獲取國家利益 (Finnemore 1996: 15)。

簡單而言，社會規範使國家（國際社會的行動者）的行為與決策必須遵守「適當性邏輯」的規範 (logic of appropriateness)。這些邏輯規範限制與規定國家的決策，使行為合理、合法化，並以此決定國家利益 (袁正青 2004: 4-5)。如果將這樣的概念套用至國家外交政策的分析，在國際層次上，國家會把國際規範內化，尋求國內共識；⁴在國內層次上，規範指國家將國內社會所享有的規範加以外化，並轉化成外交政策 (Rittberger and Schimmelfenning 2005: 115-132)。

2. 「身分」概念與外交政策

「身分」或有學者譯「認同」，或是「自明性」，概念來自社會心理學，指行為透過「自我認知」與「其他者」的互動關係所形成的「自我理解」 (self-understanding)，用這樣的理解決定「我是誰」。

在國際關係建構主義學派的眼中，國家是具有各種「身分」的行動者，這樣的身分結構是由外在與內在結構建構而成的 (亞歷山大·溫特 2000: 282)。其中，外在結構指國家置身於國際政治環境，此時國家的身分可分

⁴ 國際規範指國際法、國際組織的法律條款和國際會議的決議。

為三種：敵人、對手和朋友，不同的角色會給予國家不同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將會規範國家的外交決策。而內在結構則是指國家內部的形式，包括共同的文化或國家形式（forms of state）和國內政治經濟體制或政權類型（regime types）。共同的文化包括語言、習慣和宗教，國內政治經濟體制則是指自由 vs. 民主、自治 vs. 專制等。國內的政治發展，如戰爭、革命和制度變遷等，會改變國內利益團體的權力配置；最有實力的組織或個體會將他們的觀念和認同加強到法律、政治和社會結構中，使之制度化。一旦成為社會事實，就會對國家行為產生影響（Bozdaghoglu 2003: 29）。

現實主義強調，「國家生存」是唯一國家利益，建構主義主張國家利益是動態且處於變化過程當中，也就是「利益是透過社會相互作用而建構」（Katzenstein 1996: 2; Wendt 1999: 193-245）。簡單而言，建構主義認為，國家依據其自有身分與其他國家互動，這些主觀的利益觀念導致國家對外政策和行為（亞歷山大·溫特 2000：282-290）。在外交政策分析中，如果能先理解國家的身分與利益，有助於釐清在國際體系互動中，誰是敵人、誰是對手、誰是朋友，從而更有利地理解國家對外行為。⁵

3. 「文化」概念與外交政策

除規範與身分是分析一國之外交政策重要因素外，建構主義者認為，「文化」不僅影響國家行為的各種動機，也影響國家的基本特質及身分。在國家所處的全球或國內環境中，所具有的文化或制度的成分形成國家的身分；文化結構建構是塑造「國家地位」（Statehood）或國家身分的來源（Wendt 1998: 52-53）。

建構主義基本上是一個身分政治的研究，而身分形成的兩種邏輯包括自然選擇和文化選擇，所以建構主義者會強調社會互動過程中，文化選擇的重要性。而文化選擇是要靠社會習得與模仿來進行身分的建構，這與新現實主義認為，「國家行動者的特徵是國家固有的，不是社會構成，也不

⁵ 建構主義進一步主張「利益依賴於認同」。兩者之間如果是「敵人關係」，生存利益成為唯一選擇；如果是「朋友關係」，便存在其他選項（Kowert 1999: 1-34）。

會受外界影響」，有很大的差異（Koslowski and Kratochwil 1994: 216）。

主張建構主義的國際關係學者Wendt進一步把文化分類為霍布斯（Hobbesian）、洛克（Lockean）、康德（Kantian）三種文化，三種文化分別基於敵人（enemy）、競爭對手（rival）與朋友（friend）的觀念。Wendt（1998: 391）認為，國家有四種客觀利益，包括生存、獨立、經濟財富與集體自尊，這四種客觀利益在不同的文化結構下有不同的結果。而隨著愈來愈多體系的成員相互認知為敵人、競爭對手或朋友時，體系結構就會傾斜（tipping）到集體的霍布斯、洛克或是康德結構（Wendt 1998: 264-312）。

另一方面，國家所處國際或國內環境中，文化結構建構或塑造了基本的國家身分，而這些正是「國家地位」或國家身分的特徵。某些建構主義學者，如Amitav Acharya，提出文化與歷史因素在東南亞國家外交政策的角色（Acharya 2000）。這些學者認為，應理解文化因素對東南亞國家對外行為的影響，例如：「東協模式」對主權概念的「不干涉內政、不使用武力、一致決、面對面磋商解決爭議」等原則，其背後都與其國內既有的政治文化相關，並在東協架構下制度化，成為東協國家彼此交往的依據（盧業中 2004：94）。同樣地，Peter Katzenstien也以文化的觀點研究安全關係（Katzenstien 1996）。

（三）小結

相對於主流主義將規範、身分和文化概念僅作為解釋行為的剩餘變數來對待，建構主義則將這些過去認為不重要的因素作為分析的起點，用規範、身分與文化三個要素納入外交政策的分析框架，解釋外交政策的變化。隨著行動者的互動實踐不同，規範與身分也就不同。規範和身分不再是主體的，而是互為主體性，具有結構的性質。結構不僅約束行為體的行為，而且還可以改變行為體的身分。身分不同、文化不同，利益自然不同對國家利益的定義也不同，因而也就決定外交政策的差異。

根據上述，本文將有關建構主義的外交政策分析與歸納出以下的論

述，作為後續分析泰中關係的觀點：

1. 建構主義認為，國家外交決策必須遵守「適當性邏輯」的規範，並以此決定國家利益。國家會把國際規範內化，尋求國內共識；國家也會將該國的社會規範外部社會化，成為該國的外交政策。
2. 建構主義認為，國家是具有各種樣式「身分」的行動者，國家對於該國所處的國內外結構的自我認知，會影響到該國的對外關係。
3. 建構主義認為，文化是國家身分的重要來源。文化不同所產生的國家利益自然不同，外交政策就會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有所差異。

三、關係正常化前的泰中（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

（一）冷戰前期（1911-1960）

在 1911 年中華民國成立前，中國歷朝與泰國有一段非常長遠的交往歷史。⁶在中國革命後的 1911 至 1945 年間，因為華人涉及泰國的內政，中華民國雖然多次派員前往泰國洽商建交事宜，但卻一直都沒有結果。⁷不僅如此，1941 至 1945 年二次大戰期間，當時的總理 Luang Phibunsongkhram 與日本往來密切，泰國華人卻暗中協助中華民國與日本作戰，並大量匯款回到中國，造成泰國的外匯失衡。此時，泰國政府對華人的經濟壟斷感到不滿，因而實施「大泰民族主義」政策，禁止華人經濟活動。

二次大戰後，中華民國成為戰勝國，願意協助泰國擺脫戰敗國地位，協助泰國加入聯合國。在此兩項因素的考量下，兩國於 1946 年 1 月 23 日

⁶ 明太祖洪武十年，當時羅斛國王（Low Hok）派世子朝貢中國，明太祖賜「暹羅國王印」，羅斛即改稱「暹羅」（Siam）。1939 年更改國號為泰國（Thailand），1945 年復稱「暹羅」（Siam），1949 年再次改稱泰國（Thailand）。

⁷ 1911 年中國辛亥革命勝利的影響下，部分具有愛國民主思想的陸軍、海軍士兵及公務員，在 1912 年 1 月以中國辛亥革命為榜樣，組織以廢除君主專制、還政於民為目的的「革命黨」，積極準備發動武裝起義。結果因祕密洩漏而被弭平。由於這次事件使得泰國統治者對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沒有好感，並於 1913 年頒布《國籍法》，規定凡在泰國出生者，不論其父母為何國人，皆為泰籍人，藉此對華人施行同化政策。

在曼谷協議建交。⁸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當時泰國追隨美國的反共政策，加上泰國本與中華民國就有外交關係，因此泰國也把中華民國視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在反共同盟的理念下，泰國與中華民國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⁹

此外，當時泰國與美國政府建立友好關係，視中國共產黨為其安全的威脅，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敵對。¹⁰當時由於中國大陸和北越先後淪為共產黨統治，美國深恐會發生骨牌效應，再加以全球「圍堵政策」的需要，在東南亞地區需要一個區域性軍事聯防組織。在這個理念下，美國主導成立「東南亞公約」(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 SEATO)。泰國於1954年9月8日加入該組織，正式成為美國的盟邦。

1950年代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改變外交政策，希望能與東南亞國家交往，最明顯的就是參加在1954年在印尼舉辦的「萬隆會議」(Asian-African Conference In Bandung)。這個會議促成兩國官方首次接觸(Wilson 1967: 205)。當時的泰國總理 Phiboonsongkhram 想改變外交政策，放棄親美維持外交的中立(Chandler and Steinberg 1987: 389)，這樣的立場讓美國不滿，於是支持 Field Marshall Sarit Thanarat 等軍人發動政變，

⁸ 二次大戰期間，泰國政府為自保且去除法國對中南半島的殖民，選擇與日本合作，將領土開放給日軍通行，換取泰國的軍事與政治自主權。1942年1月25日泰國宣布向英美宣戰，日本曾將部份在緬甸和馬來亞半島占領地割讓給暹羅。在此同時，泰國駐美大使 Seni Pramoj 隱藏泰國對美國的宣戰聲明，並組織地下反抗組織(Seri Thai)支持盟軍。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英國要求泰國戰敗賠償，泰國政府則宣稱因為有反抗組織 Serit Thai，1945年8月15日日日本戰敗投降，暹羅隨即在翌日宣布：「暹羅1942年1月25日對英美宣戰宣言無效」，暹羅的「宣戰無效」宣言為同盟國所承認，因而泰國成為同盟國之一員。美國支持此立場，主因是美國害怕歐洲殖民者重返中南半島。

⁹ 最明顯的例子是1953年，美國與台灣政府支持國民黨在緬甸與泰北的軍事行動，遭緬甸政府控訴。在「四國聯合委員會」(Joint Committee Evacuation Team, J.C.EVAC)協調下，泰國政府願意接納與協助國民黨的殘留部隊，解決泰北孤軍的問題。這段時間的歷史請參閱 Phuangphit, Narong (2002) *Back to the past of Thailand and Neighbor Country Relations in 1953-1963*. Bangkok: Auksornjalearnphat; Roskamm, Stephen S. (1992) *Imperial Alibis*. Bangkok: South End Press.

¹⁰ 冷戰初期，泰國的政治立場一向親美。1950年，美國把泰國列為亞洲首批受援國。同年，杜魯門總統批准對泰國提供1,000萬美元的軍事援助。在兩國簽署《共同防禦援助協定》後，美國對泰國提供的軍事援助數量大幅增加。在經濟援助方面，美泰簽署《經濟技術合作協定》後，1951年美國對泰國提供經濟援助890萬美元。參見 Zhongying, Pang (2002) "The US Role in Sino-Russian Relations." *Beijing Review*, 45(21): 7.

推翻 Phiboonsongkhram 主導的政府 (Conboy 1988)。

1957 年，Sarit Thanarat 上台後，全面實施軍事戒嚴，並改採全面向美國靠攏的外交政策，成為美國在東南亞地區最忠實的盟友。¹¹Thanarat 政府並在 1959 年 1 月 17 日發布 53 號革命宣言 (Revolution Announcement Number 53)，宣布嚴禁中國大陸的商品進入泰國，並禁止公民前往蘇聯和中國大陸 (朱振明 1999：52)。

整體而言，冷戰前期泰國並未選擇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正式外交，主要理由包括：

1. 當時國際政治結構的規範，讓泰國必須追隨美國的反共政策，視中國共產黨為其安全的威脅。在反共同盟的理念下，泰國與中華民國依然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在此期間，泰國國王亦曾訪問中華民國。
2. 泰國政府認為，中國共產黨對泰國共產黨提供援助。由於 1950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南北韓戰爭的時候支持北韓，就讓泰國深深體會到中國共產黨對於周遭國家的侵略感 (Whitaker 1972: 331)。
3. 華人對於泰國政治與社會具有影響力，其中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支持中華民國的左派、右派都有。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之驟然變更，恐怕國內會發生不靖情事。
4. 多數泰國人都畏懼共產主義，特別是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雲南傣族自治區之後，因為雲南傣族與泰國人有共同的傳統，泰國政府害怕中華人民共和國會利用傣族煽動泰國華人，這讓泰國政府更加恐懼共產黨主張的社會主義將會入侵泰國 (Gurtov 1975: 24-44)。

(二) 美國對中政策轉變與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1960-1975)

然而，隨著世界局勢的轉變，1960 年開始，美國轉變外交路線。尼克

¹¹ 1962 年泰國外長 Thanat Khoman 和美國國務卿 Rusk 發表聯合宣言，美國與泰國參與越南戰爭，接納 45,000 名美國士兵駐紮泰國，並允許美國有權使用泰國的七個軍事基地。

森總統於 1969 年 7 月 25 日在關島會議上公布美國新戰略路線，以單一敵人為原則；特別是當中國共產黨與蘇聯交惡，美國開始思考拉攏中共有利對抗蘇聯（Chen 1996: 190）。在 1971 年 10 月 25 日聯合國會議上，通過 2758 號決議：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成為聯合國成員；1972 年 2 月，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簽署「上海公報」。

美國的亞洲戰略改變，迫使泰國調整外交政策。過去泰國政府的領導人分為兩派：第一派主要是以軍人為主，考量泰國國家安全，泰國軍方認為泰國不應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另一派為泰國外交官僚，他們發現世界各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之後，從中獲取到許多利益（Chinwanno 2005: 21）。國際政治結構的改變，讓後者的聲勢逐漸占了上風。世界局勢的變化，也使泰國軍人意識到：與中國共產黨敵對，將促使中國共產黨支持泰國的共產黨，可能招致極大損害；如果改善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征剿國內共產黨較為有利（黃瑞真 2008）。

而中共方面繼對美實行「乒乓外交策略」（Ping Pong Diplomacy）奏效後，1972 年 8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主辦亞洲乒乓球錦標賽之名，邀請泰國至北京參賽。當時，泰國總理 Thanom Kittikachorn 允諾並委任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副總理兼內政部長 Praphas Charusathian 與中共進行接觸。當代表團抵達北京機場後，便完全與乒乓球隊分離，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貴賓，展開一連串的政治接觸（許敦茂 1990）。

簡單而言，強權國三角的轉變（美、中（中華人民共和國）、蘇），加上中國文化大革命結束，鄧小平提出對外開放、和平共處的外交政策，是促成雙方建交的國際因素。而 1973 年泰國軍事政府被推翻，文人政府更樂於建立泰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雙方的調和。¹²1974 年發生世界石油危機，泰國的經濟大受打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向泰國出售五萬噸石油，解決燃眉之急（Woodar 1980: 230）。至此，泰國已充分認識到中共有改善

¹² 1973 年 10 月 14 日，泰國發生「十月十四事件」，此事件主要為大學生、學者等集會訴求泰國的民主化，但是，軍事政府卻以武裝方式來鎮壓百姓，因此導致嚴重的流血衝突。但最後軍事政府抵抗不了平民的壓力，被迫瓦解流亡。

關係之誠意。1975 年，美軍從越南撤出，Kukrit Pramoj 就任第 18 任總理，推動多邊外交，決定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並受邀至北京訪問。¹³1975 年 7 月泰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正式建交，成為東協第三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

四、關係正常化後的泰中（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中國）關係¹⁴

（一）冷戰後期的泰中關係（1975-1990）：政治與軍事安全的合作

在 1975 年建交前，泰、中兩國的關係處於緊張的狀態；建交初期，泰、中關係也歷經一段短時間的磨合期，泰國官方對中國還抱持著保留的態度（Atom 2000: 98-99）。1977 年 1 月，泰國政府宣布新法律，下令禁止政府官員前往共產國家，間接影響到泰國與中國之間的關係（Evans and Rowley 1990: 182）。

但是在 1978 年之後，兩國關係開始升溫。當時的國際情勢，由於中國與美國關係的改善，蘇聯不希望失去在亞洲的影響力，在 1978 年 11 月 3 日與越南簽訂軍事援助性質的《蘇越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支持越南在印支半島的勢力擴張，逐步實現所謂的「印支聯邦」計畫（Ginsburgs 1987: 522）。泰國因感受到越南的軍事侵略而相當緊張。在這樣的環境下，泰國同意讓中國將軍事武器經由境內運往柬埔寨，協助柬埔寨抵抗越南，促成泰、中軍事的初次合作。¹⁵

¹³ 當時中國與各國建交的原則和唯一條件是，該國必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且須與台灣斷絕外交關係，並承認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領土的一部分。因此，當泰、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也就必須選擇與台灣的中華民國斷交。

¹⁴ 以下的「中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

¹⁵ Chainam, Surapong (2008) "Special Report Thai-China relations." Website: <http://www.nidambe11.net/ekonomiz/2005q3/article2005july08p11.htm>. (2008/11/20) (本文為泰國網頁)

泰國政府體認到，中國不僅可以牽制越南（Gilks 1992: 145）；如果兩國友好將會使中國減少對泰國共產黨的支援，削減泰國共產黨的勢力（Chinwanno 2005: 42）。這個策略後來奏效，1979 年中國開始減少對泰國共產黨的援助，使得泰共勢力慢慢消退瓦解（Chinwanno 2005: 41-43; Skinner 1958: 3）。而在越南入侵柬埔寨後，泰國與中國在安全領域有共同利益，成為推動兩國發展密切合作關係的決定性因素。

越南撤退柬埔寨後，泰國政府認知到雖然泰國與美國有正式的邦交，但在遭遇邊界衝突時，美國並沒有辦法提供實質上的幫助，反而是鄰近的中國可以提供軍事上的許多協助。而對中國來說，泰國是一個很重要的軍事緩衝地區，也未與中國發生過太大的衝突，是唯一在東協地區容易與中國進行溝通的非共黨國家，也是在冷戰後期東協與中國進行溝通協調的重要橋梁。對此，鄧小平在 1989 年 10 月會見訪問中國的泰國總理時指出：「泰、中關係是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友好合作的典範」。¹⁶

1980 年代末期，隨著冷戰的終結，美、蘇逐步撤出印支半島，冷戰時代美、蘇在印支半島所構築的扈從關係（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及同盟關係也隨之鬆動，霸權地位相對式微。從 1980 年代末期，柬埔寨問題得到解決，印支半島的局勢也就進入穩定的和平時期。¹⁷

（二）後冷戰時期的泰中關係（1990 至今）：由政治到經濟合作

1. 國際政經結構變遷與泰、中實質關係的轉變：利益建構

隨著蘇聯解體，國際社會結束了政治對立，加上 WTO 的談判遲緩，區域性經濟整合乃成為 1990 年代世界政經發展的趨勢。而隨著冷戰結束，

¹⁶ 1980 年代末，中南半島上的社會主義國家無法再依賴蘇聯提供經濟援助，不得不積極地謀求與中國關係正常化，並追隨中國模式的改革開放策略，致力提升其出口與引進外國直接投資。

¹⁷ 中南半島的局勢在聯合國介入簽署「柬埔寨和平協定」（Paris Peace Accord）更趨緩和。

東南亞區域的經濟和政治變得更加穩定，泰國企圖在區域關係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泰國總理 Chatichai Choonhavan 提出「察猜主義」(Chatichai Doctrine) 的經貿外交政策，以及將「變戰場為市場」(turning the Indochina battlefield into a trading market) 的「印支倡議」(Indochina Initiative)，期將印支半島建立為「泰銖經濟圈」(Baht Economic Zone)。

同時，1985 年「廣場協議」(Plaza Accord) 迫使日元升值，¹⁸日本企業必須遷往成本較低的海外地區設廠，泰國乃成為日本產業海外投資的首選。¹⁹趁此機會，針對跨國企業，泰國提供更豐厚的稅率優惠，創造更有利於跨國公司的投資環境。這些產業開放措施，使得以日資為主的外國資金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大量流入。由於外國直接投資增加，1985 年後到 1990 年代之泰國經濟成長率平均維持在 9%，使泰國外交重心由安全轉向為經濟。²⁰

對中國而言，1989 年的六四事件，西方國家紛紛對中國實施經濟制裁，北京與西方關係嚴重倒退，所以 1990 年代後，中國外交首要任務是突破天安門事件以來的孤立。此時，中華民國李登輝總統掌握後冷戰時期國際政經情勢的變化，爭取在中國未從六四事件恢復之際，發展台灣的對外關係，並放棄「漢賊不兩立」與推動「南向政策」，企圖藉由台灣的經濟力量推動對東南亞國家的實質外交。這兩項因素，讓中國理解到經營周邊國家外交關係的重要性，並於 1991 年中國十三次黨代表大會提出經營周邊外交方針的睦鄰政策 (高朗 2004：19)。在睦鄰政策下，中國首先於 1990 年 8 月與印尼恢復全面外交關係；其後，中國與新加坡在 1990 年 10 月雙方建交。除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外，在 1990 年期間，中國領導人展開一系列的東南亞訪問，例如：李鵬總理就先後在當年 8 月訪問印尼、新加

¹⁸ 1985 年 9 月 22 日，在美國紐約廣場飯店，美、日、英、法、西德等五個工業發達國家財長和央行總裁祕密會晤並簽署著名的《廣場協定》，聯合干預外匯市場，使美元對日元、馬克等主要貨幣貶值，以解決美國鉅額貿易赤字，從而導致日元大幅升值。

¹⁹ 泰國對於日資特別歡迎，主因是日本的外來投資多屬於勞力密集工業的投資，可以製造更多的就業機會，而且主要市場在國外，可藉由再出口 (re-export)，減少國內市場受到日本投資衝擊的可能性。

²⁰ 參見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2010)，〈各國總體經濟數據指標〉。網址：<http://twbusiness.nat.gov.tw/page.do?id=15>。(2009/02/01)

坡及泰國，並在當年 12 月訪問馬來西亞及菲律賓。同樣地，在 1990 年間，有三個東協國家的領袖訪問中國，包括印尼的蘇哈托、新加坡李光耀及泰國 Chatichai。此外，中國並在 1989 年與寮國關係正常化，在 1991 年 10 月與越南關係正常化（Ku 2006: 115）。

在與中國發展睦鄰政策的所有國家中，泰國是最大受益者。特別是 1997 年泰國爆發金融危機時，中國透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泰國 10 億美元的貸款，並承諾不會將人民幣貶值。這些承諾也使泰國對中國當時貿易金額增長 14.7%，幫助泰國度過危機。至今，中國成為泰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泰國是中國東南亞的第三大貿易夥伴，占東南亞地區貿易總額的 16%。²¹可見，這樣的經濟連結對於發展兩國外交關係具有重要意義。

2. 大湄公河流域開發計畫（The Great Mekong Sub region, GMS）與泰、中合作

除與中國保持良好的經貿互動外，對於與鄰近國家推動「次區域經濟合作」也是 1990 年代泰國對外關係的重要發展目標，其中更牽涉到與中國的關係。1993 年，總理 Chuan Leekpai 提出涵蓋泰北、緬東、寮西、中國雲南等湄公河流域的「黃金四角」（Golden Growth Quadrangle Economic Cooperation, GQ）開發計畫，希望藉此取得印支半島區域經濟發展的主導權。²²在「黃金四角」的架構下，與中國聯手擴展成「大湄公河次區域計畫」，囊括湄公河流域的六個國家（中國、泰國、緬甸、寮國、越南、柬埔寨）。而此項計畫是基於發展跨邊境貿易活動、旅遊業與運輸業網絡的

²¹ 泰中在 1986 年的總貿易額達到 4.0484 億美元，1987 年達到 6.5551 億美元，1989 年達到了 9.4496 億美元，1994 年總貿易額達到了 16.6379 億美元。雖然在 1997 年泰國與亞洲面臨了金融危機，貿易往來仍然成長，當年兩國的總貿易額也有 35.7036 億美元，2000 年的泰、中貿易額達到 71.1365 億美元。2003 年泰中的總貿易額更突破百億美元，到達 139.1825 億美元，使得 2003 年泰國成為中國第 18 大的貿易夥伴，2005 年雙邊貿易總額 218.1 億美元，2006 年雙邊貿易總額 253.3 億美元，2007 年雙邊貿易總額 346 億美元，2008 年雙邊貿易總額 362.4 億美元。目前泰國的對外貿易的排名為：日本、中國、美國、馬來西亞。參見“Trade Sumery of Thailand,” Website: http://www2.ops3.moc.go.th/trade/country_trade。(2009/05/09)（本網頁為泰國網頁）

²² 大湄公河流域開發計畫從 1950 年代就已經開始，但因二次大戰結束後，中南半島長期處於政治混亂，幾乎每一個國家都有內戰或游擊活動，冷戰結束後，1992 年在亞洲開發銀行主導下，才真正進入開發的階段。

合作，擴大與周邊國家的經濟關係。泰國之所以積極地將泰北推動成爲經濟和旅遊中心，主要目的是以「黃金四角」的開發計畫抹去過去惡名昭彰「金三角」(Golden Triangle)稱號。²³

由此可見，1990年代開始之泰國的對外關係是以貿易及投資，強化周邊各國的經貿(李文志、蕭文軒 2006: 225-265)。泰國視中國爲經濟腹地，中國則以泰國作爲其建設東南方內陸省份的市場延伸，兩者之間具有經濟的互賴關係。兩國藉大湄公河流域開發計畫以保持經濟連結，開發計畫不僅加強夥伴關係，並讓區域國家密切增加合作的管道(Chinwanno 2001: 235-272)。

對中國而言，「湄公河次區域」是「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重要部分。在1990年代初期，中國與泰國就開始在此區域合作建設道路、鐵路及運河網絡，以連結兩國與緬甸及寮國的交通運輸；湄公河流經的中國雲南和柬埔寨、寮國、越南、泰國、緬甸的地域範圍，包括2.5億人口和233.19萬平方公里的面積，是中國和東南亞國家連結的紐帶。2001年6月26日，從中國的瀾滄江(湄公河上游)到泰國的國際航道取代公路運輸，低廉的水路運輸成本使兩國的貿易金額更爲攀升。²⁴

對泰國而言，推動「大湄公河次區域計畫」是一種兼具國內經濟與提升區域外交的「多軌策略」(李文志、蕭文軒 2006: 235-240)。首先，是刺激國內經濟，一方面可以透過能源領域的合作，取得寮國與中國的電力供應，以有效解決電力不足的困境，並透過「經濟走廊」(the Economic Corridor, NSEC)，開發東北部及北部等偏遠地區，消除境內區域發展不均。

其次，2000年後泰國經濟對東協及其他區域與次區域市場的依賴則增

²³ 「黃金四角」的範圍涵蓋中國雲南、寮國的北方七省、緬甸的景棟及大其力地區、泰國的清邁及清萊兩府。除經濟議題外，泰、中的合作關係尚包括其中對於毒品製售、貨物走私、人口販賣、海盜襲擊等跨國犯罪的治理。

²⁴ 泰國對中貿易金額從2001年的10%增加到2002年的15%，在2003年成長到30%。除水路外，根據「南寧新加坡經濟走廊」合作內容，中國試圖建造南寧、河內、金邊、曼谷、吉隆坡及新加坡的鐵路和高速公路，其中，南寧至新加坡的高速公路全長約3,000公里，南寧至新加坡的鐵路全長約4,900公里，鐵路連通與中國鐵路網相連，這兩條鐵公路成爲中國南方的交通大命脈。

加，尤其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市場無疑是泰國所欲追尋的利益所在，泰國可循此管道進入。

第三，泰國政府聯合中國對各國提供貸款援助，也提供訓練課程。當泰國及其鄰國的經濟差距日漸縮小，而有利於泰國開拓其鄰國市場；同時，周邊國家在經濟上依賴泰國，則可進而提升泰國在湄公河流域的主導力（Chulasiriwongs 2001: 337-356）。

3.東協區域整合與泰、中自由貿易協定

1997年發生的金融風暴雖然使東協國家受到打擊，但是，東協各國堅持貿易自由化與區域經濟整合的目標並未因此停止。東協國家體認到區域經濟整合的重要性，更加快合作的意願和腳步，積極調降關稅，加快自由貿易的步伐，這是受到國際貿易區域化的反應。²⁵1998年的河內高峰會決議在2002年建立東協自由貿易區，並使泰國、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及菲律賓的工業品關稅降至5%以下。

當中國經濟起飛，東協開始與中國建立對話機制，1996年開始，中國成爲「東協部長會議」（ASEAN Ministerial Meeting, AMM）的對話夥伴。1997年東協吉隆坡高峰會後，東協領袖開始固定與中國、日本、韓國三國的領袖進行「東協加三」高峰會（ASEAN plus Three, APT）。²⁶

傳統上，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是處於「中國威脅論」（China Threat）的安全與軍事陰影。²⁷自2001年底中國進入WTO後，經濟崛起，中國縝密地在東南亞規劃經貿網絡，並藉由「曼谷協定」，逐步推動與東南亞及南亞國家的緊密經濟夥伴關係，²⁸使「中國威脅」扭轉成「中國機會」（China

²⁵ 爲減少金融危機的影響，泰國、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緬甸及汶萊等六個東協國家於1998年10月在馬尼拉舉行的東協經濟部長會議中，曾同意使用區域內貨幣進行貿易，以減少對美元的依賴，累積外匯，擴大各成員國的貿易，期促進經濟發展。

²⁶ 日本原本對FTA並不特別積極，可是當2001年11月中國總理朱鎔基訪問東協，達成協議將在10年內達成自由貿易協定後，日本也開始積極地努力希望與他國推行FTA，並期待以此爲基礎，進一步建立東亞共同體。

²⁷ 以南海議題爲例，中國與菲律賓分別在1995年與1998年有過爭議，1997、2004年也與越南產生衝突。

²⁸ 「曼谷協定」是在聯合國亞太經社理事會的主持，經GATT依據「授權條款」核定，提供優

Opportunity) (Stubbs 2004: 9)。

2001年11月「東協加三」會議中，中國向東協國家提出願意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的緣由。為展現誠意，中國主動提供熱帶農產品進口免關稅的「提早收穫計畫」(Early Harvest Program)。這項誘因使東協在2002年11月與中國簽訂「東協中國自由貿易協定」(ASEAN China Free Trade Agreement, ACFTA)。

2004年11月29日，東協與中國在寮國首都永珍進一步簽署「中國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貨物貿易協議」，正式推動成立東協十加一自由貿易區。為達到2010年自由貿易區零關稅的目標，雙方決定自2005年開始，針對部分貨品開始免稅，逐漸擴大到2010年全面免稅的目標。

表面上，東協國家對於此行動表示支持，但是實際上，則有不同的聲音。例如：馬來西亞就十分憂心自由貿易區成立之後，廉價產品大量進入東南亞，會使本土廠商無法生存(趙文衡 2002: 107)。泰國政府認為，自由貿易區將提供廠商進入中國市場的機會(李小軍 2007: 41-45)，並在2003年10月1日與中國簽署《泰、中自由貿易協定》。根據該協定的「提早收穫計畫」，使泰國的蔬果產品銷往中國零關稅(趙文衡 2002: 103)。而零關稅使得兩國邊境貿易金額快速增長。

由上述雙邊關係的發展可見，當泰國對外關係由軍事安全轉向經貿，泰國與中國的合作互賴關係更為擴大。對泰國而言，中國強大的經濟實力競爭是不可避免的，與其對抗中國，不如與其合作分享經濟利得。整體而言，泰國的態度是維持經濟的互賴關係，這是保障區域穩定最有效、成本最低的途徑(Chung 2004: 35-36)。

惠關稅減讓，擴大成員國相互間貿易，在發展中國家之間達成的優惠貿易安排，宗旨是透過相互降低部分產品的關稅，實現共同發展和繁榮。現有成員國為印度、韓國、孟加拉、斯里蘭卡、寮國、中國等六國，中國於2001年5月正式加入。

五、「規範」、「身分」、「文化」架構下的泰中關係

前述回顧泰、中外交發展可以發現，泰、中關係與前述提及建構主義學者 Wendt 所舉例的德國與丹麥的雙邊關係有類似情況。自古至今，泰國與中國的權力差距並無多大的差異，泰國於 1911 年、1949 年、1975 年，乃至 1990 年代後期，由於不同時期「規範」與「身分」因素建構不同的國家利益，泰國對中國有不同的理解：1911 年之前，泰國視中國為朋友；1911 到 1946 年，兩國（泰國與中華民國）不相往來；1949 年，泰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屬於敵對關係；兩國於 1975 年建立正式外交，1990 年後雙邊的友好關係則邁向高峰。

從這樣的曲折發展歷程可以看出，僅以權力和利益的計算很難解釋兩國之間的關係。除「國際規範」外，建構主義的「國內規範」、國家「身分」與「文化」三個因素提供泰、中雙邊關係發展的合理解釋。

（一）泰中關係的「規範」因素

1. 「國際規範」與泰國外交政策

根據前文的分析，泰國的外交政策自二次大戰後，不論歷經爭取加入聯合國、與美國結盟時期、共產國家和解、發展周邊國家經濟合作等數個階段外交政策的變化，與當時國際規範的變遷有關，國際規範變化直接影響到泰國對中國的關係。

二次大戰結束前後，國際關係結構是依賴著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世界結構分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派。泰國視共產黨為安全的威脅，同時美國深恐共黨勢力會在東亞發生骨牌效應，而積極拉攏東亞區域的反共國家，泰國成為當時美國在東南亞的重要盟邦。在必須選邊站的情況下，與蘇聯結盟的中國對與美國結盟的泰國，兩者屬於敵對陣營，也未建立正式外交接觸的管道。

1970 年代初期開始，伴隨著國際規範的變化，美、中不再對立，泰國的外交戰略不再以美國為中心，轉為強調獨立自主。當世界形勢出現美、中（中華人民共和國）、蘇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為適應形勢的變化，泰國調整自己的對外戰略；從中美關係緩和、中國重返聯合國、中蘇對抗和美國從越南撤軍，都成為泰國調整外交關係的國際規範因素。

隨著冷戰東西對立緩和，從 1980 年代開始，泰國提出全方位外交口號，進一步採取多邊主義的外交關係。1988 年，總理 Chatchai 提出將印支地區「從戰場變商場」的口號，泰國外交政策轉為「經濟外交」發揮區域的紐帶角色，這也是國際規範變遷下的選擇。

1990 年代後，國際規範進一步變遷，跨越國家界線的區域性經濟合作，更是各國展現影響力的重要途徑。在多管道的區域與次區域經濟合作的理念下，泰國主張擴大東協，吸收越南、寮國、柬埔寨等國家加入，並對緬甸「建設性接觸」，邀請中國加入「大湄公河次區域計畫」。泰國政府認為，當經濟發展、外部威脅消除，泰國應以國家利益在更廣闊的視野內調整與周邊國家的外交政策，作為東南亞與國際社會之間的橋梁。因此，泰國持續扮演東協與中國的溝通管道（趙光勇 2006：15）。

二十世紀初，隨著泰國經濟的發展和國力的增強，泰國外交的自主性愈來愈高，在東亞合作進程中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2001 年，Takins 總理隨著經濟復甦，提出「進取性外交」的政策（Forward Engagement Foreign policy）（趙光勇 2006：14）。這項外交政策一方面是要為泰國的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另一方面是希望藉由參與區域合作機制，提高泰國在區域與國際舞台的地位。對中國而言，泰國「具有地緣位置戰略性利用價值」，可以牽制美、日和印度等國，中國也樂於與泰國結成政經和軍事安全的合作夥伴。

2. 「國內規範」：泰國華人在泰中關係的政治作用

除「國際規範」外，建構主義認為一國的外交政策亦受國家內在結構之影響。內在結構就是國內政治經濟體制，也會影響到一國的外交政策；

泰國對中政策的國內規範是指泰國國內華人對於泰國政局的作用，左右泰國對中國的政策。²⁹

二次大戰前，泰國之所以不願意與中國建交，就是因為擔心泰國受中國國民黨推翻帝制的主張，影響到國內政治的穩定。在 1949 年後，泰國華人一分為兩派，而且因為中國民族主義，兩派的華人在泰國境內公開升起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相互較勁，對泰國政府產生極大困擾（Skinner 1958: 340）。不過，當時泰國承認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給予支持台灣華人較多的寬容，也默許國民黨軍隊在泰北的游擊活動，這些作法也連帶使得左派的華人發動示威活動，要求泰國政府採取與北京建交的外交策略。

對泰國政府而言，統治菁英擔憂共產主義思潮可能對泰國產生衝擊，並影響泰國華人的國家認同。泰國擔心中國會利用泰國華人透過文化、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手段進行國內滲透，在這種背景下，泰國軍人政府提出「排華反共」的政策主張，勒令關閉將近 300 所左右的華人學校（Lilalai 2001: 218）。有些學者認為，1950 年代的泰國軍人政權將泰國共產黨貼上等同於華人族群運動的標籤，政府透過激化族群、激化矛盾，轉移國內政治危機，以此鞏固當時的軍人統治；泰國當時的外交政策變成是鞏固國內軍人威權政體的附屬手段（Samudavanija 1997: 48-49）。

1970 年代，泰國國內民主化運動使得軍人在政府中影響力減弱，民選產生的文官政府就會以「務實主義」的態度處理對外政策。在國內親中華人的壓力下，文官政府務實考量中國在世界局勢的角色，開始利用政壇華人與中國接觸。例如：在建交前，泰國就派遣曾經留學暨南大學、當時經濟部副部長 Prasit Kanchanawat 與中國進行接觸。後來，Kanchanawat 擔任泰國國會議長、副總理，被稱為「泰國的基辛格」和「打開中國門戶的先

²⁹ 有學者認為，泰國華人應是屬於「身分」影響對中政策。然而，本文作者認為，根據建構主義學派的觀點：身分指國家由外在（國家置身於國際政治環境）與內在（國內政治經濟體制或政權類型（regime types）結構建構而成的行動者。而泰國華人在泰國政局扮演的角色，本文則認為較為接近建構主義的「規範」因素：國家會把國內社會所享有的規範加以外化，並轉化成外交政策。

鋒」。

1990 年代，中國經濟起飛，泰國華人因本身的商業網絡，與中國的經濟往來更為密切。此際，民間的經濟連結與中國市場的提供機會，也促使泰國政府在經濟上更向中國靠攏。³⁰在泰國，由於新一代的華人已經融入泰國的社會並改採泰國姓氏，華人從政的比例相當高，在外交政策上，華裔閣員不僅是中國拉攏的目標，內閣華裔閣員也因為華人的身分與商業利益，維持與中國保持密切的往來關係。³¹

（二）泰、中外交的「身分」：調適與緩衝，由敵人到朋友

建構主義認為，國家是具有各種樣式「身分」的行動者，是國家對於所處國際規範下的自我定位。泰國的國家自我定位包括泰國在國際權力結構中屬於是屬於緩衝國的身分，而這樣的自我定位，影響到泰國的外交政策與對中國的關係。

泰國的歷史可追溯到 1238 年的「素可泰王國」(Sukothai)。由於建國初期，國家性質屬於領主式封建關係，因此泰國的對外關係就建立在保護國 (protectorate) 或依附國家 (dependent states) 的策略之上。³²這樣的思考延續到十九世紀，泰國拉瑪五世 Chulalongkorn 國王就認為：

泰國是小國，不能與列強進行戰爭，必須八面玲瓏與人無爭，不能過分親近某一強國，亦不可過分疏遠某一強國。唯有落實「緩衝國」(buffer state) 或「緩衝社群政策」(buffer communities

³⁰ 根據學者的研究，泰國華人有主導泰國某些行業的現象，而泰國華人會利用這樣的行業網路延伸回到中國；商業利益是泰國華人亟欲與中國發展良好關係的原因。參見鄭宏泰、黃紹倫 (2009)〈香港潮籍米商與泰米供應網路初探〉。「東南亞台商與港商比較」國際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亞太研究中心。

³¹ 以 2009 年的內閣為例，有六成以上是華裔。參見劉振廷 (2009)〈泰新內閣來自五湖四海〉。《亞洲週刊》23 (1)：4。

³² 素可泰王朝的 Ramkhamhaeng 國王，1278 年登基後被視為素可泰的黃金時代。泰人深信泰文是由他所創，泰國國家民族主義的肇端。當時 Ramkhamhaeng 亦與蘭那王朝 (Lana，今日清邁) 的曼格萊王 (King Mengrai)、帕堯王朝 (Phayao) (今日帕堯府) 的南蒙王 (King Ngam Muang) 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維持近百年和平。這樣的對外關係的歷史，也影響到後世的泰國對外政策。

policy)，才能避免與主要敵人的直接對抗。(轉引自趙光勇 2006：13)

在這個外交理念下，歐洲列強殖民時期，Chulalongkorn 國王除派遣子女前往歐洲國家留學，透過王室外交拉攏與西方國家關係外，功並利用「緩衝國」的概念，讓出泰國東部（今日柬埔寨、寮國的部分）與南部省份（今日馬來西亞），保持國家身分維持形式上的獨立。³³

由於自我定位為「緩衝國」的角色，泰國充分利用處在中國和印度、歐洲連接點上的位置優勢，以貿易富國。舉例而言，在大城王朝(Ayutthaya)時期，泰國的對外關係就是以地緣優勢進行貿易，一方面向中國出口大米來增強國力，另一方面則與日本、琉球等東亞國家、東南亞、阿拉伯、波斯及西洋國家等進行貿易。這顯示泰國傳統上就有與西方國家接觸的經驗，且透過貿易與其互動，與各國保持良好的經濟連結。³⁴

在一次大戰時，泰國刻意與「協約國」(Entente Powers) 聯盟，獲得戰勝國待遇；二次大戰初期，泰國政府加入「軸心國」陣營，在戰爭結束前，泰國卻轉向變成「同盟國」，躲避戰敗的命運。這些現象，就是這種調適外交身分的運作。

調適的外交身分，充分顯現在泰國對中國外交政策的調整上。二次大戰結束後，泰國必須選擇與美國同盟，與中國共產黨對抗。雖然在 1950、1960 年代，一度想要擺脫選邊站的策略，與中國發展雙邊關係，但當時因為仰賴美國軍事與經濟的外援以及國家安全因素，泰國被迫要在兩大陣營中做出選擇。1970 年代，美國政策的改變，泰國恢復過去的彈性外交政策，與中國發展正式關係，但也未與美、台交惡。

1990 年代後，中國影響力向東南亞延伸，泰國對中國調適性的外交政

³³ 十九世紀末，英、法兩國已經分別在泰國東、西兩邊建立英屬印度和法屬印度支那殖民地。1896 年英法簽訂「關於暹羅等地的宣言」，將泰國列為兩個殖民地之間的「緩衝國」，成為唯一沒有被殖民的東南亞國家。

³⁴ 在 Chulalongkor 時期，泰國國王藉由元首外交，利用國王出訪機會與周邊國家建立良好關係。至今，新加坡為當時 Chulalongkor 訪問新加坡所捐贈之禮物成立亞洲文物博物館。

策 (policy of accommodation) 的態勢更為明顯，不挑戰中國國家利益 (李小軍 2007: 42)。泰國一方面因勢利導迎合中國，避免不必要的衝突，另一方面則避免過於依賴，維持美、日與周邊國家的「平衡外交」與中立性。例如：南中國海 (South China Sea) 的領土爭端，泰國雖然不是南海爭端的當事者，但也避免同情或批評任何一方³⁵。

在台灣與西藏議題上，泰國曾經邀請中華民國李登輝總統與達賴喇嘛兩次訪問泰國，不僅接受在中國受爭議的法輪功領導人李宏治入境，也讓李宏治的母親長年居住泰國。除中國與兩岸事務外，泰國也積極推展與印度的自由貿易協定，拓展與南亞國家的經貿關係³⁶。這些事件也可以看出泰國在外交政策上，還是保有自主與彈性。³⁷

簡單來說，因為「緩衝國」的身分，學者認為在冷戰時期，泰國屬於亞洲的「心臟地帶邊緣」(Mackinder's Inner)，不僅是歐洲與亞洲緩衝，也是社會主義 (蘇聯、中國) 與資本主義 (美、歐) 的緩衝國；其後，因為地理位置與中國的崛起，泰國樂於扮演中國與東協國家的中介橋梁，繼續在東南亞區域中發揮調適的功能 (Spykman 1994: 140-145)。

(三) 影響泰、中關係的「文化」因素

建構主義認為，文化結構建構是塑造「國家地位」或「國家身分」的來源。文化不同，利益自然不同，對國家利益的定義不同，因而也就決定

³⁵ 舉例而言，1995 年中國和菲律賓發生美濟礁爭端後，泰國主動去調停中菲之間的爭端。1996 年中國宣布對西沙群島擁有主權後，東協立即要求中國進行澄清，泰國保持沉默，並未表示立場。參見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pril 17, 1997, p. 1201.

³⁶ 泰國為拓展區域貿易，1997 年 6 月與南亞的孟加拉、印度及斯里蘭卡三國成立「孟加拉、印度、斯里蘭卡、泰國經濟合作會議」(Bangladesh, India, Sri Lanka, Thail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BIST-EC)。1997 年 12 月加入緬甸，改稱為「孟加拉、印度、緬甸、斯里蘭卡、泰國經濟合作組織」(Bangladesh, India, Myanmar, Sri Lanka, Thail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BIMST-EC)。之後，BIMST-EC 在 2003 年加入尼泊爾與不丹。2004 年 7 月在曼谷舉行的第一次高峰會，各成員國決定將 BIMST-EC 改稱為「孟加拉灣技術與經濟合作倡議」(Bay of Bengal Initiative for Multi-Sectoral Technical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BIMSTEC)，參見 Website: <http://www.bimstec.org/>。(2009/12/01)

³⁷ 《亞洲週刊》曾經評論：泰國政府始終對對海峽兩岸推行左右逢源的外交策略，承認北京是聯合國公認的「唯一中國」代表權，但也與中華民國保持交流來往。參見《亞洲週刊》23 (1): 4。

外交政策的差異。

相對於其他因素，文化需要較長時間的累積，但是，如果兩國逐漸形成文化認同，將會對雙邊關係的良性發展形成有效的保障，即使因政治或經濟而出現衝突，也能較快回復。相反地，如果雙邊關係缺乏文化認同，即使是雙邊關係曾在特定政治、安全或經濟需求的驅動下取得發展，終究也會因為特定文化因素的消失，面臨雙邊關係衰退，甚至破裂的困境（王鳴鳴 2008）。

從源流來看，泰國文化是借鑑印度文化和中國文化的基礎所形成的文化，加上貿易中心的地位，相較於其他東南亞國家，泰國文化具有較高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對於中國文化的接受也較為融合。泰國自大城王朝即是當時東南亞貿易中心，過去在經濟上即採取國王壟斷商業活動的局面，國王壟斷進口產品及出口商品，由華人代為經營其與各地的貿易；國內經濟活動亦由華人協助國王經營（吳龍雲 2001）。當時，外國人被禁止居住在大城王國的城內，但中國商人例外，不受此限制。由此可知，自古中國在泰國的經濟活動中，有獨特的地位與文化的連結（Rachanuphabh 2005: 5）。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興起，學習中文已經成為泰國民間社會的重要潮流。中國並透過「對外漢語辦公室」，補助教師前往泰國教學，並以經費支持在泰國各大學開設「孔子學院」，推廣中文教育。目前泰國共有 13 所大學設有孔子學院，是全東南亞最多孔子學院的國家。³⁸

除泰國華人與民間社會外，泰國王室扮演推動中國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這樣的角色也間接影響到泰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尤其是 Maha Chakri Sirindhorn 公主所起的示範作用。1981 年 5 月起，Sirindhorn 公主先後 20 多次訪問中國，而且研習中文，並親自翻譯和撰寫大量介紹中國文化的泰文書籍，被視為是泰國中文熱的靈魂人物。由於泰國王室具有崇高的威望和感召力，Sirindhorn 公主對於中國文化的嚮往，在民間社會取得共鳴，

³⁸ 參見〈中國對外漢語辦公室〉。網址：<http://www.hanban.edu.cn/kzxy.php>。（2009/08/25）

被視為是泰國民間社會普遍對中國友善的主因。³⁹

除了文化學習之外，民間的相互往來亦是衡量雙邊外交關係的重要指標，也就是學者所提出兩國交流除官方正式管道的「接觸區」(the contact zone)及民間交流「隱性的接觸區」(invisible contact zone)的概念(Liu 2006: 39-56)。自 1990 年代初期，中國到泰國的旅遊人口逐漸增加，泰國已經成為中國遊客到國外旅遊的重要國家。2010 年 1 月至 3 月的統計資料，中國已經超越日本，成為泰國外來旅客人數第二多的國家。⁴⁰

不僅如此，研究文化與外交關係學者 Joshua Kurlantzick 認為，在東協國家，影響國外社會公眾輿論和獲取同情的「軟實力」(soft power)，中國已經追上美國(Kurlantzick 2006)。例如：根據 2003 年的一項民意測驗，76%的泰國人表示中國是泰國最親密的朋友，只有 9%認為是美國。這些數字意味著文化連結，已經讓泰國與中國關係明顯的質變(Kurlantzick 2007)。自從中國的崛起與泰中關係的改善，中國文明的光榮在東南亞的華人移民中形成一種新的自豪感和認同；相對於其他西方國家，這種軟實力的路徑為泰中外交提供了一種明確的比較優勢。⁴¹

六、結語

整個外交脈絡分析，泰國將維護國家安全和獨立放在外交政策的首位，長期以來運用靈活、實用的外交政策，維護國家的獨立和利益。隨著國際形勢和周邊環境的變化，結合自身社會經濟發展需要，泰國的外交政策歷經數次調整：冷戰時期，中國從安全威脅者變成保障者；冷戰後，中

³⁹ 泰國國王蒲美蓬曾經於 1963 年訪問台灣，成為泰國歷史上第一位訪問中華民國（包括中國與台灣）的泰國國王，但至今蒲美蓬並未訪問過中國。根據本文作者於泰國當地的訪談，泰國學者認為泰王個人對於「共產主義」還是有相當的反感，而不願出訪。

⁴⁰ 排名第一為與泰國陸地鄰近的馬來西亞，參見泰國旅遊局的統計數據，Website: http://203.144.250.243/statistics/otd_ta_nationality_detail.php。(2010/04/01)

⁴¹ 不僅是旅遊，根據作者於泰國的訪談經驗，中文的流行文化（如飛輪海、周杰倫、F4）等的輸入，也是讓泰國年輕人樂於接觸中文學習的主因。只不過，上述的流行文化創造者都來自中華民國。

國成爲東南亞地區主導地位的戰略力量，泰國採取調適外交政策，不主動挑戰中國，但也不與美國及在台灣中華民國交惡。整體而言，在現有的國際政經發展架構上，泰、中「由敵人到朋友」這樣的關係並不易改變。

根據建構主義的內涵，外交政策是國家（行動者）的選擇結果。本文發現：近 30 年來，泰國對中國的政策不僅受到國際空間與結構的影響，也受到「緩衝國的外交身分」與保持良好歷史傳統的內在文化的影響。這也印證：一國外交政策不僅受國際政經環境所制約，也是透過社會實踐互動的結果；泰國的對中政策不僅靠物質力量，更有社會力量做支撐。而此亦印證：「泰國對中政策並非完全的理性利益考量，而是「在社會共有的觀念下定義國際政治結構」所產生的結果。

簡單而言，以建構主義爲研究途徑分析泰、中兩國關係的發展，可以歸納爲下列六項的論點：

（一）建構主義主張，國家外交決策必須遵守「適當性邏輯」的規範，並以此決定國家利益。在區域政治上，對泰國而言，可借助中國提升其在東協的地位，對中國而言，泰國樂於作爲解決中國與東協爭端調節者，二者相互都具有「適當性邏輯」的共同政治利益。

（二）根據現今東南亞區域的國際結構，對泰國而言，中國經濟崛起對泰國也有著積極連動的作用，對中國而言，泰國是進入東協市場的跳板。兩國有經濟上的互賴關係，具有共同的經濟利益。

（三）建構主義主張，國家是具有各種樣式「身分」的行動者，國家對於該國所處的國內外結構的自我認知，會影響到該國的對外關係。除國家政治與經濟利益考量外，建構主義認爲，國家是具有各種樣式「身分」的行動者，身分結構決定一國的外交政策。泰國的外交政策就是調適型的：泰國不主動挑戰中國國家利益，但是也不放棄與美國的軍事結盟，以及與台灣（中華民國）的民間關係。

（四）建構主義主張，文化是國家身分的重要來源。文化不同，產生

的國家利益自然不同，行動者的身分與利益所建構的外交政策，也會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有所差異。二十世紀初到冷戰中期，泰國因為國內內政（滿清革命）與安全因素，和中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保持距離、甚至是敵對，但隨著國際局勢的改變，二者又恢復成傳統的友好關係。

（五）建構主義主張，國際政治的結構不僅是物質結構、權力關係，更重要的是社會性的建構與文化決定國家身分，也決定外交政策。歷史文化上，泰國與中國具有歷史文化與政治理念連結的共識，導致中國在泰國的外交政策上有特殊的地位，這樣的關係至今依舊維繫。

（六）建構主義分析一國外交政策制定過程，主張：「國家會把國際規範內化，尋求國內共識；國家也會將該國的社會規範外部社會化，成為該國的外交政策」。根據上述的研究，本文認為近一世紀的泰中關係，正是以建構主義觀點分析一國外交政策的重要例證。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 Chinnawanno, Chunchip (2005)《三十年泰中建交良友間合作情誼》。曼谷：法政大學。
- 王鳴鳴(2008)《外交政策分析：理論與方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朱振明(1999)〈巴實干乍那越與泰、中關係〉。《東南亞政治論壇》2：47-55。
- 吳龍雲(2001)〈14-19世紀暹羅華人的經貿發展研究〉。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 李小軍(2007)〈論戰後泰國對華政策的演變〉。《東南亞研究》4：41-45。
- 李文志、蕭文軒(2006)〈泰國推展次區域經濟合作戰略之政經分析〉。《逢甲人文社會學報》12：225-265。
- 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t)(2000)《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秦亞青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袁正青(2004)〈建構主義與外交政策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9)：4-5。
- 袁易(1996)〈多邊主義安全困境下之合作：國際關係理論與美中關係〉。《問題與研究》35(6)：1-17。
- 袁易(2001)〈對於 Alexander Wendt 有關國家身份與利益分析之批判：以國際防擴散建制為例〉。《美歐季刊》15(12)：265-291。
- 高朗(2004)〈後冷戰時期中國外交政策之變與不變〉。《政治科學論叢》21：19-48。
- 許敦茂(1990)〈1975年前的泰中友好關係〉。《泰國星暹日報》1990年8月25日。
- 陳峰君(2005)〈泰、中關係高水準發展的契合點及其戰略意義〉。自全球化時代的泰、中關係學術研討會。北京：北京大學英杰交流中心。
- 黃瑞真(2008)〈20世紀50年代中期泰中關係從緊張走向緩和的原因〉。《東南亞研究》6：6-12。
- 趙文衡(2002)〈東協與中國成立自由貿易區初探〉。《台灣經濟研究月刊》25(2)：103-108。

- 趙光勇 (2006)〈泰國外交政策的演變〉。《紅河學院學報》4 (3) : 9-15。
- 劉振廷 (2009)〈泰新內閣來自五湖四海〉。《亞洲週刊》23 (1) : 4。
- 鄭宏泰、黃紹倫 (2009)〈香港潮籍米商與泰米供應網路初探〉。東南亞台商與港商比較」國際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亞太研究中心。
- 鄭端耀 (2001)〈國際關係「社會建構主義理論」評析〉。《美歐季刊》15 (12) : 199-229。
- 盧業中 (2004)〈東協區域合作：國際關係理論的再檢視〉。《亞太經濟合作評論》12 : 87-100。

西文部分：

- Acharya, Amitav (2000) *The Quest for Ident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Southeast Asia*. London: Oxford.
- Atorn, Funghammasarn (2000). *Diao Yu Tai: Thai-Sino Relations*. Bangkok: Dome Press.
- Banks, Michael (1985)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in Margot Light and AJR Groom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Handbook on Current Theory*. Boulder, CO: L. Rienner.
- Bozdaghoglu, Yucel (2003)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nd Turkish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 Chandler and Steinberg (1987) "The Kingdom of Thailand." in David J. Steinberg (ed.) *In Search of Southeast Asia: A Modern History*. Hawaii: University Hawaii Press. pp. 387-393.
- Chandler, David P. and David Joel Steinberg (1987) *In Search of Southeast Asia*.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Chen, Lung Chu (1996) "Taiwan,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in Jean-Marie Henckaerts (ed.),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Taiwan in the New World Order: Legal and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Ltd. Press. pp. 189-206.
- Chulasiriwongs, Chayachoke (2001) "Thailand's Relations with the New ASEAN Members: Solving Problems and Creating Images." in Daljit Sinsingh and Anthony L. Smith (eds.),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2001*, Singapore: ISEAS. pp. 337-356.
- Chung, Chien-Peng (2004) "Southeast Asia China Relations: Dialectics of 'Hedging' and 'Counter-Hedging.'"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2004: 35-53.
- Chunlacheeb Chinwanno (2001) *The Trend Of World Economic and Political*. Bangkok, Chuanpin Press.

- Conboy, Kenneth J. (1988) "Cracks Appear in the US Thai Relationship." *Asian Studies*, 75: v1-15.
- Evans, Grant and Kelvin Rowley (1990) *Red Brotherhood at War: Vietnam, Cambodia, and Laos since 1975*. Bangkok: Verso.
- Finnemore, Martha (1996)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 Friedrich V. Kratochwil and John G. Ruggie (1986)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 State of the Art on the Art of the St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0: 753-775.
- Gilks, Anne (1992) *The breakdown of the Sino-Vietnamese Alliance 1970-1979*.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Gilpin, Robert (1981)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insburgs, George (1987) *A calendar of Soviet Treaties: 1974-1980*. London: BRILL.
- Gurtov, Melvin (1975)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The Politics of Survival*.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Harding, H. (1992)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 A Fragile Relationship*.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 Jean-Marie Henckaerts (1996)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Taiwan in the New World Order: Legal and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New York: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 Katzenstein, Peter J. (ed.) (1996)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the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eohane, Robert (1989)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Two Approaches." in Robert Keohane (ed.) *International Institute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p. 158-179.
- Koslowski, Rey and Friedrich V. Kratochwil (1994) "Understanding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Soviet empire's demise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8(2): 215-247.
- Kowert, Paul A. (1999), "National Identity: Inside and Out." in Glenn R. Chafetz, Michael Spirtas and Benjamin Frankel (eds.) *The Origin of National Interests*. London: Frank CASS. pp. 1-34.
- Kratochwil, Friedrich and John G. Ruggie (1986)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 State of the art of the State." *A Regime Critique*, 40(4): 753-775.
- Ku, Samuel C. Y. (2006) "China's Changing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utheast Asia: Starting A New Page of Accord." *Asian Perspective*, 30(4): 113-140.
- Kubáľková, Vendulka (2001)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 Constructivism.” in Vendulka Kubálková (ed.) *Foreign Policy in a Constructed World*. N.Y.: M. E. Sharpe, Inc. pp. 15-37.
- Kurlantzick, Joshua (2006) *China's Charm: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Soft Power*. Los Angeles: Carnegie Endowment.
- Kurlantzick, Joshua (2007) *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Lilalai, Kanya (2001) *Kankhonkhwa Prawattisat Chonchat Thai*. Bangkok: Sathaban Withithat.
- Liu, Hong (2006) “The Contact Zones and Socio-Cultural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Melissa G. Curley and Hong Liu (eds.)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Changing Socio-Cultural Interactions*. Hong Kong: Center of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p. 39-56
- Milner, Helen (1992) “International Theories of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 A Review Essay.” *World Politics*, 44(3): 466-496.
- Phuangphit, Narong (2002) *Back to the past of Thailand and Neighbor Country Relations in 1953-1963*. Bangkok: Auksornjalearnphat.
- Rachanuphabh, Krom Prayadhamrong (2005) *Thai-Sino Relations on the Headwater*. Bangkok: Manager.
- Rittberger, Berthold and Frank Schimmelfennig (2005) “The Co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Explaining the Parliamentar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Human Rights.” *Political Science Series 104*. Vienna: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 Roskamm, Stephen (1992) *Shalom, Imperial Alibis*. Bangkok: South End Press.
- Samudavanija, Chai-Anan (1997) “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are Just Bypassed: The Military, Bureaucracy and Globalization.” in Kevin Hewison (ed.) *Political Change in Thailand: Democracy and Particip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pp. 42-57.
- Singer, J. David (1961) “The Level-of-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oretical Essays*, 14(1): 77-92.
- Skinner, William G. (1957)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n Analytical History*. Bangkok: Times.
- ____ (1958) *Leadership and Power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Thailand*.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 Spykman, Nicholas J. (1994)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N.Y.: Brace and Harcourt Company.
- Stubbs, Richard (2004) “ASEAN in 2003: Adversity and Response.” *ISEAS*,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3-17.

Walt, Stephen M. (1998)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Foreign Policy*, Spring: 29-46.

Waltz, Kenneth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 Y.: McGraw Hill.

Wendt, Alexander (1995)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 71-81.

Wendt, Alexander (1998) "On Constitution and Caus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im Dunne et al. (eds.) *The Eighty Years' Cris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19-199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42-57.

_____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hitaker, Rinn-Sup Shinn (1972) *Frederic H. Chaffee, Area Handbook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gton, DC: American University.

Wilson, David A. (1967) "China- Thailand and the Spirit of Bandung." *China Quarterly*, 30: 149-169.

Woodar, Kim (1980)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Relations of China: Offshore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Energy Trade*. Cambridg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Xia, Yafeng (2006) *Negotiating with the Enemy: U.S. -China Talks During the Cold War 1949-1972*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Zhongying, Pang (2002) "The US Role in Sino-Russian Relations." *Beijing Review*, 45(21): 1-3.

網頁資料：

Bay of Bengal Initiative for Multi-Sectoral Technical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BIMSTEC. (2009) Website: <http://www.tourtobangladesh.com/BIMSTEC.php> (2009/12/01)

Surapong Chainam (2008) "Special Report Thai-China relations." Matichon. Website: <http://www.nidambe11.net/ekonomiz/2005q3/article2005july08p11.htm>. (2008/11/20)

Ministry of Commerce Thailand (2009) "Trade Summary of Thailand." Ministry of Commerce Thailand. Website: http://www2.ops3.moc.go.th/thtrade/country_trade/#. (2009/05/09)

Tourism Authority of Thailand (2010) "International Tourists Arrival to Thailand (By Nationality)". Website: http://203.144.250.243/statistics/otd_ta_nationality.php. (2010/04/01)

中國對外漢語辦公室（2009）〈中國對外漢語辦公室〉。網址：<http://www.hanban.edu.cn/kzxy.php>。（2009/08/25）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2010）〈各國總體經濟數據指標〉。網址：<http://twbusiness.nat.gov.tw/page.do?id=15>。（2009/02/01）

Islam and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Malaysia

Markus SCHILLING *

Abstract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Malaysia's independence in 2007 stands for a twofold development. Whereas the economy grew strongly,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remained weak. Some scholars, such as Huntington (1996) and Kepel (2002), have questioned how democratic values could be successfully implemented in a Muslim society. This paper aims to clarify the impact of Islam for the democratic transition process in Malaysia. Based on a brief discourse about the co-existence of Islam and democracy, the paper will discuss the role of Islam for the weak implementation of democratic values in several selected examples, such as the independency of the judiciary, press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Particularly the case of Anwar (2006) provides important insights into the underlying value system of Malaysia's society.

This paper is qualitative study based on a 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 in which Islam is selected 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and its impact on the democratic transition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The research is based on a broad range of academic literature that critically analyses the political performance as well as research mad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slam and democracy.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a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conservative forces and religious values, but the argument that Islam stands as a barrier for democratic transition process can not be concluded.

Keywords: democratic transition, Islam, Malaysia's society

* The author is a Doctoral Candidate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Economics a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E-mail: shimake25@gmail.com
Received: Aug. 12, 2009; Accepted: Aug. 25, 2010

伊斯蘭教對馬來西亞民主化之困境

施馬可

中文摘要

2007 年為馬來西亞獨立 50 週年。獨立紀念日對馬來西亞而言，象徵著兩種不同方向的發展。縱然馬來西亞的經濟蓬勃成長；反觀政治發展的進程，卻始終緩慢。部分學家，如 Huntington (1996) 和 Kepel (2002)，都曾對馬來西亞該如何成功地將民主價值實踐在回教社會，表示質疑。對此，本文的重點，將試圖理解伊斯蘭教對馬來西亞民主化之影響。以現有伊斯蘭教與民主之間的共存模式作為基礎。以司法獨立、媒體自由和人權等議題為例，探討伊斯蘭教對馬來西亞欲實踐民主價值所扮演的角色和困境。其中，又以馬來西亞前副首相 Anwar (2006) 所提供的重要見解，洞悉馬來西亞社會。

本文主要以建構主義為途徑，選取伊斯蘭教為自變數；伊斯蘭教對民主化之影響為因變數，為研究設計。根據廣泛的學術文獻對政治績效提出的批判性地分析，以及伊斯蘭教與民主之相互關係，為本文之研究基礎。最後，研究成果將顯示保守立場與宗教價值之間強烈的關聯性。對於將伊斯蘭教視為民主化過程的障礙，結果為無法斷定的。

關鍵字：民主化、伊斯蘭、馬來西亞社會

Introduction

After the attacks of the September 2001, Islam as a world religion was criticized by many people. The attacks were partially motivated by religious reasons, but it is questionable whether religion or Islam was the driving spurs behind these terrorist acts. However, people often ignore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various different forms of Islam as a religion. In fact most Muslims are living peacefully together with people from other religions, but they are generally suspected to support terrorism. Malaysia is only one example of a pluralistic society state where Islam is the prevailing concept of societal order whereas people from different religions live together peacefully. In this context it appears worthwhile to have a closer look at the question whether Islam is compatible with Western values.

On the one hand there are scholars, for example Ganguly (1997), who reject the simplification that Islam is the main reason for modern terrorism and argue that other factors are more decisive while religion is only politicized for the mobilization of the disadvantaged. One prominent example is the Kashmir conflict where a high percentage of the Kashmir population faces severe challenges, for example, few job opportunities, a restricted access to political positions and military service. As a result it was possible for the ISI (Inter-Service Intelligence) to recruit many young Kashmir, train them in Islamic training camps as resistance fighters and send them back to Kashmir to fight for the interests of the ISI (Ganguly 1997). Similarly, Nader and Mellon (2009) argue that democracy is feasible in an Islamic society. They emphasize that the Western Standard of Secularization is not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non-Western countri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liberal democracy.

On the other hand, scholars like Huntington believe that Islam is the major reason for a clash between the Western and the Muslim civilization (Huntington 1996). But what are Western values, what are Islamic values? Is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identical with Christianity? Are all Muslims violent? Where is this clash

in Turkey, Malaysia or Indonesia? Yet conservative Muslim thinkers argue that Islam and democracy are incompatible, because (1) the absolute sovereignty of God, (2) the law is given by God in Islam and can not be altered by elected parliaments, and (3) the idea of parliaments as sources of law is seen as blasphemous (Hunter and Malik 2005).

Similarly, Christianity faced difficulties when facing modernization. The modern economic system together with globalization caused serious challenges in societies all over the worl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y formed a new world order within such a short time that traditional values and religions often struggle to adjust to the new conditions. Likewise globalization causes serious changes and hence amplifies the challenges for many societies. Yet many people feel disadvantaged by this development as they loose their jobs because, for example, production was outsourced. It is only comprehensible that people feel disadvantaged and take a very critical perspective towards global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most countries managed to adjust to the new global order very well in term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facts are convincing: Even in countries where most people apparently are disadvantaged, the economy increased instead of decreased. For example, the GNP as well as the income per capita of mainland China increased along with higher live expectancy rates and living standards.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disparity between the coastal regions and the inner land increased, the over all development is strongly positive. Similarly the GDP in Malaysia increased from US \$54,285 millions in 1980 to US \$494,544 millions in 2005 (Bożyk 2006). Nevertheless many societies face serious challenges in modern times. In this context it is worthwhile to examine the co-existence of democracy and Islam in Malaysia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new global order a little bit better.

This paper aims to show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mocratic transition process in Malaysia in order to discuss the impact of Islam on the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Whilst Malaysi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growing continuously it seems

that the democratic transition falls far behind. For this reason it is worthwhile have a closer look at the specific politic order in Malaysia. The paper aim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whether Islam is one of the major obstacles in the transition process the paper follows the following sequence. The first three sections will provide an overview about the terms democracy and Islam as well as their co-existence in Malaysia. The subsequent section discusses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alaysia by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Islam on the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Finally a conclusion will summarize the research findings.

Research Background: The Co-existence of Democracy and Islam in Malaysia

Democratic Political Order

This part revie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mocracy and Islam as well as their co-existence. Both concepts are important keystones of political systems in the modern world, but they developed separately in different societies within different value systems. So far only few countries accomplished establishing a sound democratic political order that is based on a predominantly Islamic society. Therefore, it is worthwhile to analyze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in Malaysia as an example for the co-existence of democracy and Islam.

When analyzing democracy it is worthwhile to reconsider the definition of democracy itself. Its original meaning does not include the specific concept that one could observe in Western countries.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consciousness of democracy developed over time and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of today's democracies historic events had important impacts. The term democracy itself is not explicitly defined and describes in its original meaning "the rule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Hereby the state power is assigned to the whole nation, i.e. every citizen, but the origin, amplitude and content of this power is not defined. Abraham Lincoln expressed this abstract concept by the "rule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In contemporary democracies the people’s will is determined by free elections, but this is no guarantee that the outcomes of the process of decision making are good, i.e. beneficial for the public. Because the rule of the majority is not necessarily conform to the people’s will and even could be realized within a totalitarian rule, it is necessary to add the rule of law to this principle. Montesquieu stressed the necessity of the division of powers including a mechanism of check and balances in order to guarantee mutual control for an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democracy (Schwarz 1990: 77).

The contemporary manifestation of democracy in the Western sphere also includes among others its institutions, the division of powers, a system of check and balances, free elections, the existence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and parties as well as parliaments and the right of free speech. In other words, most people think of a complete set of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democracy (Dahl *et al.* 2003). The modern concept of democracy is the result of a process over a long period and emerged in correlation with the environment of each country. Therefore, it is questionable whether democracy in its final version could be adopted by countries without making the experience of an organic transformation process. In fact many countries implemented democracy, but according to Freedom House the number of liberal democracies levelled off and most political systems could be better described as pseudo democracies, e.g. in many African countries (Freedom House 2007).

The path to a liberal democracy is rather long and includes a longer process of consolidation. Yet there are certain criteria that need to be fulfilled before any democracy can be considered to be well established. For example, the level of a democracy can be measured referring the likeliness that the democracy will break down or erode. It is a difficult task to determine exactly the stage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but it is an essential criterion to estimate the ability of a political system to withstand crises. Another criterion is the double turnover test, i.e. the party in power should change twice, but this is not always eminent. Furthermor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s is whether the people believe in the democratic system as the only political system or not. Finally, a democratic government needs to hold legitimacy which depends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government itself, i.e. in terms of a wealth theory of democracy (Diamond and Morlino 2004).

Obvious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is not very clear-cut. For example, a power could persist for a long time without implementing a democratic order, just because it manages to create a strong economic development that reduces inequalities among its citizens.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democracies that come along with economic growth, but fail to increase the public wealth and instead increase inequalities. The form of political order that partly determine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also determined by the values of a society. Religion is both source and representative of values.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specific value system in the Malaysian societ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s in this context is the Islamic order in Malaysia. Esposito (1992), for example, argues that democracy with its various meanings will take different forms and could even develop into a religious democracy.

Hence the subsequent section will discuss the importance of Islam in Malaysia. This way it will be possible to shed some light on the co-existence of Islam and the democratic political order in Malaysia.

Islam in Malaysia

Currently over 60% of the population in Malaysia are Muslims and the fact that almost 40% of the population are non-Muslims shows the religious diversity of this country. Still the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believes in Islamic values, but Islam in Malaysia essentially differs from the political Islam in many Arabian countries. Nagata (2000), for example, argues that the conservative Islamic party PAS has a split personality as it supports universalistic values with its non-Muslim partners while allowing for inequality of citizenship rights between Malay-Muslims, Chinese, men

and women. This shows both that the PAS adheres to and departs from the traditional public order in Islam. Still the PAS considers the primacy of Islam more important as the banishment of the Dakwah movement shows: The Dakwah movement aimed to enhance the secular development, including more transcendental ethical issues, such as justice, social morality, rights and democracy. But finally the movement was banned for alleged religious deviance (Nagata 2000). This was partly because during 1970s the government underwent a broad Islamization process: Politicians from both the UMNO and PAS pushed for a stricter implementation of Islamic values. Mahatir Mohammad, for example, tried to elaborate on the nature of Islamic rule, and in the early 1980s even Anwar called for a full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Shariah (Mitsui *et al.* 2001). These actions followed social disturbances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mocratic values. In 1969, bloody riots between Malays and Chinese caused the declaration of a state of emergency, but in the end several policies were enacted that affirmed the predominant status of the Malays (Nagata 2000: 6).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Islam on the society in Malaysia, it is necessary to examine which of those values are predominant because there is no universal Islamic order of state. For example, the word Islam itself means “Submission to Allah.” For this reason, Jedaane (1990) argues that Islam is incompatible with democracy. Despite this general principle it appears that only Muslims are bound to this tradition whereas in some countries non-Muslims are exempt from this principle, for example Malaysia. Bakar (Mitsui *et al.* 2001) shows that Islam is tolerant towards non-Muslims, i.e. they can practice their faiths, obtain public office, engage in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own property. Hence Islam pursued a policy of equity of all citizens (Mitsui *et al.* 2001). After a brief overview over Islam as a religion, the subsequent section will discuss its importance as a keystone of the political order in Malaysia.

The origins of Islam are the teachings of the prophet Muhammad who was a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figure in the 7th century. By now it grew to the second largest

religion in the world with 1.8 billion Muslims. There are two main groups, namely the Sunni (85%) and Shi'a (15%). Their religion refers to the fundamental norms, named the Five Pillars of Islam, which include five duties of a Muslim for the society as well as the Islamic law, called the Sharia. These principles developed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and established a tradition of rules that defines all aspects of life and society. This tradition, for example, encompasses everything from practical matters like dietary laws and banking to warfare and welfare. The most distinctive feature of this religion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hat in mainstream Islam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Wright 1996). Obviously, there are different modes of Islamic state order in different states, where the societal order diverges from the traditional rule. This is among others due to the fact that Islam as a religion itself evolves into new forms in certain areas (Diamond and Morlino 2004). Hence it appears worthwhile to discuss the different forms of Islam and democracy as well as their co-existence as the subsequent section shows.

The Co-existence of Islam and Democracy in Malaysia

In Malaysia the combination of Islam and democracy is somewhat an exemp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Islamic state order. This becomes clear when discussing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alaysia.

The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in Malaysia began after the independence declaration in 1957. The political system is closely designed after the Westminster parliamentary system, which is a legacy of the British colonial rule. In this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with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the Royal Highness is the Paramount Ruler. The democratic system is based on a federation system where states give up control over finance, defence, education, foreign affairs and others. Political power is by Constitution distributed to the institutions of Yang Di-Pertuan Agong, the Paramount Ruler, and the hereditary rulers of the nine states and the Council of Malay Rulers. The king has the power to safeguard the customs and traditions of the Malay

people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Islamic Religion in each state. He is also the highest Commander of the Armed Forces (Hooker 2003).

The predominance can be illustrated by the authority of the Paramount Ruler to safeguard Islam which became the official religion of Malaysia in 1957 (Nagata 2000).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operates at a multi-dimensional level in order to pursue its policy goals: For example, it applies coercive elements together with electoral and democratic procedures and it propagates religion in society but pursues secular economic goals. The suppression of the above mentioned Dakwah movement shows how this coercive power it used. Heufers (2002) argues that the maintenance of public peace stands as a top priority of the political agenda and concerns about ethnic tensions even outwei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democratic order. Hence the growing number of detentions that seek to maintain public order already started to undermine the legitimacy of the government. Finally,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flaws among others is that ministers are seldom held responsible and accountable before parliament (Heufers 2002).

Last year Malaysia celebrated its 50 years of independence while upholding democratic as well as Islamic values at the same time. This success was accomplished without major civil clashes like civil wars. Some scholars, for example Sani (2009) take an optimistic view and conclude that Malaysia is on its way towards a more liberal form of democracy. Yet others believe that there are tensions between democratic values, e.g. liberalism and freedom, and an Islamic political order (Huntington 1996). The most popular policy towards a peaceful co-existence of both Islamic and liberal values was made by the new Badawi-led coalition which seeks to implement a new progressive program called Islam Hadhari. According to this idea there should be several general ethical principles that should be acceptable to non-Muslim citizens (Bomhoff 2009). On the economic level the government pushed development by promoting economic activity,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spent quite a big proportion of the GNP on education, including overseas exchange programs

where young Malaysians can pursue tertiary education in a variety of technical and scientific fields abroad. The Petronas Towers are among others exponents of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falls short compared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ne way how the government deals with the differing demands of the Malaysian people is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dual legal system. The legal system in Malaysia is divided into the Shariáh court for Muslims and a civil court for Buddhists, Christians, Sikhs, Hindus and others. A Malay person would be automatically referred to the Shariáh, because it would be assumed that he is a Muslim. Other citizens are required to rely on the civil court. The division breaks up the traditional claim of the traditional Islam as the predominant state order (Peletz 2002). In general this dual system works very well, but there are cases where the limits of its implementation become obvious: For example, the case of the Muslim Lina Joy who seek to marry a Christian, but was refused because she was unable to provide required documents. Other examples however indicate a comparably high degree of religious tolerance in the highly pluralistic state of Malaysia. For example, Muslims in Malaysia are allowed to convert to other religions, which is a peculiar issue in traditional Islam and forbidden in most Islamic countries (Puthucheary and Norani 2005).

The government in Malaysia further reduced tensions in the society by pursuing poverty eradication. This was much more aggressively conducted than in the Arab-Muslim world and was arguably more successful than in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Poverty and income disparities are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main spurs for modern terrorism in many other Islamic parts of the world. In this context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economic policy furthermore reduced tensions between different religious groups. In contrast to the posi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weak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reatens the smooth co-existence of various groups within the society as well as the successful co-existence of democratic and Islamic values. Major

Table 1 Country ranking referring to the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 Rank | Country | Score |
|------|----------|-------|
| 1 | Sweden | 9.88 |
| 32 | Taiwan | 7.82 |
| 39 | Turkey | 7.05 |
| 72 | Malaysia | 5.07 |
| 112 | Iraq | 4.01 |

Source: Kekic (2007).

obstacles on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are: (1) the present ethnic-based politics, (2)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which allows detention without a trial, (3) the control of the media by the government, and (4) an inefficient system of checks and balances as shown by the limited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 (Hunter and Malik 2005).

In 1996, Means stated that “basic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survived in Malaysia, while democratic ideals and practices have not (Means 1996).” After 50 years of the existence of modern Malaysia, the democratic transition is far away from its completion. Malaysia’s withdraw from democratic values was also expressed by Ibrahim, the opposition leader, in his speech at the Kuala Lumpur Convention Centre in 2008 (Ibrahim 2008). This statement is supported by Malaysia’s poor democratic development as shown in table 1 which is an extraction of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s index of democracy of the year 2006. In table 1, Malaysia ranks on position 72 and the score of 5.07 indicates a low level of democratic implementation on a scale of 10 points for a liberal democracy. Hence, Malaysia’s political system is considered a flawed democracy.

Further evidence supports the argument that Malaysia gave up some democratic values during the last decades: Press freedom, for example, declined dramatically in Malaysia and is currently one of the worst in the world. A decline of press freedom in recent years is shown by the table 2.

Table 2 Country ranking referring to press freedom

| Country | Ranking | | |
|-----------|---------|------|------|
| | 2006 | 2007 | 2008 |
| Thailand | 122 | 135 | 124 |
| Malaysia | 92 | 124 | 132 |
| Singapore | 146 | 141 | |
| Vietnam | 155 | 162 | 168 |

Source: Ooi (2008).

These figures might not reflect the actual development of Malaysia's democratic transition because they refer to a selected range of criteria, but they indicate the tendency that Malaysia's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lost ground during the last decades. Further support for this argument is given by one of most prominent cases.

The case of Anwar illustrates Malaysia's struggle for democracy: Anwar, the former deputy prime minister, was sent to prison twice after clashing with governmental policies, because he supported peasant protests. His popularity in the Muslim society rose when he was honoured as the "Muslim Democrat of the Year" by the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Islam and Democracy (CSID) in 2005. He rejects the argument that democracy can not be achieved in a Muslim country, but ascribes difficulties of the democratic transition to the limitations of freedom in Malaysia (Ibrahim 2006). His protest against the policy of the government should under normal conditions be legal in any democracy; hence the imprisonment of Anwar Ibrahim further shows the low level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mocratic values in Malaysia. Obviously, it is rather difficult to implement democratic values with its claim for freedom in a Muslim society, but there remains uncertainty about the reasons for the

weak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The subsequent two sections aim to propose possible answers this question.

Islam and Democracy: Limits and Prospects

This section discusses the limits and prospects of democracy with a Muslim society. As mentioned above there is no common sense whether the two concepts are compatible or not. The answer about the complementary of these two concepts basically depends on the form that serves as a basis for the debate. Both democracy and Islam are no monolithic concepts. For example, illiberal democracy or semi-authoritarian democracy appears being very different from a liberal democracy. Similarly there is no single eternal Islam like some militant radicals claim. Likewise Western democracies, Islam could develop from authoritarian theories and systems into an Islamic democracy. Nowadays most Muslims take moderate rather than radical perspectives and consider Islam and democracy as compatible concepts (Hunter and Malik 2005: 86-95). Furthermore it is questionable whether democracy should take the same form as in Western countries.

Accordingly, Nader and Mellon (2009) argue that democracy is possible under different founding conditions, especially when discussing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non-Western countries. They further question Huntington's assumption that Islamic values are obstacl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mocracy. Moreover, they emphasize that the Western standard of secularization is not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non-Western countri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liberal democracy. Yet the division of relig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herits the biggest challenge: a secular order of society is necessary to sustain and maintain liberal democracy. As religion is a predominant marker of identity in Malaysia, the political system is consequently defined by religious politics. For this reason, it becomes obvious that until now Malaysia has not succeeded in adopting the normative role of Islam to the requirements of liberal democracy (Welsh 1996). Instead the predominance of Islam

surely imped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mocratic values, but it is not the main obstacle. In this context, the author argues that historical and especially structural constraints are the biggest obstacles. Similarly a study on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Arab world noted that political culture should not be seen as the prime or overriding variable in any process of regional democratization. Cultural attitudes not only influence political realities but are also themselves influenced by political context (Nader and Mellon 2009).

Finally, liberal democracy requires secularism. As Malaysia is considered a secular state, religion itself is not an inherent obstacl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mocracy in Malaysia. The main question is whether a secular consensus emerged via a transformation of religious ideas toward politics. Without such a transformation religion tends to undermine the secular order of society that is needed to sustain liberalism. A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can be illustrated by the case of Catholicism because Europe similarly faced the question of how to implement democrac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overcame similar obstacles (Nader and Mellon 2009). A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democracy therefore requires Malaysia to push for a broader secularization of the political order, like for example in Turkey.

In order to push further for a broader implementation as well as incorporation of democratic values, Malaysia's society needs to face the challenge of modernization. By deepening the Islamization process Malaysia's government reinforces totalitarian forces and at the same time limits the freedom of the people (Hunter and Malik 2005). Each country adopts a form of democracy which restricts individual liberties. But religion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to define those restrictions. Dependent on religious beliefs citizens will face more or less severe constraints of their liberties. Accordingly Islam curbs many aspects of the daily life and hence, particularly for women, constrains many liberties of Muslim people. Therefore, Islam could be interpreted as an obstacle for modernization rather than for democratization (Voll 2007). Politicians, for example, sometimes interpret the meaning of Qur'an in a way

that is beneficial for their political faith. And it is only comprehensible that political parties resist modernization whenever changes would endanger their political faith, but this way religion impedes necessary changes (Khatab and Bouma 2007), as illustrated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

Major Obstacles in the Transition Path Towards Democracy

Obviously there are several obstacles in the path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These include a lack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independence of judiciary, human rights, press freedom and gender equality. The following examples discuss several cases that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transition towards a democratic order in Malaysia.

Democracy in Malaysia has been widely defined as a functional electoral system, i.e. opposition candidates do win seats in the federal Parliament and state assemblies, but the political power remains concentrated in the coalition parties. The struggle about the dismissal of the previous ruling National Barisan (BN) from office shows small signs of deregulation and freedom, but still many observers call democracy in Malaysia a well-oiled electocracy.

In addition many parliamentary laws restrict public expression of oppositional thoughts. Hence many Malaysians are still unable to participate in public discourse which is an integral part of a functioning democracy. Press freedom and the freedom of speech are both essential elements of a democracy; therefore any limitations of these rights hinder the democratic transition.

Furthermore, the dependency of the judiciary on the government shows difficulties that Islamic countries have when establishing a political system in terms of a separation of powers. In Muslim dominated countries power is traditionally concentrated in the government and refers closely to the guidance of the church.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used its power over the judiciary in 1988, for example, when

the government removed several senior judges who did not comply with the official policy. This case is known as the operation Lalang crisis. Aware of the threats to their careers, judges acted in favour of the government in politically charged cases. A clearer division of powers is one of the future tasks of Malaysia's government. A close correlation between religion and political power is accompanied by a concentration of power. It remains unclear whether this principle of concentration can be interpreted as an underlying pattern of Malaysia's societal structures or whether the two spheres are independent, but the tolerance of other religions seems to be bigger than other political thoughts (Human Rights Watch 2006).

Another important case, as mentioned before, is the imprisonment and the release of Anwar. The imprisonment of the former Deputy Prime Minister caused widespread protests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The public discussion about this case puts pressure on the government which finally led to a back down of the government. The release of Anwar from prison in the year 2004 signalled a shift towards a greater judicial independence. However the court faces further challenges towards more independence when considering human rights. The release of Anwar and the opening of a notorious detention facility in 2004 both mark slight improvements of Malaysia's human rights record, but many issues remain unsolved. Those concerns include the arbitrary detention of alleged militants under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ISA), restrictions on media, abuses against refugees and migrants as well as the above mentioned constraints on judicial independence. The following sections describe concerns of human rights and press freedom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05).

In the case of Irene Fernandez the court sentenced the human rights activist in the year 1995 for maliciously publishing false news under Malaysia's restrictive press laws. In one of her reports she made beatings, sexual violence and inadequate nutrition in detention camps public. Under the ISA many detainees are arrested without any type of judicial review. Many of those detainees are considered to be

political opponents, but are alleged being members of international terrorist groups. In this context the ISA is used as a tool to suppress critical voices towards the official policy. The government promised to investigate the reported cases, but the Malaysian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SUHAKAM), who is responsible for the investigations, has not delivered any findings so far.

In 2002 dozens of refugees died in transit areas while waiting for deportation to their home country. Reports point out that these people died from dehydration and disease. Most of them are from Indonesia of the war-torn region Aceh, but they were denied status as refugees. In addition the police was reported of being engaged in abuses of those refugees. (Freedom House 2007)

Another example for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s the treatment of migrant workers. The working hours and payment of the migrant workers is much worse than those of domestic workers. Indonesian workers earn less than half the amount of low-wage workers, they are typically not allowed to leave houses even when not on duty. In the worst cases employers fail to pay fully salaries or not pay at all. Furthermore migrant workers face physical, verbal, and sexual abuse from employers and labour agents. The efforts of Malaysian government to monitor the situation of the migrant workers not only falls short, but excluded migrant workers from Indonesia from section XII of the Employment Act of 1955 which limited their work to eight hours per day and entitled them to one day of rest per week. Migrant workers immediately lose their legal status when escaping abusive working situations and are threatened by being deported. This is among other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immigration laws in Malaysia and policies are not appropriate to protect the migrant workers (Freedom House 2007).

The above mentioned examples illustrate the poor implementation of democratic order but they do not point at a repressive role of Islam. These problems seem to be correlated to weak governance rather than being religious motivated. Abused military detainees, for example, are also often Muslims. In some cases one could argue that the

repression of the political opposition is the reason behind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 other cases economic interests could be used to explain arbitrary treatment, but there is no reason to argue that the Islam is the main obstacle for a more liberal and equal development. The ultimate issue is about gaining and maintaining political power by applying various instruments, most notably patronage and corruption. In this context religious issues are politicized in order to pursue their political objectives by mobilizing their supporters (Nagata 2000). Furthermore Kahn (2006) argues that democratization has the potential to reduce many problems of the Muslim world.

The poor democratic performance in Malaysia appears most blatant for the restrictions on media freedom. It is worthwhile to focus on this issue, because a repressive Islam as an obstacle in the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could be easily tracked down. Media in Malaysia is controlled through a network of laws which is backed by a direct day-to-day monitoring. The only independent news website is Malaysiakini. The government of Prime Minister Abdullah continued the censorial policies of the Mahathir government and any changes are not in sight. Instead the government implemented further restrictions in 2006 in order to suppress public discussion of political issues that could potentially undermine the political power of the leading parties.

The constitution entails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speech and expression, but in reality the Printing Presses and Publications Act (PPPA) which was implemented in the year 1984 limits this freedom drastically. According to this law all publishers and printing companies are required to obtain an annual operations permit. Furthermore the prime minister as well as the minister of internal security has the right to revoke the licences at any time without judicial review. In 2006 the PPPA was used to suspend the permission for the Sarawak Tribune. A prominent example is the publication of the caricatures published in a Danish newspaper. The cartoon showed the prophet Mohammed as a terrorist. By prohibiting any kind of materials about the Danish cartoon the PPPA proved to be an effective tool for suppressing the media.

In 1988 the government implemented the Broadcasting Act. Therefore the information minister has the right to decide who can own a broadcasting station and provide television service. Due to the various restrictions, media in Malaysia adopted a system of self-censorship. The limitations of press freedom are accompanied by the Official Secrets Act, the Sedition Act, the ISA, the Emergency Ordinance, the Essential Regulations and the Universities and Universities Colleges Act. Furthermore the public has no access to controversial data. In 2006, for example, the prime minister banned all reporting on issues of race and religion. In addition to print media the prime minister threatened to detain those who used the internet and text messages to spread untruths. Yet government ministers called for extending the PPPA to censor information provided in the internet. Finally books and films and TV programs are also controlled by law. As a result pluralism of expression is vastly limited to topics that a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fficial policy respectively with Islamic values. The exodus of press freedom can be illustrated by a merger which granted UMNO, the ruling party, direct ownership of most local media through a partnership with Media Prima Bhd (Human Rights Watch 2006). The severity of Malaysia's poor record of press freedom was also shown above in table 2.

As shown, press freedom is one of the most severe obstacles in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Without critical voices of the opposition made public, the interests of many Malaysians are kept silent, but they are expressions of many people who feel dissatisfied with the policy of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If there were only few people expressing their discontent this would not threaten the power of the ruling parties and restrictions would not be necessary because the impact on public opinion would be negligible.

On the one hand, there are many restrictions that aim to suppress critique on Islam and on the other hand, as the example of a tolerated religious conversion shows, there is a high level of religious tolerance in the highly pluralistic country. In general the various ethnic groups live together in harmony although there are almost 40%

non-Muslim citizens. However, critical voices on Islam are suppressed, as the case of censoring the publications about the Danish caricature illustrates. Any challenge for Islam is oppress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clos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redominantly Muslim government and Islam is the basis of this mechanism. At the same time, any critical voices regarding the political order are evenly suppressed and examples for the suppression of political critique outnumber the cases of censorship of religious issues. Hence there seems to be no direct linkage between Islam and the slow or even reverse democratic transition. However it is fair to conclude a pattern of suppression of critical voices towards prevailing ideas, no matter they are political or religious motivated. This could be used to further analyze the value system of the Malaysian society, but it goes too far to argue that Islam is a major obstacl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mocracy in Malaysia.

Conclusion

In conclusion the religious freedom in Malaysia shows a relatively high level of tolerance in the society towards other groups,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does not allow for critique on Islam. Though Islam itself does not seem to be one of the major reasons for the weak performance of the government in terms of implementing democracy, it still illustrates how restrictive the policy of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towards any kind of critique on the prevailing concepts of Islam as well as political order. In this context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most significant reason for the poor implementation of democracy in Malaysia is the claim to power by the ruling parties. It appears that they are not intrinsically motivated by religious reasons, but by self-interest in terms of maintaining their political power. Major obstacles are the various restrictions of press freedom and the numerou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Those obstacles can be distinguished by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issues. The first kind of constraints aims to maintain political power, whereas the latter seeks to protect cultural values, including Islam. Nevertheless both limitations imply a pattern of protective behaviour.

Similar to democracy in Japan or other Asian countries it is unlikely that Malaysia will adopt a democracy which is identical to any Western counterpart. It is rather likely that democracy in Malaysia would take a form with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that are determined by cultural values of this society (Voll and Esposito 1996). The issues of press freedom in Malaysia show that censorship includes topics that are not restricted in Western democracies, but this not necessarily states an example of a poor implementation of democratic order. The suppression of reports about the Danish cartoon, for example, instead exemplifies that a liberal democracy in Malaysia would be of a different kind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value system of the Malaysian society.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 mentioned examples for suppressions of critique regarding religious issues there are further examples that support the argument that liberal values are oppressed in Malaysia. However, one should acknowledge the particular values of the Malaysian people. Those values would, for example, include religious issues like gender roles. Eve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otal press freedom certain issues would still be excluded from any kind of media, for example topics that discuss sexual behaviour which is traditionally excluded from media in Muslim countries. Finally this shows that Islam in some selected cases could be located as an obstacle in the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 particularly towards a Western style democracy, but Islam itself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major barrier for a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democracy. However the goal to establish a secular democracy in Malaysia appears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Many Arabian societies Islam might not be ready to absorb the basic values of modernism and democracy, but in Malaysia non-religious factors appear to be prevalent.

References

- Anwar, Ibrahim (2006) "Universal Values and Muslim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17(3): 5-12.
- Bożyk, Pawel (2006) *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Globaliz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Hampshire: Ashgate.
- Dahl, Robert A. (1998) *On Democracy*.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 Dahl, Robert A., Ian Shapiro and Jose Antonio Cheibub (2003) *The Democracy Sourcebook*. MIT Press: Cambridge.
- Diamond, Larry and Leonardo Morlino (2004) "The Quality of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15(4): 20-31.
- Esposito, John L. (1992) *The Islamic Threat: Myth or Rea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Ganguly, Sumit (1997) *The Crisis in Kashmi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ufers, Rainer (2002) "The Politics of Democracy in Malaysia." *German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85: 39-60.
- Hooker, Virginia M. (2003) *A Short History of Malaysia: Linking East and West*. South Wales: New Allen & Unwin.
- Hunter, Shireen and Huma Malik (2005) *Modernization, Democracy, and Islam*. Washington, DC: Praeger &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 Huntington, Samuel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Ibrahim, Zaid (2008) "Malaysia – A lost democracy?" Speech at the LawAsia Conference 2008. Kuala Lumpur Convention Centre.
- Jedaane, Fahmi (1990) *Notions of the State in Contemporary Arab Political Writings*. London: Routledge.
- Kahn, Masood A. M. (2006) *Islamic Democratic Discourse: Theory, Debates, an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Lanham: Lexington Books.
- Khatab, Sayed and Gary Bouma (2007) *Democracy in Islam*. New York: Routledge.
- Kepel, Gilles (2002) *Jihad: The Trail of Political Islam*.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eans, Gordon P. (1996) "Soft Authoritarianism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Journal of Democracy*, 7 (4): 103-117.

- Mitsui, Nakamura, Sharon Siddique and Omar Farouk Bajunid (2001) *Islam & Civil Society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Nader, Hashemi and Andrew Mellon (2009) *Islam, Secularism, and Liberal Democracy. Toward a Democratic Theory for Muslim Socie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agata, Judith (2000) "Is Islam compatible with democracy? The role of religion in civil society and human rights movements in Malaysia since 1990." Program for Southeast Asian Area Studies.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Peletz, Michael (2002) *Islamic Modern: Religious Courts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Malaysia*. New Y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uthucheary, Mavis and Othman Norani (2005) *Elections and Democracy in Malaysia*. Bangi: UKM Press.
- Sani, Mohd A. M. (2009) "The Emergence of New Politics in Malaysia: From Consociational to Deliberative Democracy."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5 (2): 97-125.
- Schwarz, Gerhard (1990) "Limitations to the Interdependence of Systems." in Kurt Dopfer and Karl F. Raible (ed.)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System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pp.?
- Voll, John O. (2007) "Islam and Democracy: Is Modernization a Barrier?" *Religion Compass*, 1 (1): 170-178.
- Voll, John O. and John Louis Esposito (1996) *Isla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elsh, Bridget (1996)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in Malaysia: Challenges to the Regime?" *Asian Survey*, 36 (9): 882-903.
- Wright, Robin (1996) "Islam and Liberal Democracy: Two Visions of Reform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7 (2): 64-75.

Websites

- Bomhoff, Eduard J. (2009) "Islam and Democracy: Malaysia after 50 Years." Website: <http://ssrn.com/abstract=1430243> (2010/01/25)
- Freedom House. (2007) "Country report: Malaysia." UNHCR Refworld. Website: <http://www.unhcr.org/refworld/publisher,FREEHOU,,MYS,473c55dc36,0.html> (2009/12/27)
- Human Rights Watch (2006) "Human Rights Watch World Report 2006 - Malaysia." Website: <http://www.unhcr.org/refworld/docid/43cfaea325.html> (2009/01/01)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05)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Annual Report 2005.
Website: http://www.transparency.org/publications/publications/annual_reports/annual_report_2005 (2009/11/23)

Kekic, Laza (2007)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s index of democracy."
Website: http://www.economist.com/media/pdf/Democracy_Index_2007_v3.pdf
(2008/12/28)

Ooi, Jeff (2008) "Screenshots: RSF Ranking." Asian Correspondent. Website:
http://www.jeffooi.com/2008/10/rsf_ranking_from_92_to_124_to.php
(2008/12/28)

早期新馬地區東南亞研究英文文獻概述 (1800-1876) *

廖文輝 **

中文摘要

英國自 1786 年占領檳榔嶼開始，正式在馬來半島取得一個立足點，並從十九世紀開始，有關英國在馬來半島的文字記載和研究方才逐漸湧現，蔚然成篇。在皇家亞洲學會海峽分會成立之前，英人的關注焦點主要側重在對馬來半島進行廣角鏡式的全盤和廣泛的瞭解，其書寫方式主要是以記錄、編輯和整理為主，深入和細緻的研究較少。至於從事於這方面工作的，則被稱之為觀察家。這時期的書寫方式可以歸納整理成五種，包括報章雜誌和期刊的出版、西人的遊歷文字、英殖民人員百科全書式的書寫、英殖民政府的檔案，以及英國倫敦佈道會的印刷出版事業。這時期的研究模式和書寫形式有者為後來者繼承並發揚光大，且形成英文源流東南亞研究的傳統和資源。

關鍵字：東南亞研究、觀察家、遊歷文字、殖民檔案、倫敦佈道會

* 本文曾於中國福建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中馬關係與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提呈，現增補修訂發表。

** 作者為馬來西亞新紀元學院馬來西亞歷史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講師。E-mail:

bonhoi.lew@gmail.com

本文收件日期為 2010 年 01 月 05 日，接受刊登日期為 2010 年 05 月 25 日

Comments on English Sources on the Southeast Asia Studies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from 1800 to 1876

Bon Hoi LEW

Abstract

Since 1786, British occupied Penang and got a foothold in Malay Peninsula officially.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19th century, written record and studies on Malay Peninsula by United Kingdom had gradually emerged. Before establishment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on Straits settlem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British on the Malay Peninsula was mainly focus on surface, lesser concentration on depth and detail study, mostly depend on the record, edit, and data arrangement. The person who engaged in this we call it observers. Their works can be composed to five categories, publication of newspaper and periodicals, itineraries, encyclopedic writing, colonial archive, printing and publication business of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This form of study and record had inherited by the late comer, and this becomes the tradition and resources of the English stream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Keywords: Southeast Asia Studies, observer, itinerary, colonial archives,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一、前言

馬來半島位處中印交通的中心點，自古以來即為商旅停泊歇息的商貿交易所在，從半島北部的克拉地峽、吉打、檳城到南部的馬六甲、新加坡，乃至於東海岸的北大年、龍運等地，從紀元前開始，都先後成為盛極一時的口岸，有的甚至因利之便，成為獨霸一方的王朝。從古至今，船影畢集、商旅繁盛，期間也留下不少相關的文字記載，但主要見於印度、中國和阿拉伯的載籍，至於歐洲相關的文字也有一些（廖文輝 2009：11-12）。¹到了地理大發現之後，歐人陸續東來，馬六甲海峽沿岸的口岸乃成為兵家必爭之地，尤其是當時正值興盛的馬六甲。馬六甲先後由葡萄牙和荷蘭占據，並以此為據點，發展在東南亞以及遠東的勢力。葡、荷兩國的殖民官員和隨後而來的航海家也留下一些文字紀錄，有的佚失，有的被保留下來，且經後人的發掘，譯成英文流通，其中較為重要和著名的有葡萄牙的《東方志》和《黃金半島題本》、荷蘭的《佛羅利氏航海記》等，皆提及了馬來半島（Khuo 1985a: 88）。²

而英國則是在 1786 年占領檳榔嶼後，才正式在馬來半島取得一個立足點。從十九世紀開始，有關英國在馬來半島的文字記載逐漸湧現，並蔚然成篇，超越其他歐洲語文，成為主要的文字紀錄。這種情況的出現，主要是英國商人進入馬來半島後發現當地巨大的商業潛能，亟需掌握有關資訊；其次，則是殖民者對當地各方面的殷急需求，以利殖民統治（Khuo 1985a: 88-89）。因此，若要論及新馬地區東南亞研究的英文文獻，或許可以 1786 年英國占領檳榔嶼為切入點，此時，英國殖民人員和探險家等人開始進入

¹ 在《舊約聖經·列王紀上》第九章裡有俄斐（Ophir）之地名，有學者認為是馬來西亞西海岸海拔 4,187 公尺的素山（Gunung Ledang，一名金山）。公元 80 年，由希臘航海家所編寫的有關印度洋的航海和貿易手冊《印度洋環航記》（*Periplus Maris Erythraei*）提及「金地」，其所指即今下緬甸至馬來半島的地區，並記載了印度人到此旅行的故事。公元 150 年，一位著名的古代地理學家托勒密（Ptolemy）曾經撰寫一本地理志，稱馬來半島為黃金半島（Aurea Chersonesus）。到了中古時代，馬提安諾斯（Martianus）編輯的《大洋航海志》（*Periplus of the Outer Sea*），也是以黃金半島（Golden Khersonese）來稱呼馬來半島。以上皆是地理大發現以前歐人有關馬來半島的零星文字紀錄（廖文輝 2009：11-12）。

² 事實上，荷蘭殖民時期留下大量的荷文史料，尤其是十八世紀西岸各馬來土邦以及柔佛的史料皆是無比珍貴的文獻檔案資料。除此之外，納切爾（E. Netcher）的《荷蘭在柔佛和暹羅》（*De Nederlanders in Djohor en Siak*）是當時荷蘭人研究馬來半島的重要成果（Khuo 1985a: 88）。

馬來半島，摸索和研究這塊土地，較側重於全面和廣泛的瞭解，文字以現象敘述和描繪為主。儘管當時已經有人嘗試學術研究，卻不盡如人意。迄今為止，在新馬可以見到之最早文獻紀錄是海峽殖民地的政府檔案‘Series D Penang Despatches to India, 1800-1820’（系列 D「檳榔嶼遞送印度檔」），共 11 卷（Turnbull 2003: 327），以 1800 年為研究的起點。雖然在此之前，東印度公司和印度辦事處已經存有相關的檔案（Turnbull 2003: 329），印度和英國的某些刊物也已有東南亞研究的文章發表，但由於這些論述之蒐集不易，加上僅是次要文獻，基本上不會影響本文的論述，所以不在討論範圍內。

到了 1870 年代，工業革命興起後，英國與歐洲各國積極在海外開拓新殖民地，尋找原料和市場，馬來土邦豐富的錫產使英人大感興趣，同時也為了避免德、法涉足干預，英國乃開始積極干涉馬來土邦的政治糾紛，保護華籍和歐籍商人在錫礦業的投資，致力於穩定局勢，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英國一改之前的不干預政策，直接介入馬來土邦的內政，並於 1874 年簽訂「邦咯條約」後，直接介入馬來土邦。在這種情況下，為了能更有效地統治管理馬來土邦，殖民統治者對當地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風俗等各層面就需要有更深入的瞭解，而不再侷限於之前的商貿瞭解和表象認識。三年後，也就是 1877 年，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海峽分會（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以下簡稱海峽分會）成立，可謂是順應局勢之所需，這是最早從事馬來半島或其鄰近島嶼研究的學術組織，也是英文源流東南亞研究的一個標竿，顯示擺脫早期僅及於現象描繪、知識傳布和背景介紹的層次，已逐步進入研究的階段。這個時期的研究人員主要以殖民學術行政人員為主，而且這個傳統一直延續至二次大戰前夕，他們關注的議題、研究的傾向，對於戰後新馬英文源流的學術研究走向仍具有深刻的影響力。二次大戰以後，情況開始有了改變，學術研究逐漸從學術行政人員手中轉移至專業研究人員，同時，馬來亞爭取獨立在即，本土意識高漲，於是隨著本土研究人員的出現，東南亞研究本土化的呼聲也就無可迴避了。

海峽分會成立後，新馬的東南亞研究步入了另一個不同的局面，即從觀察記錄過渡至學術研究，爰此，本文乃以 1876 年海峽分會成立以前為討論下限，往後的發展則將由另文討論。³本文除了將 1800 至 1876 年以前的新馬地區東南亞研究的英文文獻做一整理和概述介紹外，最大之目的則在以學術史的視角，嘗試建構新馬地區東南亞研究英文文獻的分類體系，並透過這種學術體系來把握和瞭解新馬地區東南亞研究的英文文獻，以便對學術研究有所助益。此外，這類文獻對中文學界或許較為陌生，即便是常引用此類文獻的英文學界，迄今亦仍缺乏相關的論著進行分類整理，因此本文期能對此研究上的空白有添磚加瓦的作用。

最後，有必要說明的是，文中介紹和引用的英文文獻就筆者所能掌握的資料，除了 Alfred R. Wallace 的 *The Malay Archipelago* (Wallace 1933)，其他暫無中譯本。這些文獻都可以在馬來亞大學和新加坡國立大學總圖書館、新加坡國家圖書館獲得；檔案文獻不論是微縮膠卷或原件，均可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國家檔案館取得。

二、新馬觀察家和遊歷文字概述

在海峽分會成立以前，英國才剛開始摸索馬來半島，文字主要以記錄、敘述為主，此時，雖然已經有學人嘗試進行一些學術研究，甚至出版期刊，但都較為零星和片面，還未正式進入全面和有組織研究的階段，可謂新馬東南亞研究的萌芽期或探索期。此時期，文字書寫的傳統開始形成，有的為後來者所繼承，並逐漸形成英文源流東南亞研究的傳統。

馬來半島地處熱帶雨林，物種繁多，其原始以及人煙罕至的天然環境，無疑是個極富冒險興味的探險樂園，加上有別於西方社會的人文風俗，不免吸引了許多歐人的眼光，成為歐洲人到馬來半島旅遊探險的原因(Savage and Kong n.d.: 6-7)。而英國人在馬來半島占有一席之地之後，往東方海域來尋找財富、新牧民、名聲榮譽，以及科學知識的人，可以說是前仆後繼，這些人包括有組織的商旅、帝國官員、傳教士、探險家、航海家、博物學

³ 有關論述可參見廖文輝 (2007: 40-47)。

家，以及歷史學家、人類學家，甚至是考古學家和比較宗教學者，其中不少人遺留下有關東南亞可貴的文字資料，英國早期對馬來半島的認識主要即來自於此。簡而言之，這批人員約略可分為三類：

(一) 有殖民者先鋒美稱的探險家或旅行家。這些殖民者的先鋒涵蓋面極為廣泛，舉凡來求取知識、進行科學研究工作的博物學家、歷史學家、人類學家，甚至隨扈家眷、專業人員等，皆在其列。這批人員除少部分例外，一般均是以個人身分行動，屬非官方人員。

(二) 屬殖民統治者的官方人員。他們的行動往往背負政治議程，而且為了政治目的，完成政治使命，往往必須深入不毛之地實地考察，所以許多時候，他們也扮演了探險先鋒的角色。這些人員在執行勤務的過程中，往往都會在當時或者事後將有關的事件或經歷書寫成文，而這些文字有的是以專著、文章、書信、日誌或回憶錄等形式出現，不一而足。這裡必須說明的是，凡是因公所需而留下的文字，且存收於殖民文檔之內者，皆視為檔案資料；以個人身分憶述其當值期間之點點滴滴的文字，蓋以回憶錄視之。這裡所謂的殖民官員的遊歷文字，是指那些不以當值點滴為敘述中心，側重於敘述和介紹風土人情以及抒發一己感觀的文字。

(三) 傳教士。另有一批傳教士因傳教的因緣，也曾扮演類似角色，稍事相關的書寫，但不論在廣和深兩方面皆難與上述二者相提並論。

這些人員深入內地探險、考察和遊歷，依據本身的職責需要，完成任務。在過程中，他們也觀賞文物景觀，訪察民俗風情，留下不少膾炙人口的作品。這些著述通常以如下幾種形式出現，其中以遊記為大宗。遊記主要是記載個人親身經歷和耳聞，同時表達個人觀感，屬隨性輕鬆的文字，有的以日記形式出現，有的則以書信方式呈現，較常見的是以章節方式來鋪陳其敘述。遊記書寫主要以非官方人員為主，少部分的官方人員也有參與。另外，還有日誌和百科全書式的書寫，其中日誌是殖民官員執行勤務時每日記載的工作報告，以供日後決策參考之用，雖屬官方文字紀錄，但有的卻具有賞心悅目的閱讀價值，例如，Crawford (1828) 的《出使暹越日誌》(*Journal of an Embassy to the Courts of Siam and Cochin China*)，無異於遊歷文字，以遊歷文字視之亦無不可。事實上，早期英國人瞭解馬來半

島主要仰賴兩個管道，一為觀察家，一為殖民官員，由於檔案、會議紀錄、行政報告較為刻板沉悶，且大部分是不公開的機密檔，因此相較於文學興味濃厚、生動活潑的遊歷文字，遊歷文字不免成為西方世界瞭解馬來半島的最佳文字。因此，英國殖民馬來半島初期的東南亞研究可說是觀察家主導的時期。

遊歷文字在內容敘述上，一般可以歸納為如下三類：

（一）首先是背景介紹部分，這是一種針對作者所親身經歷的地區、環境、文化、民族等方面提供概略性的介紹，以方便讀者馬上進入作者的情境，增加閱讀上的理解。但並非所有遊歷文字都在書前特闢專章專節，做通論式的敘述。

（二）其次是所見聞和所經歷的描繪和敘述，它可以是對某一事件發生的敘述，例如 Innes (1993: 85-123) 經歷的華人盜匪殺害英國官員事件，也可以是個人景觀見聞的描繪。

（三）最後是作者在這些觀察和經歷的基礎上所提出的觀點和看法。

基本上，背景介紹性質的文字並非遊歷文字的主體，可有可無，其內容屬老生常談，斷簡殘編，沒有太大的史料價值。而所見聞和經歷的部分，一般則都會如實記載，歪曲的地方較少，具有相當的可靠性。本研究所呈顯之記載，都是作者深入民間觀察到的結果，不僅有史料價值，同時也是人類學意義上的文獻記錄，為十九世紀馬來半島社會、文化、習俗等方面提供良好的生活禮俗的素材。此外，文中必然涉及的各種地理景觀、風景和氣候，也是地理歷史學的有力材料 (Savage 1984)。⁴至於作者自身的觀點，則從另一側面讓我們瞭解西方人對東方的看法，以及他們對當地社會文化的心態，這些看法有的極為偏頗，有的不無可取之處，在轉引使用時務必小心辨析。

事實上，將遊歷文字區分為官方或非官方，不過是圖分類上的方便，在論述上，即便有官職在身的殖民官員，也不見得受縛於官方，凡事政治正確。基本上，他們是以個人自由身分進行論述，在書寫方面，他們仍然

⁴ 有關這方面的研究詳見 Savage (1984)。

有極大的自由空間，可以暢所欲言，表達一己之見。在對馬來半島民族社會的觀點上，他們的口徑一致，無甚差別，且不外是人種雜陳、巫人懶散、華人勤奮；馬來社會落後、仍實行不符人道主義的律法習俗；華人會黨是社會動亂的不安定因數；對華巫常採用諸如粗野、不潔、有礙觀瞻等貶抑性辭彙。故此，他們皆認同英人的統治可以改造社會，帶來進步繁榮，也都懷有強烈白人負擔心態、西方文化優越的傲慢心理。

以下將具體介紹一些較有代表性的遊歷文字。首先，在這時期由具有官方背景之人員所撰述的遊歷文字主要有如下數種：

(一) Jonas D. Vaughan (1825-1891) 是位充滿豐富人生歷練的英殖民政官，他出身於海軍，1846 年開始在海峽殖民地任事並開始學習巫文，先後服務於海軍軍艦擔任檳城警官 (1851-1856)、新加坡海軍侍從官 (Master Attendant, 1857-1861)、地方推事 (Police Magistrate) 及新加坡副參政司 (Assistant Resident)。退休後，Vaughan 考獲律師資格，轉當律師，但不幸的是，他在 1891 年因為從海上落水溺斃海中。他在海峽殖民地居留 45 年，其中有五至六年是在檳城度過的，這也讓他有機會接觸華人。他的文字，不論是短文或是專著，皆大量地描繪當時華巫的風俗習慣，短文有〈檳榔嶼和威省馬來民族考證〉(Notes on Malay of Pinang and Province Wellesley)；另有一篇公認是他手筆的匿名日誌〈1846 年印度群島航行日誌〉(Journal Kept on Board a Cruiser in the Indian Archipelago in 1846) (Blythe 1974: V-VII)。他最為著名的一篇文章是〈檳榔嶼華人考〉(Note on the Chinese of Penang)，先後發表於 1854 年和 1855 年的《印度群島與東亞學報》(Journal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 and Eastern Asia，第 8 卷第 1-27 頁和第九卷第 109-124 頁)。Vaughan 出版於 1879 年的《海峽殖民地華人的風俗習慣》(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就是以此為底本撰述而成 (Vaughan 1974)。

(二) Sherad Osborn 的《一個海軍軍官在馬來亞水域的拓展》(The Blockade of Kedah in 1838: A Midshipman's Exploits in Malaya Waters)。Osborn 是一位傑出的英國海軍將領，跟隨英國艦隊征戰大半個地球，曾參與克里米亞戰爭 (Crimian War, 1854-1856)，他的海軍事業起步於新馬，

16 歲至新加坡，隨艦隊巡弋新加坡岸外阻截海盜。不久後，他被調往吉打水域擔任巡弋任務。這段期間，他的隨扈有馬來舵手和船員，生活起居皆入鄉隨俗，其著述對馬來生活和習俗的描繪極為詳盡和真實，可讀性極高，被譽為「本世紀最迷人的海軍故事的其中一部」（Gullick 1987）。⁵

（三）James Low（1791-1852）為英籍殖民官員，於愛丁堡學院（Edinburgh College）完成學業後，以 20 弱冠之齡加入東印度公司成為仕官。1812 年開始服務於印度步兵部隊，五年軍旅生涯後，於 1818 年元旦調至檳榔嶼，直至 1840 年調到新加坡為止。期間，Low 曾出使暹羅、緬甸和霹靂，並開始勤學暹語和巫語，為他往後的研究工作奠定根基（Jackson 1972）。這期間，他四處探訪，所到之處皆留下文字紀錄，許多發表於《印度群島與東亞學報》，例如：〈新加坡及其鄰近島嶼地理特徵之註釋〉（Notes on the Geological Features of Singapore and Some of the Islands Adjacent, 1847）、〈霹靂視察〉（Observations on Perak, 1850）等。

另有一批非官方人員的遊歷文字，是這類型文字的主流，數量極多，這裡僅能揀選較具代表性者加以介紹。

（一）John T. Thomson（1821-1884），於 1838 年來馬，首先在檳榔嶼和威士利省一帶，以個人身分進行探險勘查並繪製檳威地圖，引起海峽殖民地總督的注意，並於 1841 年受聘為新加坡勘察與測量員，同時擔任土木工程師，前後服務了 12 年（1841 至 1853 年）之久。他除了探測新加坡海峽、柔佛東岸以及新加坡沿海的海岸線外，也興建不少橋梁、道路、華廈和燈塔。退休後，Thomson 移居紐西蘭，並將其在海峽殖民地的經歷寫成兩本饒富趣味的著述：《遠東生活一瞥》（*Some Glimpses into Life in the Far East*）和《續遠東生活一瞥，1864-5》（*Sequel to Some Glimpses into Life in the Far East in 1864-5*）。這兩本著述明顯受到 Osborn 的啟發和影響，甚至在行文和風格上皆與之相近。由於他能講流暢的巫文，加上並非殖民政府官員，所以能與馬來人有更密切的來往和互動，也因為這樣，他經常

⁵ 此書第一版出版於 1857 年，名為 *Quedah: or Stray Leaves from a Journal in Malayan Waters*，第二版出版於 1861 年，書名改成如上述。

能毫無阻礙地聽到民間的心聲，並將之如實坦率地敘述，而這無疑是本書最大的特色 (Jones 1984: v-viii; Thomson 1865: v-viii)。

(二) John Thomson (1837-1921) 為蘇格蘭人，著名的攝影師和旅行家，1861 年至新加坡投靠以攝影和鐘錶維修糊口的哥哥。約在 1860 年代中期，Thomson 與人合夥成為業主，開始周遊東南亞各國的計畫，期間拍下無數珍貴的照片。大約自 1870 年開始，他以香港為基地，進行壯遊中國的旅程。十九世紀後半期是遊記風行的時代，他也將撰寫成文的經歷出版，名為《甲峽、印支和中國，或十年海外旅行、探險和居住》(*The Straits of Malacca, Indo-China and China or Ten Years Travels, and Adventures and Residence Aboard*)，由於卷帙浩大，超過 550 頁，為了方便閱讀，乃將之一分為二，第一冊名為《19 世紀攝影師在甲峽、暹羅和印支之遊記》(*The Straits of Malacca, Siam and Indo-China, Travels and Adventures of a Nineteenth-century Photographer*, 1885)，以東南亞之記載為主，共六章，前三章講述的是檳城、吉打、威省、霹靂、馬六甲、柔佛和新加坡的經歷，後三章是有關暹羅、柬埔寨和越南的經歷。第二冊是《湯申眼中的中國：一個攝影師十九世紀的旅遊和探險》(*Thomson's China: Travels and Adventures of a Nineteenth-century Photographer*)，書中所載以中國為主 (Balmer 1993: ix-xxxiv)。

另有兩位元女性的遊歷文字亦極具代表性，他們是 Isabella Bird 和 Emily Innes。前者是英國著名探險旅遊家，先後探訪美國的落磯山脈 (Rocky Mountains) 和伊朗高原，並沿中國長江溯源而上兩千公里至青藏邊界，也曾單槍匹馬至印支半島和馬來半島等地，足跡遍布世界。著述等身，其中《黃金半島和那遙遠的遠方》(*The Golden Chersonese and the Way Thither*) 詳細記載了她在馬來半島旅行的過程 (Wang 1967)。後者是殖民官員的家眷，其夫詹姆士·伊尼士 (James Innes) 是馬來半島初級文官，在 1876 年從砂拉越調任至雪蘭莪的冷嶽 (Langat)，出任地方稅務官和推事，直到 1882 年辭職。Innes 在馬來半島的六年經歷皆記載在《失色的馬來半島》(*The Chersonese With the Gilding Off*, 1885) (Innes 1993)，是部樸實無華的馬來半島生活全紀錄。

Bird 的《黃金半島和那遙遠的遠方》由 28 封書信和四個導論性質的章節所組成，作者每至一地，必在之前簡要介紹該地的地理、歷史和文化，全書除前面八封信是記錄中國和香港旅程外，其餘皆是馬來半島的紀錄。而該書四個導論性質的章節則分別介紹馬來半島、雙溪芙蓉（Sungai Ujong）、雪蘭莪和霹靂，從書中的內容來看，她極為享受其旅程，對於周遭的人、事、物，無論大小，皆有細緻描繪和深刻體會。但正因為過分側重身邊事物的細膩描述，不免削弱了對於馬來半島習俗文化的論述和評析。書中對華人的論述相較於馬來人而言，有較突出的比重，且時而流露出對此論述缺憾的歉意（Bird 1967: 137, 201）。至於 Innes 的《失色的馬來半島》，則共分兩卷，卷一是記錄作者初抵馬來半島，在雪蘭莪偏遠地區冷嶽（Langat）年餘的生活情況，這一段時間的生活較為平淡寧靜，無甚起伏，故側重於敘述作者的生活細節，包含每日的飲食起居和行住坐臥。這看似流水帳式的論述，無甚跌宕起伏，但由一位外邦的他者，以外來的眼光投射這塊土地上的事事物物，卻能寫出迥然不同的全新奇異感觀，使人讀來趣味盎然，絕不冗長乏味。卷二是記載作者隨丈夫調職到霹靂的 Durian Sebatang 至返回英國的經歷，這部分由於乃多事之秋，甚至九死一生，險遭殺害，因此較側重記述作者本身的經歷，而不似第一卷般，有較多對於馬來社會文化的觀察和評論。本書內容記載了作者在馬來半島六年的生活，由於深入民間，貼近馬來社會之脈動，雖無華麗辭藻，但樸實無華的文筆娓娓道來，寫來也生動翔實，不乏精彩動容之處。

由於兩人所處時代相近，而女性的遊歷文字極為鮮少，因此後人在閱讀兩書之餘，往往會將兩者相提並論，並相互比較。在行文或筆調上，Innes 較為僵硬、刻板，讀來也較令人不快，不似 Bird 般華麗、舒服和輕鬆愉快。Innes 是以身歷其境的全程參與者敘述本身的遭遇，而 Bird 則以一個遠處的觀察者來描述其見聞。由於 Innes 遭逢種種不快的經歷，以及面對文化生活的差異和衝擊，甚至險遭殺身之禍，太多慘痛的經驗籠罩，致使其書名也不免讓人黯然。

另有兩本屬於科研工作性質的遊歷文字，一是物種源起理論的倡議人之一的 Alfred R. Wallace，他於 1854 至 1862 年間動身往來馬來群島從事

探險、考察和採集，旅行一萬四千公里左右，共航行六、七十次，並撰寫趣味深長的《馬來群島遊記》，於 1869 年出版，同時另有許多重要的論文由倫敦幾個科學社出版（*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980: 466-467）。另一是美國的 William T. Hornaday（1854-1937），他是華盛頓和紐約動物園的創辦人，並擔任紐約動物園主管多年，也是著名的天然資源保護管理論者、動物標本制錄者，以及動物行為和智商研究專家。他曾在印度、錫蘭、馬來半島、馬來群島和婆羅洲進行標本採集和田野調查的工作，並將他的經歷筆錄成書，即《兩年在森林：一位獵者和自然學家在印度、錫蘭、馬來半島和婆羅洲的經歷》（*Two Years in the Jungle: The Experiences of a Hunter and Naturalist in India, Ceylon, the Malay Peninsula and Borneo*, 1885）。後來為方便閱讀起見，特將其在馬來半島和婆羅洲的部分抽出單獨刊行，為《一位獵者和自然學家在馬來半島和婆羅洲的經歷》（*The Experiences of a Hunter and Naturalist in the Malay Peninsula and Borneo*, 1993），其內容生動，除有關田野調查的記錄外，也記錄了他對馬來人、達雅人（Dyak）以及其他土著的觀感（Gullick 1993）。

從十九世紀至二次大戰以前進入新馬的觀察家不在少數，有的長期駐留，有的則只是短暫過客，但其中留下的遊歷文字不勝枚舉，例如：*By Jungle Track and Paddy Field to Rubber Plantation and Palm Grove*（Apha 1915）、*In Malay Forest*（Maxwell 1930）、*The Soul of Malaya*（Fauconnier 1931）、*In Eastern Sea*（Anderson 1934）及 *Return to Malaya*（Lockhardt 1936）等，在這裡只能略舉，無法逐一介紹。

以上介紹的幾部遊歷書籍是其中較為重要的，有的書籍全書皆以馬來半島為論述主題，有的雖論及其他地區，但對馬來半島的論述也占了主要篇幅，至於其他單篇或零星的文字更是不在少數。有鑑於此，一些東南亞研究學者就以馬來半島作為一個獨立區域，將相關的文字以類相從，彙編出版成冊以利閱讀。目前，已知的有古烈治的《他們到馬來亞：旅遊者文集》（*They Came to Malaya: A Travellers' Anthology*；新加坡：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John Bastin 的《新加坡旅遊者文集》（*Travellers' Singapore: An Abthology*；新加坡：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此外，這批觀察家也以其他的方式，諸如創辦報章、刊行期刊、撰寫百科全書式的大塊頭著述，以及傳教士的出版和印刷事業，為東南亞研究留下了寶貴的文字遺產。

三、報章雜誌和期刊的出版

報章雜誌可說是半島較早出現的一種文字紀錄，它們的出現主要是因應商貿的需求。最早的報章雜誌可以溯源至 1806 年，在檳榔嶼由 Andrew Burchet Bone 策劃編輯的《政府公報》（*The Government Gazette*，也稱《牙塞報》），該報曾一度易名為《威爾士太子島公報》（*Prince of Wales Island Government Gazette*），出版至 1827 年 8 月始停刊，共 21 年，以刊載公告、新聞和廣告為主。*The Government Gazette* 停刊後 12 天，另一份名為《檳榔嶼萬花筒》（*The Penang Register and Miscellany*）的報章也緊隨出版；同年 10 月另一份名為《三州府公報》（*The Government Gazette Prince of Wales Island, Singapore and Malacca*）的週報也出版了，但只出版至 1830 年 7 月就停刊；1833 年，*Pinang Gazette & Straits Chronicle*（《檳榔嶼公報和海峽紀事報》）出版，它是 1827 年停刊的《威爾斯太子島公報》的復刊版，1838 年該報刊之名稱縮短為 *Pinang Gazette*，並持續出版至 1962 年。而除了檳城出版了最早的英文報紙，新加坡也不落人後，在 1820 年代開始出版英文報紙，並曾先後出版了《新加坡紀事報》（*The Singapore Chronicle*，1824 年 1 月至 1837 年 9 月 30 日），那是由參政司克勞馥主導，以刊載商業新聞為主的一份報紙，內容包括政府公告、商業和船運的詳細情況；其他的報紙則有《新加坡自由西報》（*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1835 年 10 月 8 日）、《海峽郵報》（*Straits Messenger*，1842 至 1843 年）、《海峽時報》（*The Straits Times*，1845 年 7 月 15 日）、《新加坡通訊報》（*Singapore Local Reporter*，1852 至 1853 年）、《海峽衛報》（*Straits Guardian*，1854）和《海運公報》（*Shipping Gazette*，1858）。至於馬六甲方面，則有《印支搜聞》（*The Indo-Chinese Gleaner*，1821 年 1 月至 1822 年 4 月）、《馬六甲觀察報》（*The Malacca Observer*，1826 年 9 月至 1829 年 10 月），以及 1839 至 1840 年出版的《馬六甲週報》（*Malacca*

Weekly Register) (Byrd and Saman 1991: 4-26; Cornelius-Takahama 2005; Isha 1998: 8-21; Khoo 1985b)。⁶

這時期，報章雜誌的出版是相當蓬勃的。由於財務問題，大部分的報紙皆無法持久發行，而報章雜誌出版的週期主要是以週報或一週兩次的形式為主。期間，雖曾有報紙嘗試一週出刊六天，但仍功敗垂成。這些報章雜誌的內容除了提供及時消息外，更重要的是刊載與商業有關的船運排期和商品資訊，有極為濃厚的商業性質；當然，刊載政府公告也是它們的內容之一。這些報紙有的仍被留存下來，有的則已經佚失，但無疑地，我們均可從中窺見當時的商貿情況，報章雜誌可以說是有關海峽殖民地時期絕佳的商貿研究史料。

至於這時期的期刊出版則極為冷清，不及報章雜誌般的蓬勃。馬來半島最早的英文學術期刊出現於 1840 年代，這份期刊是由蘇格蘭人 James R. Logan (1819-1869) 以一己之力編輯策劃出版。Logan 於 1839 年，19 歲之齡抵達檳城，並在 1842 年至新加坡擔任訴訟代理人，1853 年重回檳城並就此定居下來，直到逝世為止。Logan 嫻熟律法，創辦報刊雜誌，進行學術研究，並發表了不少有關馬來群島研究的文章，可謂多才多藝。1847 年，他在新加坡出版專門研究東南亞的學報，那就是《印度群島與東亞學報》，截至 1863 年止，《印度群島與東亞學報》一共出了 14 卷，每卷都有二、三十篇論文（劉子政 1957：59-67），⁷其內容主要以馬來半島、砂拉越和沙巴的歷史、地理、經濟和民族學等為主，其發行人極少，平均每一期只有二、三百本。由於《印度群島與東亞學報》蘊含豐富的經貿和政治資訊，每一期印行的數量中有 50 冊是由東印度公司所訂購，以作為決策參考之用。《印度群島與東亞學報》的發刊有四大宗旨，首先是將馬來群島研究的文章介紹給英文讀者；其次是編輯整理任何有關馬來群島的資料，以供參考之用；其三是將荷蘭的文章和研究成果翻譯成英文，以利英文讀者和研究人員之用；其四是調和英荷在馬來群島的關係。此一期刊的最大意義

⁶ 另外，劉子政（1957：59-67）依據編年方式整理東南亞報章，亦可參閱。

⁷ 1847-1855 年共出刊九卷；1856 年開始出版新系列，共兩卷；1859 年出版新系列第三卷；1863 年出版第四卷和第五卷。

在於提供了瞭解馬來群島之政治、社會和經濟等方面的動態，可說是歐美人士認識馬來群島最早的一扇窗戶（Sivachandralingam 2008: 41-52）。

Logan 除了是經營者、出版商、主編，也是主要寫稿人。由於他寫的文章非常多，當時的人常喜歡稱它為《羅幹學報》，可見 Logan 和該學報的關係。海峽分會的其中一個發起人 Archdeacon Hose，稱譽這是「個人獨撐的艱辛事業」（Tiew 2003: 21-22）。雖然 Logan 只是活躍文壇的人物，但他對馬來亞的史地研究卻有莫大的影響，例如，《海峽分會學報》的內容取向既由他的學報脫胎而來，在 1920 年代以前，《海峽分會學報》可以說傳承了《印度群島與東亞學報》的傳統，既以調查、記錄和傳播當地知識為重點，及至 1920 年代才開始逐漸偏向歷史書寫（Khoo 1985a: 90-91）。這一點在第一任會長 Hose 的就職演詞中表露無遺，差別只在於他們是屬於集體的事業（Hose 1878）。Logan 的勤奮和博雅，為當時旅馬歐人所傾倒，推崇他和開闢星洲的 Thomas S. Raffles（1781-1826）、英譯《馬來紀年》（*Malay Annual*）的 John Leyden（1775-1811），以及編著《印度群島辭典》（*A Descriptive Dictionary of the Indian Islands & Adjacent Countries*, 1856）的 John Crawfurd 等齊名（許雲樵 1960：144）。

《印度群島與東亞學報》停刊 12 年後，即 1875 年 7 月，馬來半島第二份英文的學術刊物《東亞期刊》（*Journal of Eastern Asia*）才出刊，它是由萊佛士圖書館和博物館的館員兼秘書 James Collins 緊隨羅幹之後而策劃出版的，同時得到當時海峽殖民地總督的認可和財務支援。但不幸的是，本應在 1875 年 10 月出版的第二期卻因財務問題和稿件不足而無以為繼。其刊載內容除了歷史，也包括動植物、地質、礦物、氣象和地理學等（Tiew 2003: 23）。⁸

四、百科全書式的書寫

這時期，一些殖民地的文官或軍官開始被委派來海峽殖民地執行勤務和治理行政事務，加上馬來半島商業的擴展，侷限於沿岸的商業已經無法

⁸ 據 1880 年海峽分會會長的演說，上述兩份期刊停刊之主要原因是憑藉個人之力獨撐，而不似《海峽分會學報》般群策群力（Anon 1879）。

滿足當時的需求，因而加速了對內陸商貿的推動。在政治和經濟力量的推動下，相關人員在任事的同時，也對馬來半島產生了莫大的興趣，積極蒐集有關資料，產生了一批以全面廣泛論述，同時可以提供殖民母國之商人以及政務人員管理和經商資訊為宗旨的百科全書式或通典式的著述（Mills 2003: 232-233）。這類著述的內容極為廣博，舉凡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律法、風俗、民族、地理、物產，乃至動植物，無不詳載。

此類著述中，以 Crawford 在 1820 年編著出版的《印度群島史》最具代表性。斯書之作，是他九年居停檳榔嶼和爪哇期間蒐集資料撰寫而成的。1808 年，他任職於檳榔嶼醫藥部門，服務三年期間開始蒐集當地的語文、習俗等資料。1811 年，擔任爪哇王廷英國參政司時，他曾先後出使巴厘（Bali）和西里伯斯（Celebes）六年，他抓緊機會，積極蒐集有關地區和人民的資料。此書涵蓋區域廣袤，除了馬來半島之外，也包括蘇門答臘至菲律賓和新幾內亞的地域，其內容從歷史、宗教、政治、地理、農業、藝術，乃至自然科學無所不包，是一本實用性很強的參考典籍。書分三卷，第一卷由五個部分組成，第二卷有三個部分，第三卷有兩個部分（Crawford 1967）。1856 年，他在此書的基礎上重新編輯整理成《印度群島辭典》（*A Descriptive Dictionary of the Indian Islands & Adjacent Countries*），此書編寫的初始概念是要延續前書的方式加以擴大，但慮及東印度群島和菲律賓的資料繁複龐雜，故改變初衷，改以辭典形式，依據英文字母順序來排列資料，以方便檢索引引（Crawford 1856）。⁹

此書雖屬百科全書性質，內容包羅萬象，但書寫範圍僅側重爪哇，其餘地區的著墨不多，因而與書名並不相符。其次，此書所引用之資料均未註明出處，難以確認真偽。其三，此書滿溢西方對東方的傲慢和自負的優越感，例如：他評論爪哇文學為「謊言、幼稚和廢話」，認為爪哇早期歷史記載雖不及印度般的神怪荒誕，但幼稚和不協調有過之而無不及。然而，儘管此書有如斯種種的缺失，仍無損其價值，它清楚地呈現當時東印度社

⁹ 這個版本涵蓋了他三年在新加坡（1823 至 1826 年），以及出使暹羅、越南和緬甸等地所蒐集的資料。

會和商貿情況，擁有極高的社會經濟方面的史料價值（Harrison 1962: 246-250）。

其次，另有新加坡新聞工作者 John H. Moor，誕生於澳門，早歲在愛爾蘭成長，並在都柏林聖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學習。1826 年抵馬六甲，辦馬六甲義學和《馬六甲觀察報》並任編輯。1830 年至星洲執教鞭，並出任新加坡義學校長，也曾任《新加坡自由西報》和《新加坡紀事報》編輯，他大量運用時人在報章上所發表之與各東南亞國家有關的報導和文章並將之彙編整理，並在 1837 年出版《印度群島文匯》（*Notices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 and Adjacent Countries*），其敘述範圍涵蓋現時印尼、菲律賓、泰國、馬來半島等地（Moor 1837）。¹⁰

其三是出版於 1853 年共二卷本的《印度群島及其鄰近國家史》（*The Indian Archipelago: Its History and Present State*），論述歐洲人在亞洲的商貿和征服。此書之作係有鑑於 James Brooke 事業之成功，引發了公眾對東南亞區域情況和歷史的好奇。爲了因應這種需求，他將東印度群島的各方面，從歷史、民族、地理、文化到動植物、語言、海盜都加以論述介紹，時限從 1160 至 1848 年（John 1853）。由新聞從業員出身的 St. John 撰寫，他是專業記者，曾擔任多份英文報的特派通訊員。此書的思想意識一如 Crawford 充斥帝國主義和達爾文式的白人優越意識，強烈認爲在歐人治理下，東印度地區遲早會接受西方的良好文化傳統（Harrison 1962: 252-254）。

以上著述主要是以東印度群島爲關懷範圍，至於將論述中心集中到馬來半島的則有如下幾種。首開先例的，當數 John Anderson（1785-1845），他從 1813 年開始任事於檳榔嶼，直到 1829 年自東印度公司退休爲止，後回英國從商，老死在英國。十餘年間，他先後擔任會計、稽查、翻譯等工作，他的《關於馬來半島與馬六甲海峽英國殖民地的政治與商業問題》（*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Considerations Relative to the Malaya Peninsula and the British Settlement in the Straits of Malacca*）出版於 1824 年，書由兩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有關暹羅占領吉打和霹靂的動機，簡述馬六甲的

¹⁰ 他使用的報章雜誌主要以 *Singapore Chronicle* 爲主，其他則有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和 *Calcutta Journal*。

建立及其與暹羅的關係，同時說明吉打和檳榔嶼的關係，並做出保障英國利益和改進海峽殖民地馬六甲區域商業的建議；第二部分則敘述西海岸馬六甲區域的產錫區和河流，同時呈現各州的疆界、自然物產，以作為商貿參考之用。此書之目的在於糾正一些不可忽視的錯誤觀念，好像小至貢品的進貢，大至朝廷當權者的事情，以為將來和暹羅政府談判做準備，確保英殖民政府的利益，後來甚至成為總督制定政策的參考書（Bastin 1962: 1-4）。¹¹

陸軍中尉 Peter. J. Begbie 軍校出身，於 1831 至 1832 年被委派至馬六甲參與南寧（Nanning）戰爭，戰爭結束後，回印度將此事蹟寫成《馬來半島》（*The Malayan Peninsula*），並於 1834 年在印度馬德拉斯（Madras）出版。該書內容相當廣泛，包含荷人在馬六甲的行政管理、英人在南寧的權利和戰爭、新加坡的建立、馬來歷史和風俗，以及廣泛的調查記載，可說是最早以較客觀的視角對馬來半島進行廣泛論述的作者。該書內容雖不免粗枝大葉，卻提供了許多現時已經無法見及的資料，尤其是有關南寧戰爭的記載最為可貴（Banerjee 1967: 1-11）。¹²

Thomas J. Newbold（1806-1850）是東方研究學者、著名的旅遊者，足跡遍布東南亞、印度大陸、中東和歐洲，廣泛蒐集各地的風土人情和自然界的資料。他也是十九世紀著名的英籍官員，且原是印度馬德拉斯步兵第 23 軍團的陸軍中尉（Lieutenant of 23 Regiment Madras Light Infantry）。1832 年，他從印度來馬六甲，協助處理南寧戰爭的善後事宜，開始對馬來半島居民和風俗習慣發生興趣。在馬六甲三年，他仔細觀察、研究和大量蒐集有關資料。回印度後，將這些資料整理撰述，在 1839 年出版《馬六甲海峽英屬殖民地通典》（*Political and Statistical Account of the British Settlements in the Straits of Malacca*；以下稱《通典》），內容包羅萬象，

¹¹ 此書後來馬來亞分會重刊於 1962 年第 35 卷第 4 期的《馬來亞分會學報》。

¹² 他的著述頗豐，至少發表超過 15 篇有關自然和人文學科的著述。有關馬來半島的著述，除了上述的《通典》外，他也和一名陸軍少將 F. W. Wilson 合著一篇有關華人私會黨的重要論文，名為〈馬來亞華人私會黨天地會中的「三合會」〉（*The Chinese Secret Triad Society of the 'Tien-ti-hueh'*）（Begbie 1835: 583）。

舉凡歷史、政治、商業、植物、地質、法律和人類學皆在論述之列（Turbull 1971: v-xxvi）。

《通典》讓 Newbold 名留馬來研究的史冊，且尤為 1870 和 1880 年代進入馬來土邦的殖民官員所重視。然而，此書的缺點也不少，諸如論述過於簡略、與事實不符、時代錯亂、對伊斯蘭教存有偏見、夾雜神祕敘述等。但其中最為怪異的是，他在馬六甲三年所親身經歷之事，幾乎隻字不提。由於卷帙浩大，致使內容繁冗重複，體例不嚴。雖有如斯缺點，卻無損其價值，許多 Newbold 徵引的文獻賴此書而存，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也是當時英國殖民者瞭解馬來半島的重要參考書籍之一（Turbull 1971: v-xxvi）。

Nicholas B. Dennys 在通過民事服務考試後，於 1860 年代任事於中國北京、天津、廣東和廈門的領事館，離職後在香港擔任編輯報章的工作，1877 年至新加坡任華民副護衛司（Assistant Protector of Chinese in Singapore），1880 年任北婆華民護衛司（Protector of Chinese in Borneo）（Heussler 1981: 151-152）。期間，Dennys 曾任新加坡萊佛士博物院秘書、圖書館館長，也是海峽分會的倡議人之一，1878 年擔任秘書一職。他是當時唯一擁有博士學位的殖民官員。他於 1894 年，在《印度群島辭典》的基礎上更新和完備其資料，編撰《英屬馬來亞事典》（*Descriptive Dictionary of British Malaya*），此可視為 Crawford 在 1820 年編著出版的《印度群島史》的增訂版（Gullick 1991: 20）。

還有一本由 John Cameron 撰寫的《吾人在馬來亞印度之熱帶屬地》（*Our Tropical Possessions in Malayan India*），該書出版於 1865 年，論述範圍僅及海峽殖民地三州府，其中新加坡就占了近 300 頁的篇幅，而檳城和馬六甲只有不到 90 頁，可見新加坡在作者心中的重要位置。Cameron 認為，新加坡是馬來半島的經貿中心，必須由英國殖民部直接管理而不是讓印度來治理。其著述目的是希望可以透過此書將這個熱帶國家介紹給英國人民，並凸顯新加坡的重要性。雖然他記述了當時三州府的事物，但卻是位「差勁」的歷史學者，而且他寫作之目的也不在歷史記載，所以他的資料並沒有經過仔細鑑定，存有不少問題，因此 Maxwell 在書中眉批稱之為「寓言式」的著述（Fabulous）（Wang 1965）。

最後，還有一類相關著述，其論述範圍更小，僅及檳榔嶼一地。最早的一本是 Norman MacAlister 的《檳榔嶼歷史紀要》(*Historical Memoir Relative to Prince of Wales' Island i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and Its Importance,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倫敦, 1803)，作者是炮兵隊隊長，此書原為向英國東印度公司彙報檳榔嶼十餘年來的發展概況，書前為作者序文，全書僅有 38 頁，內容由地理方位、景觀、氣候、水土、物種、居民等 13 小節所組成，論述較為精簡，是有關檳榔嶼全面介紹最早的文字紀錄。第二年，檳榔嶼總督 George Leith 所寫的《檳榔嶼述要》(*A Short Account of the Settlement, Produce, and Commerce of Prince of Wales' Island i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倫敦, 1804) 出版，這是小開本的著述，原文 56 頁，加上三篇附錄共 71 頁，書後另附有地圖一幀。全書由 33 小題組成，從檳島開闢的原因、經過、早期發展概況到位置、氣候、土壤、港口、水供、礦產、居民、物產、律法、教堂和商業等，包羅萬象，相當全面地介紹檳榔嶼在十九世紀初期的情況，其內容較 MacAlister 之著述詳盡。在這類著述中，以 James Low 的《檳榔嶼土地和農業專論》(*Dissertation on the Soil & Agriculture of the British Settlement of Penang, or Prince of Wales Island, i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Low 1836) 最具代表性，書中記載十九世紀檳榔嶼社會和經濟史的資料，且有許多材料是當時官方紀錄所沒有的，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此書最為特殊之處在於，幾占三分二的篇幅是有關經濟方面的文字，尤其是有關半島北方農業的論述。在當時英殖民者側重商貿的情況下，他卻關注半島農業的發展和可行性，可說是英殖民官員最早注意及此者。

以上的著述雖然有濃厚的殖民商貿傾向，同時作為往後殖民統治的情報準備，但撰述者都是曾身歷其境的殖民官員，敘事有所本，皆能如實反映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層面；更為重要的是，這些著述保存了大量現時已經遺失的原始文獻資料，有其不可抹煞的歷史和文獻價值。他們的作品對現人而言，已經有所不足，而且存有一些缺點，但無損它們作為當時代表性的著述以及史料之價值。1960 至 1970 年代以來，大部分的這類著述受到國際知名出版社牛津出版社的青睞，給予出版，並找來學者在書首做專文論述和介紹。

五、殖民檔案的建立

1948年，馬來亞的英殖民政府接到倫敦殖民總部發出一紙通令，指示所有殖民地針對其檔案進行文物保護並研究其可行性。1950年，英殖民政府開始著手研擬，並於1956年提呈一份報告。這份報告的最大成果是促成了馬來土邦公共檔案局（Pejabat Rekod Awam Tanah Melayu）的成立，並在1957年易名為馬來亞國家檔案館（Arkib Negara Malaya），而檔案館則職司存收和整理英殖民政府以及國家的檔案（Muhamad 1998: 1）。至於新加坡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創立於1968年，它的主要任務是保存新加坡國內具有歷史價值的公私檔案文獻。

英殖民政府在統治期間，留下了一批極為珍貴的檔案，目前這些檔案大部分已經整理編目，有的留存在英國，有的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檔案館，還有部分英國的檔案資料，馬來西亞檔案館也將之採購回來，並已將部分檔案拍成微縮膠卷，另有一部分則原件收存。然而，至今使用檔案資料進行研究的情況仍不普及，這主要是因為大部分的檔案未經現代打字排版編印處理，行文潦草凌亂，讀來耗神費力；再者，檔案皆出自英殖民者之手，不免帶有濃厚的英殖民政府傾向，在採用時也要極為小心辨析。例如：英人採行的分治政治、英文至上教育，難免都會被說成是為了新馬的進步，但這些施政方針的背後無疑帶有英人方便管理，遂其政治野心和私心的目的。

英人統治新馬近200年，留下的檔案是極為龐大和驚人的，主要可以分成如下三類：首先是中央文檔，主要涉及英國對殖民地的施政方針和基本政策，這些政策是在英國國會裡議決制定的，但英國也成立了殖民事務處（Colonial Office），全權處理殖民地相關事宜。其次，是殖民地政府檔案，是英國殖民地政府對殖民地統治的各類紀錄，這些檔案是殖民官員的來往書信、會議紀錄、日誌和報告等。第三是地方檔案，是指殖民官員對地方領導的行政通告、指示和書信等檔。書信方面，則可細分為官方和私人函件（Saat 2005: 116-121）。

1957年，馬來亞國家檔案館成立，開始進行檔案的蒐集和整編。自1984年以來，該館陸續出版了數冊檔案文獻目錄，以供研究人員檢索，例如：*Index to British Colonial Office Files Pertaining to British Malaya* (Kratoska Paul H. 1990) (《英國殖民部所藏英屬馬來亞檔案索引》)，共12大冊，計有CO273、CO717、CO953、CO1022、CO1030、CO144、CO531、CO874、CO938、CO954、CO947、CO537、CO825、CO852、CO865、CO882等系列，時間上限為1838年，下限為1962年。這些文獻包括殖民地政府公函、法令、報告、議會紀錄、憲報、統計資料等，其中CO273系列收錄殖民大臣 (Secretary of State) 與殖民各部門或個人的通訊，時間上限為1867年，下限為1946年，涉及面極廣，是主體組成部分，最為重要 (Kratoska 1990: 1-6)。此外，另有《最高專員署檔案目錄》 (*Inventory Rekod Pejabat Pesuruhanjaya Tinggi, Bahagian I*) (1896-1901, 1903-1909)，收錄的文檔分成四大類，包括：(一) 行政，又細分成一般文檔、常年報告，以及與統治階層的通訊三個子目；(二) 農業；(三) 華人事務；(四) 習俗和商貿 (Kasah 1984)，以及《英國軍政時期檔案目錄，1945-1946》 (*Indek Kumpulan Rekod 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1945-1946*) (Kasah et al. 2004)。

另外，新加坡檔案館也收藏了類似的檔案，現存的「東印度公司海峽殖民地檔案 (1786-1867)」、「直轄海峽殖民地時期檔案 (1867-1959)」、「馬來屬邦檔案 (1873-1942)」、「馬來亞聯合邦檔案 (1945-1959)」、「新加坡自治與建國檔案 (1959-)」等 (李金生 2002: 231)。同時，也編有如下工具書以供檢索：《海峽殖民地檔案紀錄索引，1800-1867》 (*Index to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Records, 1800-1867*) (Tan 1970: 1-24)，此書將總數超逾600冊的海峽殖民地檔案，其中包括來往公函、土地紀錄、日記、機密檔等編目整理。《新加坡歷史文獻指南》 (*Guide to the Sources of History in Singapore*) 共分兩卷，分別將新加坡檔案館內公私檔案文獻整理編目，第一卷分為五大類，即海峽殖民地 (1786-1867)、新加坡殖民時期迄自治政府時期 (1867-1959)、新加坡自治至共和國成立 (1959 迄今)、馬來聯邦 (1873-1942) 和馬來亞聯合邦 (1948-1959)，這卷編目的檔案

主要以官方文檔為主（Ong 1991）。第二卷分爲三個部分，絕大多數是二十世紀的文檔，尤以戰後占多數。第一部分是公共文檔，是各政府部門檔案資料；第二部分是私人文檔，由各民間宗教、社團檔案和個人特藏組成；第三部分是新加坡各圖書館的檔案館藏資料。這卷編目的檔案主要以私人收藏爲主（Phillips 1991）。緊接著以上兩卷指南，新加坡檔案館爲了方便研究人員能更迅速和有效地搜尋和查找資料，因此整理編輯了《海峽殖民地立法局檔及報告檔案索引》（*Index to Papers and Reports Laid Before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1867—1955）（Chng 1992）涵蓋從 1867 年皇家海峽殖民地成立至 1955 年海峽立法議會結束爲止，共 82 年的檔案資料，其編目方法依主題事物來分類，並以英文字母順序來排序，對於人、事、物針對性的查找極爲便利。

在戰後英國本土，有關的學者也開啓了戰時和戰後英殖民帝國結束前夕檔案的彙整，其整理範圍極爲廣泛，涵蓋非洲、太平洋、中東、東南亞和加勒比海所有英殖民國家，此專案的計畫名稱爲「英帝國終結前夕的檔案文獻」（*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Empire*），共整理出版了兩個系列、八卷的檔案文獻，系列 A 屬一般性質文檔，共三卷；系列 B 爲個別國家文檔，即加納、斯里蘭卡、馬來亞、埃及和蘇丹，共五卷。而馬來亞部分又分成三個部分，即馬來亞聯邦（1942-1948）、共黨叛亂（1948-1953）和邁向獨立之路（1953-1957），每個部分又據編年方式設立主題，將所有相關檔案編入，檔案詳盡完整（Stockwell 1995）。

六、倫敦佈道會的印刷和出版事業

最後有必要一提的是，倫敦佈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在海峽殖民地進行的印刷和出版事業。他們的文化事業雖然重點是在傳教，但在這過程中也撒下文化種子，或多或少爲東南亞研究做出了一些貢獻。事實上，他們是新馬最早出現的有組織的印刷出版事業，分別在馬六甲（1815）、檳城（1819）和新加坡（1822）設立傳教工廠和印務事業。倫敦佈道會成立於 1795 年，成立宗旨是透過出版和發送各種語文的《聖經》，並在學校透過聖經和教義答問（catechism）來教導孩童讀書和寫字，向各

國家和人民宣揚教義 (O'Sullivan 1984: 61)。他們的主要傳教對象是廣大的清朝人民，可是由於滿清政府的禁教令，嚴厲禁止基督教在華傳教，西洋傳教士一律不得居留中國，國人若有奉教者，皆處死刑，礙於政治情勢，要在中國進行福音工作，其困難可想而知。此外，由於嚴禁洋人「私自刊刻經卷，倡立講會」，要從事編寫及刊印福音文字等預備性的事工亦困難重重；若能在南洋設立一間印刷廠，印行聖經及福音單張，便可以支援在華的福音工作了 (卓南生 2002: 17-18; 梁家麟 1988)。在這種情況下，倫敦佈道會只好轉移目標，向南洋尋求佈道的場合，同時作為宣教品的印製所在。當時，在廣東負責傳教事宜的馬禮遜牧師策劃在馬六甲設點，並由 William Milne 牧師蒞馬六甲主其事。除了馬六甲，新加坡和檳城也先後設點，進行弘揚福音印務工作，其工作重點主要在印製中國宣教所需的聖經、手冊、福音單張等 (O'Sullivan 1984: 61-104)。

雖然他們以印製宣教品為主要工作，但在海峽殖民地 32 年的歷史，期間也在宣教目的的主導下出版了一些和東南亞研究有關的出版品。首先是華巫英三語報章雜誌的出版。在 William Milne 時期，出版了兩份最早的報紙，一份為《察世俗每月統計傳》，它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華文報，創刊於 1815 年 (清嘉慶二十年)，是每月出版一次的月刊，連續出版至 1821 年 (清道光元年)。刊物每期平均六至九頁，共出版七卷，524 頁；其創刊宗旨是為中國傳道創造條件，在刊發內容上，主要以「神理」(基督教教義)為主，「人道」(倫理道德)其次，再次為「國俗」(各國風土人情)。刊物的編輯工作則主要由 William Milne 負責，他身任主筆，為主要撰稿人，此外，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麥都思 (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 和中國的印刷工梁發也曾為刊物最後數期撰稿 (楊勇 2004: 60-64)。另一份為《印支搜聞》季刊，1817 年 5 月出版，至 1822 年 4 月停刊，是西方基督新教傳教士在南洋創辦的第一份英文季刊。它是一份宗教刊物，其目的「主要是關於宗教問題的相互聯繫的管道，同時還可能成為瞭解我們傳教的幾個國家的文學、歷史等許多有用資訊的仲介」，因此該刊的目標是蒐集那些曾去過這些地區的人所遺漏的資料，記錄不可能引起有聲望的出版物注意的那類事情，因而將它命名為「搜聞」。其內

容編排主要有三類：第一，來自各傳教會的消息；第二，總消息，包括世界不同地區的關於基督教形勢的描述；第三，雜錄，主要是那些與傳教士所在的各個國家的文學、哲學、歷史學等有關的「各類介紹及短評」，還有譯自當地的文學翻譯等（譚樹林 2002：40-46）。

1821 至 1822 年間，在傳教士 Rev. Claudius H. Thomsen 的主持下，發行了一份英巫文對照刊物，名為《馬來雜誌》（*The Malay Magazine* 或 *Bustan Arifin*），可視為第一份在半島發行的以馬來人為對象的刊物。該刊物中，大部分的文字以爪夷（Jawi）文刊印，只有少部分是羅馬化的馬來文，共出版六期（即 1821 年 1、4、8 月和 1822 年 1、4 月），其內容與《印支搜聞》相近，但主要對像是青少年（O'Sullivan 1984: 73）。至於其他和他們有關的英文報章，則有前述提及的《新加坡紀事報》、《馬六甲觀察報》和《馬六甲週報》三份。

以上的報紙雖然主要以傳教為主要任務，且內容絕大部分都是與福音工作有關的文字，但它們無疑標誌了馬來半島出版史上最早期的報章雜誌的出版，從這些報章雜誌可以清楚知道當時的出版情況，也可以瞭解當時的傳教情況。

除了報刊雜誌的出版，它們的一些零星出版品在東南亞研究的史料保存方面亦值稱述。

1823 年，Morrison 來馬六甲與 Thomas Stamford Raffles 晤面，並認同將馬六甲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轉至新加坡和新加坡書院（Singapore Institution）合併，但後來事不成。同年，Morrison 也參與了新加坡書院的成立就職和贊助人大會。以上三事後來印製出版了《1823 年新加坡學院之成立》（*Formative of the Singapore Institution, A.D. 1823*）的小冊子，另外也印製了 1823 和 1826 年的馬來女子學校（Malay Girls' School）的報告（O'Sullivan 1984: 67, 78）。

由於教學和傳教的關係，Thomsen 在 1820 年編製出版擁有 2,000 字詞的《英巫辭彙》（*A Vocabulary of the English and Malay Languages*），1821 年出版刪節本，1827 年第二版在新加坡出版，1833 年的版本又加上武吉斯

語，1837年馬六甲的佈道會出版羅馬化的版本，即《羅馬和阿拉伯化英巫辭彙》(*A Vocabulary of the English and Malay Languages in Roman and Arabic Character*)，1841年James Legge也出版了《英巫華詞典》(*A Lexilogus of the English, Malay and Chinese Languages*)和《福建廣東俗語彙編》(*Comprehending the Vernacular idioms of the Last in the Hok-keen and Canton Dialects*) (O'Sullivan 1984: 71-72)。

至於其他的出版品，計有1831年出版的《南寧考察與遠征》(*Narrative of the Naning Expedition, Containing A Simple Detail of the Operations of the Troops, from 6th to 25th August, 1831*)，此書作者公認為是Peter J. Begbie，他是當時南寧事件的統軍將官之一，親身參與戰役，並將當時森美蘭境內南寧區人民反抗英殖民的鬥爭，以及武吉斯人的法律——《武吉斯海事法》(*A Code of Bugis Maritime Laws*)記載了下來 (O'Sullivan 1984: 82)。

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南京條約簽訂以後，開放五口通商，西方傳教禁令解除，海峽殖民地的傳教道場和印刷事務也在1844年先後關閉，人員也隨著轉移至中國，標示著他們的佈道工作就此告一個段落。但在這漫長的二十餘年間，該會的活動都有被收錄在檔案中保存。1960年代，這批檔案被送到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研究院圖書館保存，並供研究之用 (莊欽永 1987: 6)。

事實上，倫敦佈道會在海峽殖民地設立道場，其最大意義在馬來研究的啓蒙，他們以傳教為目的，以出版雜誌、印製福音單張、創辦學校為手段，逐步宣揚西方的宗教思想和文化。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也主動學習和瞭解馬來文化、習俗和語言，第一篇馬來文學的著述就是發表於《印支搜聞》。他們也帶進了西方有關辭典、文法和辭彙的編撰，以便利對馬來語文的研究。現代馬來文學之父文 Abdullah bin Abdul Kadir (或 Abdullah Munsyi, 1796-1854) 成為這些傳教士的馬來文老師，同時也向他們學習英文和有關的知識，他受西方的影響較為深遠，因為意識到語文對民族的重要，所以倡議改進馬來教育，捍衛馬來文學、辭彙和文化 (Carroll 1999: 149-184)。他們在海峽殖民地因為傳教目的而推行的，如上所述之文教事

業活動，可視為新馬最早的馬來研究活動，同時也是馬來研究最早的研究平臺。

七、小結

在東印度群島地區，相較於荷蘭而言，英國對東南亞的殖民地研究可說較為晚近，且主要開始於十九世紀。這時期的重點在對馬來半島進行全盤和廣泛的瞭解，其方式主要是以記錄、編輯和整理為主，深入和細緻的研究較少，而且也還不成氣候，是英文源流東南亞研究的萌芽期。這些文字的重要性在於不同身分背景的人員從不同的視角將他們的所見聞記錄下來，大量保留了當時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方面情況，為後來的研究人員提供了寶貴的文獻資料。從事這方面工作的人物份子較為複雜，有新聞從業員、博物學家、探險家、殖民官員、軍人、隨員家眷等。他們成為十九世紀前中期東南亞研究的主導力量，我們統稱之為觀察家。尤其是一批從事新聞工作的新聞從業員，他們積極地努力和推動，很值得留意。在十九世紀時，有相當大部分的歷史工作者是從撰寫報章的專欄為起點，進行歷史的研究工作，而 Rogan 即為一典型的例子（Gullick 1998: 94-95）。這樣的一個傳統，在往後仍然被延續了下來。¹³

至於其書寫方式可以歸納整理成如下五種，即報章雜誌和期刊的出版、西人的遊歷文字、英殖民人員百科全書式的書寫、英殖民政府的檔案，以及英國倫敦佈道會的印刷出版事業。這五類的文字，其中又以檔案和百科全書式之書寫最具史料和研究價值。檔案資料在史料價值的位序上應該屬於第一位序，因為它是最直接的第一手史料，裡面保存政府與政府、民間與政府之間大量的公文往返，以及詔令公告，這些檔非常

¹³ 其中最著的是 John Russell，他是報人兼印刷商，1855 年生於英倫，14 歲成為印刷學徒，1890 年舉家至雪蘭莪。由於 Russell 在印刷出版方面的才能，從那年起至 1910 年退休止，連續 20 年均成為雪蘭莪官方指定印刷商。為了傳播雪蘭莪政府資訊，於 1892 年出版雙週刊的《雪蘭莪雙週刊》（*Selangor Journal*），每期 16 至 20 頁，以刊載地方新聞以及其他有趣資料為主。但好景不長，1897 年這份只經營了五年的地方報章就面臨停刊的厄運，前後共 130 期，約兩千餘頁，見證了 1890 年代中期的雪蘭莪，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Gullick 2007）。另有一位同時代的報人 J. H. M. Robson 亦值一提，是馬來聯邦第一份日報《馬來郵報》（*Malay Mail*）的創辦人，此份報章創刊於 1896 年 12 月，見證了十九世紀馬來半島最後數年的發展，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

瑣碎，舉凡公職人員升遷、薪金調整、評估報告，土地或礦地的申請、轉讓、契約，無所不存。這表面上看來毫無意義，但是在量的累積之後就會產生質的飛躍，例如：如果集合了某個地區在某一個特定年限內有關礦地的開採申請，就可以知道在這個地區發現了大量的礦產；可以再進一步地追究申請開採者是什麼種族，如果是華族，以哪個省籍為主，並可由此推導出這個地區往後的發展，甚至還可以用這些史料來反證目前的一些研究成果是否符合事實。但不無可惜的是，華文學界除了少數學人，如顏清湟的《新馬華人社會史》或者馬共的研究者有較為大量的採用，一般幾乎是略而不見的（廖文輝 2006：25）。至於英文學界則使用較多，其中最典型的是 Lennox A. Mills 的《英屬馬來亞，1824-1867》（*British Malaya, 1824-1867*）和 Charles D. Cowan 的《十九世紀的馬來亞：英國政治管控的緣起》（*Nineteenth-Century Malaya: The Origins of British Political Control*），即在大量檔案文獻上架構其論述。目前這批檔案資料檔案館已依據州別進行分類，整理成完整的目錄，而且大部分也已經製成微縮膠卷，但因為沒有將原件整理出版，所以在使用上仍有其困難。

百科全書式書寫的重要在於它包羅萬象，無所不錄，而且作為官方資治用途，其真實性也較高，否則不實的資訊難免帶來決策上的誤判。這類資訊提供了當時政經社文等領域的基本資料，對研究人員認識和瞭解當時的情況無疑有極大的助益。這是至今許多英文學界研究人員仍喜歡參考的資料，反觀華文學界使用的並不多。

至於遊歷文字，作者撰述出發點、立場和觀察的千差萬別，主觀意識不免較強，因此在使用時必得謹慎辨識，引用上不及百科全書式書寫的普及。由於這類文字在書寫時，並非完全為保全史實目的而做，其著述常有個人意圖和偏見，難免出現內容失真之問題。例如：Vaughan 在論述宗族問題時，只談及宗族間的械鬥，華人宗族的優良傳統反而隻字不提。在宗教信仰上，他認為華人的求神拜佛是極為現實的急功近利，沒有發自內心的虔誠信仰（Heart worship there is none）。Thomson（1865）也認為，秘密會社的犯罪行為以及華人不守法紀，是源自於中國傳統宗族社會，並將會黨視為庇護同黨、藐視法律、反抗政府的組織；認為華人打赤

膊，衣不蔽體，實在有礙觀瞻，並且使用極富貶抑的辭彙——「如豬般不潔」（piggish），幾近人身攻擊。因此站在史料學的角度來看，在使用時必得有一番甄別。但是，吾人也未可以偏概全。張禮千曾謂：

蓋航海記者，實為研究學術之原始資料之一，雖所見聞，未必盡可恃，雖所著錄，未必盡可信，然用以覆證，用以校注，乃為研究某一時代及某一地域歷史之決不可少之材料。（張禮千 1946：1）¹⁴

除此而外，倫敦佈道會因為傳教目的所積極推動的馬來研究，也繼續傳承下來。Rogan 編輯期刊所揭櫫的研究傳統和方法，可以說是開新馬地區學術的先河，對後來學術研究的影響更為無遠弗屆。尤其是《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海峽分會學報》（*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不論編輯方式或刊載文稿的內容，可謂其學步。這份期刊所刊載的文章至今仍然為學界所重視，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尤其是研究十九世紀的馬來群島所必須參考的期刊。以上都是萌芽時期所留給後人的寶貴傳統。

最後，如果站在華僑華人研究的角度上，則可以依據上述分類將相關的資料加以整理，對瞭解 1870 年代或以前的華人社會估計會有所助益。

¹⁴ 有關論述詳見廖文輝（2009：30-31）和〈戰前馬新英文源流的華人史研究概況〉（未刊稿）。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 Wallace, A. R. (1933) 《馬來群島遊記》(呂金錄譯, 孫逸殊校)。上海：商務印書館。
- 李金生(2002)〈新加坡館藏檳榔嶼華人研究文獻述略〉。《亞洲研究》26: 228-237。
- 卓南生(2002)《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 1815-1874》。臺北：正中書局。
- 張禮千(1946)〈佛羅利氏航海記序〉。見許雲樵譯注《佛羅利氏航海記》。新加坡：南洋書局。頁 1-2。
- 莊欽永(1987)〈關於 19 世紀新華社會史的一些原始資料〉。《亞洲文化》10: 4-10。
- 許雲樵(1960)〈五十年來的南洋研究〉。《這半個世紀·光華日報金禧紀念增刊》。檳城：光華日報。頁 144。
- 楊勇(2004)〈近代史上第一刊：《察世俗每月統計傳》探微〉。《出版科學》4: 60-64。
- 廖文輝(2006)〈史料、方法、理論——談馬新中文源流「華人研究」主體的建立〉。《華僑華人歷史研究》81: 23-31。
- _____(2007)〈馬來亞研究的播種者——英殖民學政人員概述〉。《中文·人》4: 40-47。
- _____(2009)〈戰前西方東南亞學研究溯源〉。《南洋學報》63: 9-56。
- 劉子政(1957)《東南亞報章系年表》。《南洋學報》13(1): 59-67。
- 譚樹林(2002)〈近代來華基督教傳教士所創中外文期刊之影響——以《印支搜聞》為中心〉。《齊魯學刊》5: 40-46。

西文部分：

- Anderson, Isabel (1934) *In Eastern Sea*. Boston: Bruce Humphries.
- Anon. "The President's Address." (1879) *JSBRAS*, 4: xx.
- Apha, Teed (1915) *By Jungle Track and Paddy Field to Rubber Plantation and Palm Grove*. Liverpool: H. Young.
- Balmer, Judith (1993) "Introduction." in John Thomson (ed.) *The straits of Malacca, Siam and Indo-China, Travels and Adventures of a Nineteenth-century Photographer*.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ix-xxxiv.

- Bastin, John. (1962) "Introduction." *JMBRAS*, 35(4): 1-10.
- Begbie, Peter J. (1835) "Account of Sungei Ujong."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4: 583.
- Bird, Isabella (1967) *The Golden Chersonese and the way Thither*.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lythe, Wilfred (1974) "Introduction." in Jonas D. Vaughan (ed.)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V-VII.
- Banerjee, Diptendra M. (1967) "Introduction." in Peter J. Begbie (ed.) *The Malayan Peninsul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11.
- Byrd, Cecil K. and Saman, Mansor Ahmad (trans.) (1991) *Percetakan Awal di Jajahan Selat 1806-1858*. (in Malay) Dewan Bahasa Pustaka: Kuala Lumpur.
- Carroll, Diana (1999) "Contribution of the Malacca Missionaries and the Hikayat Abdullah to the Birth of a Malay Concept of Malay Studies." In Jomo, Kwame Sundaram (ed.) *Rethinking Malaysia: Malaysian Studies I*. Kuala Lumpur: Malaysian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pp. 149-184.
- Chng, K. Y. (ed.) (1992) *Index to Papers and Reports Laid Before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1867-1955)*. Singapore: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 Crawfurd, John (1828) *Journal of an Embassy to the Courts of Siam and Cochin China*. London: H. Colburn.
- _____(1856) "Preface." in John Crawfurd (ed.) *A Descriptive Dictionary of the Indian Islands & Adjacent Countries*. London: Bradbury & Evans.
- _____(1967) *History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 Containing an Account of the Manners, Arts, Languages, Religions, Institutions, and Commerce of its Inhabitants(Vol I, II, III)*. London: Frank Class & Co. LTD.
- Fauconnier, Henri (1931) *The Soul of Malaya*. London: E. Mathews and Marrot.
- Gullick, J. M. (1987) "Introduction." in Sherard Osborn (ed.) *The Blockade of Kedah in 1838: A Midshipman's Exploits in Malaya Waters*.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vii-xxv.
- _____(1991) "William Maxwell and the Study of Malay Society." *JMBRAS*, 64(2): 7-46.
- _____(1993) "Introduction." in William T. Hornaday (ed.) *The Experiences of a Hunter and Naturalist in the Malay Peninsula and Borneo*.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vii-xviii.
- _____(1998) "A History of Malayan History(to 1939)." *JMBRAS*, 71(2): 91-102.
- _____(2007) "Introduction." in Gullick, J. M. (ed.) *History from the Selangor Journal 1892-1897*. Kuala Lumpur: MBRAS. pp. iii-viii.

- Harrison, Brian (1962) "English Historians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 Crawford and St. John." in Daniel. G. E. Hall (ed.) *Historians of South East As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45-254.
- Heussler, Robert (1981) *British Rule in Malaya*. England: Clio Press.
- Hose, Arehdeacon (1878) "Inaugural Address." *JSBRAS*, 1: 2.
- Innes, Emily (1993). *The Chersonese with the Gilding off*.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ackson, James (1972) "Introduction." in James Low (ed.) *Dissertation on the Soil & Agriculture of the British Settlement of Penang, or Prince of Wales island, i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v-xxiv.
- John, St. (1853) "Preface." in *The Indian Archipelago, Its History and Present State*. London: Longman. pp. v-xi.
- Jones, John Hall (1984) "Introduction." in John Turnbull Thomson (ed.) *Glimpses into Life in Malayan Lands*.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v-viii.
- Kasah, Azizah (1984) *Inventory Rekod Pejabat Pesuruhanjaya Tinggi, Bahagian I(1896-1901, 1903-1909)*. Kuala Lumpur: Arkib Negara Malaysia.
- Kasah, Azizah, Zainun Wan and Awang Wan (eds.) (2004) *Indek Kumpulan Rekod 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1945-1946*. Kuala Lumpur: Arkib Negara Malaysia.
- Khoo, Kay Kim (1985a) "Historiography of Peninsula Malaysia: Past and Present." in John A. Lent and Kent Muliner (eds.) *Malaysian Studies: Archaeology, Historiography, Geography, and Bibliography*.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p. 87-118.
- _____ (1985b) "English Newspaper as Sources of Malaysian History." *Kekal Abadi: Berita Perpustakaan University Malaya*, 4(3): 3.
- Kratoska, Paul H. (ed.) (1990) *Index to British Colonial Office Files Pertaining to British Malaya*. Kuala Lumpur: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 Lockhardt, R. H. Bruck (1936) *Return to Malaya*. London: Putnam.
- Low, James (1836) *Dissertation on the Soil & Agriculture of the British Settlement of Penang, or Prince of Wales Island, i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Singapore: Singapore Free Press Office.
- Maxwell, George (1930) *In Malay Forest*. Edinburgh: W. Blackwood and Sons.
- Isha, Md. Sidin Ahmad (1998) *Penerbitan & percetakan Buku Melayu 1807-1960*. (in Malay)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 Mills, L. A. (2003) *British Malaya 1824-1867*. Kuala Lumpur: MBRAS.
- Moor, J. H. (1837) *Notices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 and Adjacent Countries*. Singapore: Frank Cass Publishers.

- Muhamad, Samsiah (1998) "Bahan-bahan bertulis Belanda yang terdapat di Arkib Negara Malaysia, Kuala Lumpur." in Abu hassan Sham, Martin't Hart and Wong Khek Seng (eds.) *Pengajian Melayu Bersumberkan Belanda*. (in Malay) Malaysia: Akademi Pengajian Melayu University Malaya, Perbadanan Muzium Melaka. pp. 1-7.
- Ong, Choo Suat (1991) *Guide to the Sources of History in Singapore (Vol. 1)*. Singapore: National Archives.
- O'Sullivan, Leona (1984)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A Written Record of Missionaries and Printing Presses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15-1847." *JMBRAS*, 57(2): 61-104.
- Phillips, Angelina (ed.) (1991) *Guide to the Sources of History in Singapore (Vol. 2)*. Singapore: National Archives.
- Saat, Ishak bin (2005) *Sejarah Social Masyarakat Malaysia*. (in Malay) Shah Alam: Karisma Publications SDN BHD.
- Savage, Victor R. (1984) *Western Impressions of Nature and Landscape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 Sivachandralingam Sundara Raja (2008) "The Importance of the Malay Archipelag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arly European Travelers and Trades in Reference to the *Journal of the India Archipelago and Eastern Asia(JIEA)*." in Danny Wong Tze Ken (ed.) *Memory and Knowledge of the Sea in Southeast Asia*. Kuala Lumpur: Institute of Ocean and Earth Sciences, University of Malaya. pp. 41-52.
- Stockwell, Anthony John (ed.) (1995) *Malaya*. London: HMSO.
- Tan, Soo Chye (1970) *Index to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Records, 1800-1867*. Singapore: S.C. Tan.
- Tiew, Wai Sin (2003) "Malaysian Historical Journals (1847-1966) A Bibliometric Study." *Malaysia Journal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8(1): 21-22.
- Thomson, John Turnbull (1865) "Preface." in *Sequel to Some Glimpses into Life in the Far East*. Landon: Richardson & Company. pp. v-viii.
- Turnbull, C. M. (1971) "Intruduction." in T. J. Newbold (ed.) *Political and Statistical Account of the British Settlements i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Kuala Lumpur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v-xxvi.
- ____ (2003) "Bibliography of Writing in English on British Malaya." in Mills, L. A. (ed.) *British Malaya 1786-1867*. Kuala Lumpur: MBRAS. pp. 327-424.
- Vaughan, Jonas D. (1974). "Preface." in Jonas D. Vaughan (ed.)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ang, Gungwu (1965) "Introduction." in John Cameron (ed.) *Our Tropical Possessions in Malayan Indi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____ (1967) "Introduction." in Isabella Bird (ed.) *The Golden Chersonese and the Way Thither*.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v-ix.

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980) *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Vol. 12)*. Chicago: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Press. pp. 466-467.

網頁資料：

Cornelius-Takahama, Vernon (2005) "Singapore Chronicle." Website:
http://infopedia.nlb.gov.sg/articles/SIP_513_2005-01-06.html. (2007/7/22)

Savage, Victor R. and Kong Lili (n.d.) "Hugh Clifford and Frank Swettenham: Environmental Cognition and the Malayan Colonial Process." Website: <http://profile.nus.edu.sg/fass/geokongl/aprofile.pdf>. (2007/8/11)

梁家麟 (1998) 《福臨中華：中國近代教會史十講》。網址：
<http://cclw.net/gospel/explore/fulingzhonghua/index.html>。(2008/12/02)